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307

刊号：CN11-2817

炎黄春秋



周恩来、邓小平在颐和园散步



胡耀邦在广西南方和邻县干部做报告

反共摩擦 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阎锡山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历史不再回头

——记三个亿万富翁的私营公心

女杰胡筠志难酬



胡筠

12 '94

总第33期

本期导读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他常陪外宾来这座皇家花园领略中国灿烂古文化的风情；也曾在这楼台亭榭中研讨过国家的重大问题。文革中，他保护了著名的长廊；临终前，又缓舟昆明湖上，向如画般的山水依依辞别……

历史不再回头

十年商战，千万大军前赴后继，奔杀在“钱”线。他们中有多少人还能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作家李德复以敏锐的视角，激越的笔调，给我们真切地展现了三个私营公心的亿万富翁创业史。

反共摩擦，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把这位“山西王”赶上吕梁山，蒋介石也用十万大军盯住他的后脑勺。他用联共策略，才保住了偏安的地盘。但在人民力量壮大时，他又讨好日本人，迎合蒋介石，在共产党头上踩上一脚……

我所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历史对这个时运不济的人物已生疏了。他当过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加入“托派”，坐过牢，患过精神病……时代大潮把他卷到一角。最后，一场车祸结束了一生。作者了解他，写出这篇动情的短文，给他画了个句号。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胡耀邦当了中央总书记，在全国走访了无数个县市。本文作者当年是中共地委书记，多次陪胡耀邦深入广西基层。胡耀邦那品德率直，博学强记，深得人心的事迹，如今一一记叙下来，仍感人至深。

女杰胡筠志难酬

彭德怀平江起义，她是联络员；湘鄂赣特委成立，她被选为常委。敌人围剿，她临产了，坐着箩筐指挥战斗。她当过红军师长，创作了大量剧本，还上台扮演过美国总统华盛顿。一场人灾降临，诬她为“托陈派”，被枪杀在自己人手里。

蔡畅和陈毅前妻赖月明的两代情

蔡畅在苏区一手培养的妇女干部赖月明，由她作伐嫁给陈毅。严酷的战争环境，使月明失去夫妻亲情。她历尽艰辛，54年后，才和已病入膏肓的蔡大姐聚首北京。

皖南事变后，陈诚看管叶挺

陈诚和叶挺，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军事人物，两人戏剧性般相逢，相识，相知又相争。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陈诚像曹孟德对待关云长一样，虽无上马金下马银，却也表现了不夺其志的义气。

下期要目

- △ 力挽狂澜：周恩来在一九六六
- △ 小平同志家乡父老情
- △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
- △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 △ 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何思源
- △ 姚雪垠对《甲申三百年祭》疑议
- △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革命情侣
- △ 天津卫“打”红杨小楼
- △ 我喜爱邓拓的诗
- △ 秦兵马俑2号坑发掘揭秘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20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 元

春秋笔

- ②4 反共摩擦 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穆欣
- ②9 阎锡山以父为质三次覲见袁世凯 徐崇寿
- ③1 阎锡山在台湾无可奈何的最后岁月 徐崇寿
- ⑤6 侵华战争从这里展开 刘宏伟
- ⑥2 皖南事变后陈诚看管叶挺 宅巍 德英

英杰谱

- ④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徐凤桐
- ⑧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孙鸿泉

殒星篇

- ⑥4 冯玉祥在重庆和蒋介石的争斗 于志恭
- ⑤1 女杰胡筠志难酬 李 锐

目 录

文荟园	⑦8 琵琶女艺术家吴蛮	杨闻宇
	①9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刘梦溪
读者窗	⑥0 毛泽东诗词手迹掺假了吗?	穆欣
古镜台	⑧7 唐贞观厉行精简勤政	官波舟
	⑧2 汉文帝提倡薄葬	王涛
遗闻录	⑤9 海燕事件——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	田方
	⑦0 黄伯韬殉葬记	李伟
古今谈	⑦4 武则天是怎样走向权力顶峰的	徐庆全
	⑧4 张学良的龙凤恋	纪流
赤子心	①4 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	杨颖奇
人海浪	③6 蔡畅和陈毅前妻赖月明的两代情	赖昌明
	②0 我所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陆立之
神州光	⑧0 中国一绝——万钟的彩蝶画	田闻一
时代风	④4 历史不再回头——记三个亿万富翁的私营公心	李德复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徐凤桐

引而不发的哲理

一次，周恩来向人们分析颐和园的得与失时说，这座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在清漪园的遗址上恢复起来的。如果当时她不用这些钱修建颐和园，而是让海军衙门为北洋水师购买军舰，继续和日本军队进行海战，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依我看来难以逃脱葬入海底成为一堆破铜烂铁的下场。

还有一次周恩来表示过如下意见，现在我们接收的中国版图，是清政府为我们创下来的，如果不是清朝而是明朝，中国的版图会怎么样呢？总理引而不发，任凭听者自己去想像引伸。事实上，满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防止颐和园再次遭到破坏，人民解放军以果断迅速的动作，在解放北京以前就首先控制了颐和园，并以此向城里发起和平攻势。当叶剑英把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用电波传到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时，他们当机立断作出向颐和园迁移的决定。也正是在颐和园这座充满民族文化气息的环境，他们运筹了新中国的未来。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凡有较大影响的外事活动，如：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伏罗希洛夫、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以及1949年的国共两党最后一次和平谈判，都是周恩来代表国家在颐和园进行的。那时，一些国内外的新闻机构，为了能及时报导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他们的视线始终关注着颐和园。就连周恩来生前进行的最后一次中美外交活动，也没有离开这座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古典园林。

石碑前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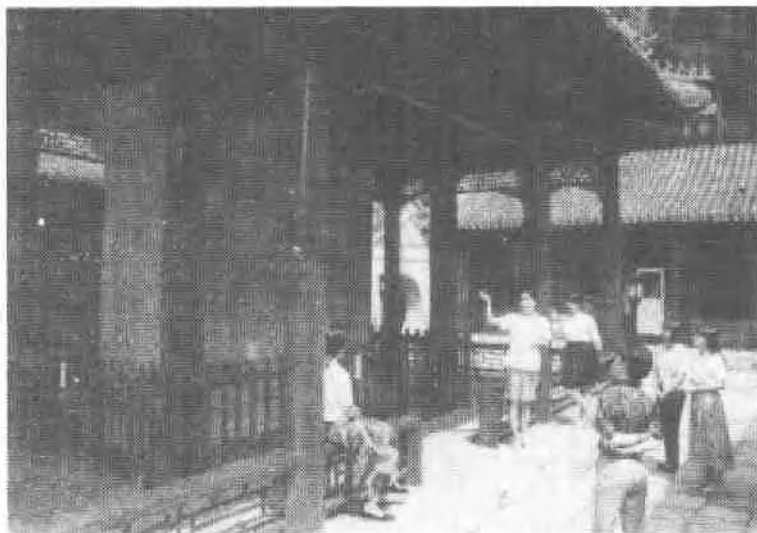
在颐和园长廊中部北侧，有一个叫“清华轩”的院子，在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曾数次来到这里。给人们印象较深的是他观

看“平定准噶尔”碑文的那一次。

1960年，中国和原苏联的关系发生逆转，“老大哥”实施经济制裁，加上别的原因，中国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建设项目下马，发展计划搁置，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都处在灾难的境地。接着“老大哥”在边界陈兵数十万，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政府针对这一系列的蛮横行径，针锋相对，和苏联举行了边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主持了这场艰苦的谈判。

为了在谈判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方查询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确凿的事实来证明，我方坚持的边界走向是有充分根据的。



周恩来曾在这里研究过平定准噶尔的碑文

竖立在颐和园清华轩院内的一块体量巨大稍有残破的石碑上，刻满了乾隆皇帝的御笔碑文。在中苏边界谈判正紧张地进行中的一天，周恩来来到这座石碑前伫立良久。他全神贯注阅读完碑文后，郑重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块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石碑，一定要好好保存，这里有中苏西部边界走向的有力证据。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石碑呢？

早在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用政治欺骗和武力要挟等强盗手段，把我国东部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强行吞并了。这块地区的面积，超过了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把原来属于我国的一条内河——黑龙江，变成了中俄共管的国际河流。他们在东段得手之后，接着就把黑手伸向了西段地区。

中国在新疆的中俄边界走向，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其北界是在巴尔喀什湖（现为哈萨克斯坦境内）以东约300公里的“斋桑泊”和以南约400公里的伊塞克湖划界，作为中俄两国西部边界的起点。不久，沙俄派兵不仅把巴尔喀什湖抢去了，还把相当于一个瑞典全部国土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俄国领土。

这个地区，原来一直处在清王朝的管辖之下，在清朝的一些档案里，把这里统称为准噶尔地区。这个地区由于民族混杂，加上沙俄的挑拨，经常引起内部战乱。清王朝在这个地区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去世，为争夺王位内部开始了动乱。1755年和1757年乾隆两次派大军出征平叛。使这一地区秩序恢复了正常。乾隆对这两次出兵极为重视，出兵前写了碑文，平叛后又写了一块碑文。在平叛过程中，他还写了不少



颐和园的长廊

首诗，其内容都刻在了清华轩内的那块大石碑上。这块石碑，已有200多年了，碑文完整，它像一位记忆犹新的老人，在向人们叙述那一页一页以往的坎坷历史。

周恩来在阅读清华轩的这块碑文时，是那般的认真，那般的动情。他联想到沙皇用武力抢占的这块领土，中国历代未曾确认，今天的苏联又想用武力强压中国就范，从石碑上涌现出来的好像已不是镌刻的文字，而是一把把利剑。周恩来从颐和园的碑文中又获得了知识和力量，他指示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中国政府绝不承认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苏边界走向，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来划定。对中国的武力威胁是徒劳的。

我画不了长廊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山洪爆发冲击着北京城。一些人数次跑到颐和园，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在这场大风暴中，这颗东方园林明珠是否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关心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们，都把希望的眼光集

中投向周恩来。

1966年下半年，北京城突然刮起一股砸牌楼破“四旧”的邪风。因为当时有一位“要人”说：“牌楼是镇压劳动人民的象征”。为保持古城风貌，特意保存下来的颐和园东宫门外过街牌楼，一时成了众矢之的。在陶然亭等处的牌楼被全部拆毁后，颐和园东宫门牌楼也搭起了脚手架，准备把它从上至下全部拆除。此情况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即通知有关人员：“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谁都明白，在那个因一言不慎而遭殃的年代，拆与不拆曾被说成是“路线斗争”。要顶住这股势如洪水般的冲击，不仅领导人要有胆略，一般群众也要有巨大的勇气。最后还是“必须保护”占了上风，脚手架立即被拆除。从此，这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一直屹立在颐和园门外。后来，它的影响不仅超出了北京城，而且冲破了国界。到了八十年代，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曾出巨资在其国内仿造这座牌楼。

颐和园后山有一座“香岩宗印之阁”，阁内的佛像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当社会上砸佛像的风刮到颐和园时，这些佛像也被立即送往废



1971年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秘密使者基辛格

品收购站，准备砸烂溶化冶炼。此事又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将佛像追回。当人们赶到现场时，铜像已成了碎铜，大家只好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如实地告诉了周恩来。从此，他就更加注意颐和园的动力了。

做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又是处在那种混乱的年月，一座颐和园究竟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大位置呢？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颐和园，他走得很快，边走边了解情况。当他走到长廊时，被群众围住了，人们向自己的总理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位女青年突然向周恩来发难：“总理，长廊上的彩画内容都是旧的，应该把它改一改。”周恩来立即把目光移向这位发难者：“你说怎么改？”那位女青年说：“把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画在上边，都是革命内容。”周恩来看了看周围的人立即反向道：“让谁来画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700多米的长廊上，共有各式各样的大小彩画14000多幅，包括山水、人物、风景建筑和花卉翎毛等，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要毁掉这些彩画，在周恩来看来是不堪设想

的。而对这位感情纯朴的女青年和在场的群众，他没有做正面回答，只是含蓄地说：“两万五千里长征，我是亲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都画不了，请谁来画？”

几句言简意赅的话，使在场的人们立即意识到，周恩来不同意改变长廊彩画内容，颐和园一定要按原貌保护下来。机灵的颐和园职工们略施小计，在长廊彩画上刷了一层很厚的大白，把彩画盖在了下面。大家心里明白，一旦这股风过后，将大白洗掉，长廊彩画还会重



英国首相希思在颐和园会见本文作者徐凤桐

见天日。结果没过多久，长廊彩画又以引人的姿容展现在人们面前。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对长廊重新油饰彩绘时，一些老油工师傅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长廊在哪里？长廊彩画又在哪里？”1978年，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到颐和园参观。在他的想象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颐和园这样的皇家宫殿不知道被破坏成什么样了。但是，当他走在被吉尼斯大全定为世界之最的这条长长的画廊上时，他脱口说出：“中国能把这样美的建筑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在不容易。”

小中见大的宏论

颐和园内有一个德和园，其中的大戏楼，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古戏楼。这座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不仅代表了我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因为京剧最后形成在这里，还被称作京剧的摇篮。1968年，一些怀着朴素的政治热情的人们，将八个样板戏的场景人物制作成模型，摆在大戏台上供人参观。他们以为用这种方法，既体现了让工农兵占领所有舞台

的政治要求，又完整地保护了这座重要的历史建筑，是个一举两得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化是难以用朴素的感情对待的，八个样板戏所包括的政治内容，在当时远比它本身的故事情节更复杂、更深刻。就在这时，周恩来又来到了颐和园。当他看到颐和园这种不伦不类的展览后，用非常深沉的语调说了八个字：“热情可嘉，考虑不周。”

1969年夏天，周恩来来到颐和园，发现荷花长势不好。后来他了解到水位忽高忽低是由于密云水库供水原因影响荷花的正常生长。他多次提醒我们：“保护昆明湖，河湖要分流。”

河湖分流大型水利工程动工了。这项工程，从1974年动工，历经五年全部按设计要求完成。从此，昆明湖的水源有保证了，水位也稳定了，千万株荷花，又重新在昆明湖中争奇斗艳。

1971年，以搞秘密外交轰动世界的风云人物基辛格来华，周恩来选择了颐和园与其会晤。当时美国的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又因台湾问题而有些左右不定。周恩来用什么来形容美国的这一外交状况呢？就是在这次会见时，周恩来把美国的对华政策比作“小脚女人”。当翻译把这一比喻形象的告诉基辛格后，这位秘密使者开始笑了。周恩来就是借助颐和园这个独特的环境里，用中国优秀的园林文化精华为衬托，巧妙地借用“小脚女人”这一风趣的比喻，使这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外交行动，变得更富于东方民族的戏剧化风格。后来，不少西方报纸以头号新闻报导说：“周恩来在北京郊区一座风景迷人的皇宫里会见了基辛格，他们面对这座饱含着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豪华宫殿，谈笑风生，纵论天下。”

“谁不说俺家乡好”

1975年夏天，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从医院又一次来到颐和园。他们先在园内慢步行走，后来又乘坐画舫在湖上游览。被病魔和“四人帮”折磨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脸色苍白。他已感到此次昆明湖乘舟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了，面对美好的湖光山色，他陷入了沉思。

“小张，你给我们唱支歌好吗？”

周恩来对陪同上船游览的颐和园的女服务员，突然提出了这一要求。

小张是颐和园普通的女职工，从五十年代以来，曾多次在颐和园为周恩来作过导游，她对周恩来既熟悉也随便。她很少唱歌，她发现总理的眼睛一直深情地望着她，她立时不由自主站起来说：

“好吧，我今天给总理唱一支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说完张口就唱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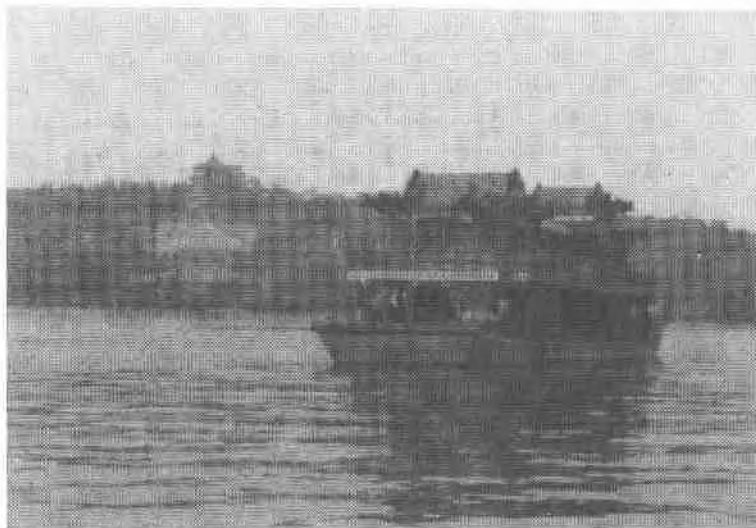
“一道道青山紧相连，一道道白云绕山间，……谁不说俺家乡好哇……”

歌声和桨声在昆明湖上飘荡，仿佛把他带回那过去的岁月……

这时，邓颖超把从医院带来的食品拿出来，提醒周恩来该吃东西了。他把邓颖超削好的梨接过来递给了小张。接着他又拿了一个水果，很吃力地站起来向正在摇桨划船的颐和园的船工走去。周恩来记得很清楚，他每次来颐和园，在昆明湖上乘船，几乎都是这位船工师傅划船，他们在这个水面上，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有一次周恩来在船上会见地质部、石油部等单位的一些负责人和专家，就加快开发大庆油田一事进行研究决策，就是这位船工师傅，很机智地把船划向后湖一个既僻静又安全的地方，使周恩来顺利地召开了这次小型会议。现在，在这位多年为他撑船的师傅面前，想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他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是让邓颖超把带来的食品，能分给这位船工师傅吃。

黄昏时分的颐和园，夕阳余辉下碧水似镜，青山如黛。只有周恩来夫妇等几个人乘坐的小画舫，在两只长桨划动下，从知春亭一带的水面向十七孔桥划去，绕南湖岛一圈之后，又向西堤的玉带桥方向驶去。他是在最后地领略这如诗似画般的景色。

（责任编辑：刘文）
（徐凤桐：颐和园园长助理）





胡耀邦在广西给地方和军队干部做报告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 孙鸿泉

胡耀邦同志对广西十分关怀，他曾七次来广西，三次在南宁过春节。

七访八桂 走遍山乡

1934年，他在中央苏区担任

中央少共秘书长时，随红军长征，在三军团做过民运、宣传工作。途经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这是他第一次到广西。

第二次是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于1958年跨1959年，我陪他在广西转了一个多月，在南宁看了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机械厂等单位，到宾阳看了改良土壤，到贵县看了贵县糖厂，还看了桂平的罗播公社、玉林的山心炼铁厂、北流的少年之家（他回北京后还送给这个少年之家一台大收音机）。经容县又到岑溪，看了卫生村南渡，经苍梧到梧州看了市人民医院、共青团水电站等单位，到贺县看了平桂水岩坝锡矿和西湾煤矿，路经钟山，在平乐、阳朔各住一夜，然后到桂林、柳州、宜山、罗城等地，以后就去贵州去了。

第三次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于1980年10月，他先到了云南省的大理、保山、思茅、西双版纳、曲靖、红河等地，又到了贵州的六盘水、安顺，于29日到田林、百色，30日到北海，看了养虾、养珍珠，31日到钦州，看了地区林科所的科研新成果——组织育桉树苗，当天到南宁。

第四次是1984年春节，他先到凭祥，上了中越边界的法卡山，再到宁明，回南宁，在邕宁县农民家里过的除夕，然后到桂林。

第五次是1985年年底，他从广东罗定县到岑溪县。

第六次是1986年春节前，他先到云南曲靖、贵州兴义等地然后到天生桥水电站、隆林、百色，原本打算到天等、隆安等县，因患重感冒未能成行，身体稍好一点，就又到了北海、钦州、防城县、防城港等地，在南宁过的春节。

第七次是1989年元月8日到3月13日，在南宁养病，过春节，并第三次去北海。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方面调查研究，一方面做报告，在和干部群众座谈时，还不断地插话、发言，气氛十分活跃。1958年他在南

宁、玉林、梧州、桂林、柳州、宜山的各界青年大会上做了报告，并在团县委书记以上的团干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号召青年听党的话，辛勤劳动，发奋工作，扫除文盲，向科学进军，向农业高产进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改变落后面貌，逐步改善生活条件，他特别强调不能茅草房子万岁。1984年他在宁明对党政军干部做了报告，1980年和1986年他在南宁分别在厅级以上干部和副省级以上干部会讲话。他的每次报告都是用生动的语言，深刻地哲理，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材料，典型的事例，科学的对比，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给广西党政军干部和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廉洁勤奋 深入基层

耀邦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等有关勤政、廉政的文件。据我所知，他从解放初期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叫富强小胡同只有数间旧房的小四合院（还没有南房），1985年他才搬进中南海靠街的一座旧平房里，直到他临终前，不坐进口汽车，每次到外地视察，也是轻车简从，不带保健医生。1980年他到北海前，先通知了五条约法：一、不准站岗放哨；二、不准请客送礼；三、招待所不管住着什么人，都不准清理搬家；四、当地有什么汽车就坐什么汽车，不准从外地调好车；五、只地委书记一人到直升飞机停机坪迎接，不准人多，更不准组织欢迎队伍。我们地委都一一按照他的交代行事。吃的

是真正的工作餐，一天我们还收他每人二元钱的伙食费，当时物价很便宜，螃蟹才一元钱一斤。地委行署当时最好的车就是一辆天津产的面包车，车门还关不紧。当耀邦同志将要登机赴南宁时，来看直升飞机的群众才看见是胡耀邦同志。我说，你看，群众都想看看你。他说，好嘛，看吧！他频频向鼓掌群众招手致意。1989年他在南宁休养期间，元月10日我和我爱人到西园饭店去看他，送给他四个自己屋边种的大木瓜，他用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苹果招待我们，临走时，再三让我们带走，我们推辞不了，只好每人拿了一个。他风趣地说，你们太老实了，才要一个，要是我呀，就全部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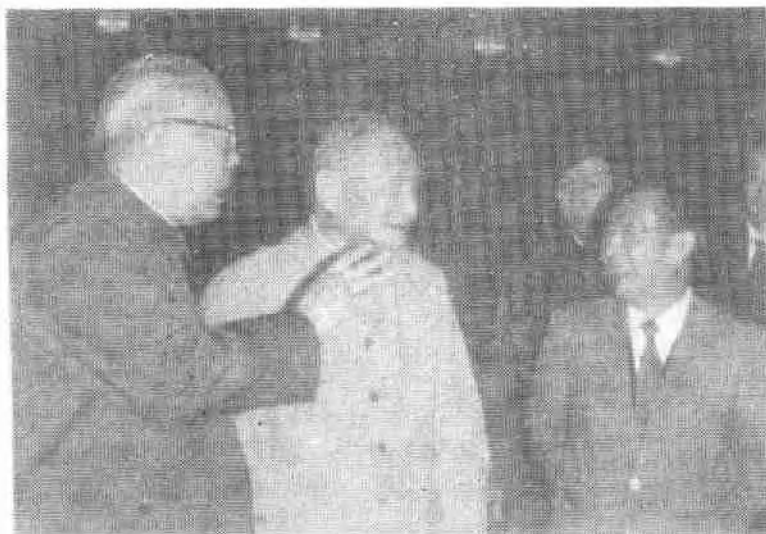
耀邦同志超常的勤奋，不是日以继夜忘我地工作，就是不断地下来调查，接触群众。除西藏的个别地区外，他去过全国所有的专区。全国2000多个县，他走了1600多个，不知到了多少个工厂、农村、军营、学校、机关。有的地方他还去过二遍、三遍、四遍。他下乡多是坐面包车，有时就在汽车上啃面包。就拿1980年来广西那次来说吧，他已经在云南、贵州跑了很多地方，原定从安顺乘直升飞机到百色，后因降雨，直升飞机不能起飞，他又急于到广西，就改乘汽车，10月28日晚上8时从安顺出发，连续坐了17个小时的汽车，于29日下午1时抵达田林县旧州镇，在旧州只吃了一碗米粉，还连声说：“好吃！好吃！”经过田林县，和县委的同志座谈了一个小时，到达百色已是下午6点多了。当晚百色地委、军分区的领导向他汇报，第二天早上继续汇报，然后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于当日中午到达北海，下午就去看养虾场和养珍珠，晚上北海市委、北海航运局等单位向他汇报。31日到钦州，我代表地委向他汇报，下午3时看了地区林科所，然

后飞抵南宁。11月1日区党委领导向他汇报，2日在西园给厅局级以上干部做报告后回京。从这个日程可以看出，他安排得多么紧张呀！

博览群书 重视调研

耀邦同志少年时期参加革命，上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他那渊博的知识，看问题的深远，内政、外交、理论、实践，运用得那样熟练，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的结果。他博览群书，勤于实践，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部通读一遍，不少文章研读二遍、三遍，甚至十数遍。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各种理论、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历史地理、国际知识，各种报纸无所不学，无所不看。连全世界有多少种树，有多少种狗，他都讲得出来。他的主要消费是买书。有一次我问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他饶有风趣地说，我是个“杂家”，“三教九流”都爱好。我又问他怎么连数字都记得那么清楚，不要稿子就可以冲口而出？他说，没有什么奥妙，就是我看以后就讲给别人听，讲的多了，在脑子里反复多了，就记住了。

他每逢外出，必带一部大《辞海》、一本大地图和其他需要看的书。1958年他一到南宁，坐下来就问为什么叫广西，我们谁也答不上来。他于当晚看省志看到凌晨3时，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五岭以南曰广，在东面的叫广东，在西面的叫广西。他还问，谁能说出太平天国广西籍的青年将领的名字，见没人说话，他就一点点出，李秀成呀，陈玉成呀等等。每到一地，只要住一夜，他要看看县志到深夜，了解当地物产、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讲话时，就把当地的情况引上了，使人感到非常亲切。他如果看累了，就叫秘书看，第二天在汽车上给他讲。到了北流县，他说有个南流江，又有个北流江，北流县就是因北流



1984年10月12日，胡耀邦和陈云、李先念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

江而得名，使人感到他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到了梧州，他又问，过去这里为什么叫苍梧？现在为什么叫梧州？是哪一个卖国条约把梧州辟为商埠的？

1980年在北海，谈及1958年我们做了不少错事时，我说，我们的水利大部分是1958年修的，不然的话，今年大旱，老百姓就要拿讨饭棍了。他当时没说话，在南宁做报告时，他说，我到贵州，他们说公路大部分是1958年修的，你们广西说很多水利是1958年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在讨论，还没有最后定稿，我看，写到五八年这一段时，结论要客观。耀邦同志在报告会上还大讲调查研究。他说：“只有好好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只有搞调查研究，才能解放思想；只有搞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搞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貌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我说，附加一分，唯心主义就加一分，你的错误就加一分。只有搞调查研究，才能严格地按唯物主义办事。”他还讲了不少搞调查研究有五大害处：

第一，容易受骗上当；第二，容易听信谣言；第三，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第四，容易看错人；第五，容易思想僵化。说得多么精辟呀！

力戒浮夸 实事求是

1958年，北京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就到了，马上就到了，明天就到了。耀邦同志针对这一错误的理论，在南宁做报告时向青年们提问，国民收入每人一天一块钱的共产主义你们要不要呀？台下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他接着说不能要，要物质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叫共产主义。

那一年，我陪他到桂平县参观“共产主义大学”时，看到“食品学院”是个卖稀粥的，“中医学院”是个草药店时，为了不给群众泼冷水，他没有说话。当我们到了玉林地委招待所时，地委副书记里林同志问耀邦同志看了哪些地方，我代耀邦同志做了回答。里林同志马上说：“耀邦同志，你看的地方有点浮夸吧！”当时耀邦同志没有说话。当我们离开容县坐上汽车时，耀邦同

志对我说：“这个女同志真厉害，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以后耀邦同志每次见到我，总要关心的问里林同志的情况。

当我们的汽车走到岑溪县境内，看到一条标语——“放开肚皮吃饭”。耀邦同志说：“不生产你怎么吃饭呀！我给你们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后来他想了想又说：“还不够准确，我再加上两个字，叫做‘继续鼓足干劲生产，准备放开肚皮吃饭’。”

一次，他向我问及刘三姐家乡的那个团县委书记，他说，这个人实事求是。1958年上级要求推广双季稻，她说，很多旱田没有水，不能种双季稻，那个时候，她敢于说真话。时隔20多年，对一个团县委书记的事还记得那么清，可见他的实事求是是精神之深。

1980年他在广西视察时，百色地委负责人向他汇报，当汇报到有些搞包产到户的队，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共同经营工副业生产时，耀邦同志说：“即使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也要提倡合作化初期的那种自愿互利、互助合作的精神。对包产到户的地方，如果不加以引导，虽然粮食可以增产，但多种经营、工副业都没有了，大多数社员还是富裕不起来。”

在北海，他下了飞机，坐上汽车去招待所的路上，我对他说：中央关于发挥优势的方针无比正确。我先不给你讲我们的优势，先讲我们的劣势，一能源、二交通两根绳子捆住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手脚。能不能给我们恢复防城港和南防铁路的建设。他当时脑子里装的是出国的人来说的高速公路，他说，你光想修铁路，修铁路花钱多呀，修高速公路不行吗？我说，我没有调查，也没有计算，沿途都是丘陵，切平了修高速公路，恐怕钱也少花不了。他没有答应，但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那天下午，视察后回到

招待所，他把我叫去，摊开地图，问我防城港在什么地方，南防铁路多少公里，需要多少钱，我一一做了回答。在钦州到南宁的飞机上，他对周光春书记说：“光春同志，回到南宁你把斯大林全集给我找来，看看俄国人是怎么修铁路的”。11月1日，耀邦同志在和区党委领导谈话时说：要考虑挖掘我们劳动力的潜力。我在想，俄国沙皇时代，从1880年到1890年10年时间，就修了10万俄里的铁路，到底他们用什么办法搞起来的？那时的俄国，一个是沙皇统治，一个是地广人稀，他们能搞起来，我们为什么搞不起来？搞动员民工的办法，一要给他报酬；二要搞定额管理；三要给技术指导。

当区党委领导向耀邦同志汇报1980年粮食增产情况，说个别地方可能留有余地时，耀邦同志说：“可以，允许下面留点余地，留一手，甚至留两手也没关系。”所有这一切，表现出耀邦同志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

心怀群众 嘘寒问暖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联系群众，

经常和专家、教授、各级干部、工农群众、青年学生联系，深入各地开座谈会，访问群众家庭，个别促膝谈心。就是在“文革”期间，他被“打倒”，“靠边站”的时候，也不断地接待群众。当时，他的家里人员来往很多，真是“门庭若市”。去看他的有解放军官兵、共青团干部、劳动模范和各方面人士。1974年8月我去北京，抽空去看看耀邦，他请我们吃便饭。一见面，他就讲了一句笑话：“老孙，你胖了，凭你这一胖，就说明你们广西形势大好呀！”他接着说，“听说你挨整了两年半呀！你现在的在桂林地委做副书记。”听了这几句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我的情况他都知道，可见他对干部是多么关心。当时去看他的还有他原来部队的一位老师长夫妇，他长期在西藏担任地委书记，比耀邦同志年龄还大，称耀邦同志“青年首长”，他说，我这次到北京找了二十天才找到你这个“青年首长”。我和你接触并不多，只接触过两次，但印象太深了。成都解放后，上级叫我们部队进军西藏，其他首长怎么动员我们也不想去，你这个“青年首长”一动员，我们思想就通了。所以这次



胡耀邦视察云南

来北京，我非找到你不行，说你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也想不通。

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只是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担任总书记期间，每星期只回家两小时。他除处理公务外，就是和老师、学生、干部、公务人员、炊事员聊天、谈心。1985年，他搬进中南海，为了联系群众方便，他选了一座靠街的、也没有单独院落的普通平房，在胡同里有个便门，要见他可以不经岗哨，从便门直接进去。

1984年春节，耀邦同志提出到农村看看，自治区原来安排到武鸣县去，耀邦同志说：“武鸣县你们早准备好了，我要到邕宁县去。”到邕宁县后，他又提出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去走走，并说不要选最好的看。县里的同志就安排到龙岗村，耀邦同志一行随意走进农民杨振怀家。在问了杨家的生活情况后，还亲自看看米缸里的粮食满不满，用手摸摸床上的棉被厚不厚，打开立柜，数了数有多少件新衣服，数了数猪栏里有多少头大肥猪。看后他说：你是个干部家庭，还不能代表一般农民家庭生活水平。耀邦同志从龙岗出来后，又驱车来到良庆

公社玉洞大队新村坡，信步走进老农民玉正萱家，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生活情况。察看了他的住房、床铺、衣服、米缸、牛栏、鸡舍，并在玉正萱家吃了过年粽子。他还了解这一带饮水困难，荒山少林……。1989年春节，耀邦同志在南宁休养时，还没有忘记这两户农民，让县委书记陪同杨振怀、玉正萱来西园饭店拉家常。当他们来到耀邦同志的住房时，耀邦同志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边，关心地问杨振怀：“你们村的饮水问题解决了没有？”杨振怀答：“县里拿了一点钱，农民拿一点钱，现在水井已经打好了，人畜饮水基本够用。”耀邦同志说：“这样就好，县里多办点实事，为群众解决些实际问题，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接着耀邦同志又问粮食生产情况、造林如何等等。会见结束时要照个相，县委黎书记说，耀邦同志身体不太好，我们就照一张集体相算了。耀邦同志说：“民主一些嘛，征求大家意见，看看怎么照好。”杨振怀等说，除了合影外，还想和耀邦同志单独留影。耀邦同志很愉快地答应了，与每个人单独合影留念。

耀邦同志首先提出扶持全国

贫困地区的工作。1986年，他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云南、贵州、广西的贫困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又一次到这三省区进行调查，本来他打算到我区的天等、隆安等县调查，不巧，到了天生桥电站他得了感冒，发高烧到39度多，只好作罢。稍稍恢复，又到北海、防城港等地视察。然后听取三个工作组和云南、贵州、广西领导的汇报，于2月19日在汇报会上作了关于扶贫的讲话。他说，1984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出了关于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现在的问题是要狠抓落实。最重要的是，选准目标，集中力量，每年都要使一些贫困县、区的绝大多数群众实实在在地增加一些收入……。先进地区对贫困地区要“一带二帮”，“带”就是要搞好协作，带动致富；“帮”就是要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号召和选派一批有志于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穷的、责任心很强的党政干部和技术人才，自觉自愿地轮流到贫困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扶持贫困地区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加强贫困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高贫困地区自身“造血”的功能。

关注广西 情意殷殷

1980年我要求耀邦同志恢复南防铁路和防城港建设。作为党的总书记他不好直接答复，但他却记在心上。第二年，他派煤炭部部长高扬文、铁道部副部长布克、交通部副部长陶琦等人来防城港和钦州考察。来了以后，高扬文说，我在全国跑了很多港口，像这么好的港口不多，你们广西在“文革”以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建了七个万吨泊位，很了不起。布克同志看了和听了汇报后说：关于修南防铁路，我在北京是投反对票的，老孙，请你放心，这次回北京，我一定投赞成票。后经国务院批准，南防铁路



1984年10月30日，作者陪胡耀邦去北海养虾场

于1983年开工,1987年元月全线贯通。1984年4月,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十四个开放城市的会议上,还说恢复南防铁路的建设是正确的,因为他几次考察都想给西南找个便捷的出海通道。

1980年,在北海、钦州听了汇报后他说,钦州地区19800多平方公里,2970万亩地,369万人口,山、水、田一起每人平均7亩,海域还不知有多大,北部湾的气候好,海岸弯弯曲曲,滩涂很多,加上河水,这水可是宝呀!我算一算,一个水电、一个水运、一个水灌、一个水捞(捕捞)、一个水养、一个水游,水上可以搞旅游。就拿养殖来说吧,有几十种东西可以养殖,海参、大蚝、珍珠、虾等等,都可以养,你们确定捕捞养殖并重,逐步过渡到养殖为主的方针是对的。他接着又说,钦州这个地方算是全国第一流的自然条件吧?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在若干年后达到全国第一流的收入、第一流的生活水平。你们规划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搞到人均有粮1000斤,人均产糖100斤,人均产果100斤,人均产肉类100斤,人均林产品搞到100元,一个1000四个100。搞到这个水平,劳动是很紧张的。生活怎么安排?文体体育怎么安排?教育卫生怎么安排等等,都要全面考虑。

在耀邦同志来到北海之前,我对北海市委书记梁国乐同志说,耀邦同志很平易近人,你不要拘束,有什么就讲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讲。那天吃罢晚饭散步时,梁国乐对耀邦同志说,北海人很热爱自己这个地方,调都调不走,在外面工作的还想回来,他们说“千海万海不如北海”。我说,这北海解放前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归合浦县管,合浦古时是廉州府。当地人还有一句话,叫做“千州万州不如廉

州”。在南宁耀邦同志讲话时说:“这次到北海、钦州,碰上一个熟人,孙鸿泉同志。他偷偷和我讲了两句话,就是有人讲‘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在钦州编了一首打油诗,当时考虑讲大话不好,没有说出来,现在我忍不住,还是说出来,就是‘千州万州钦州好,田上山水都是宝,三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少不了’。”然后他指着我说:“老孙,这是鼓励你们的意思,你们搞四个五年也可以。”

1981年,我们想办个珍珠公司,有关部门没有批准。不晓得是谁把报告寄到耀邦同志那里去了,耀邦同志批示:“晓光、应机同志,像这样的事,你们区党委、区人民政府完全有权解决。”珍珠公司就此办起来了。

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头有关部门只提出13个城市,耀邦同志建议再加上个北海。1989年,他在南宁时我对他说,北海人很感激你,是你提出北海开放的。他说,是中央集体决定的。我说,开始是13个,北海是你加上去的呀!他总是说是中央集体决定的。

耀邦同志在1980年、1986年的几次讲话中,希望广西尽快改变面貌。中心要抓住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或者说一个叫安全团结,一个叫发展经济。他说,广西有236000多平方公里,等于一个罗马尼亚,他们是237000平方公里,广西的海域比罗马尼亚大。广西有第一流的气候,第一流的资源,并指出在全国五个自治区中,广西、宁夏应当先翻身。应当发挥广西的水能、亚热带作物、矿产资源、林业、牧业的优势,发展乡镇企业。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



胡耀邦在法卡山

要。他号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话、高指标万万不能搞,但也要防止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在总结“文革”后的情况说,我们受了一场大难,好比一个人患了一场重病。大病之后不能乱投医,吃补药不行,吃泄药更不行,何况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医治这场病,快也快不得,慢也慢不得,急也急不得,缓也缓不得,重也重不得,轻也轻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他希望各级干部:一要加强调查研究,二要加强革命团结,三要加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四要加强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

耀邦同志已经逝世5年了,他的这些教导仍然记在我的心中。

(原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春秋》)

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

● 杨颖奇

蒋鼎文放言：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均是“中国伟大人物”

1947年2月，正是中国内战炮火连天的时候，国民党要员蒋鼎文忽然在美国发表谈话，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均是“中国伟大人物，希望他们推诚合作”云云。此论一出，颇引起国际舆论注意，纷纷探究其详，并特别注意陈嘉庚本人对这一谈话的反应。

一天，陈嘉庚在新加坡答记者问时说：“我虽年老尚有自知之明，安敢与蒋、毛二公相提并论？……二公所能者，我则绝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

行与否耳。我自信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其他军事政治则全不谙。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若毛主席与蒋委员长，更大不相同。其为人言信行果，经纬才干，我国无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

陈嘉庚此段坦诚披露，真真切切反映了他的亲身经历：

蒋介石五十大寿陈嘉庚敬送厚礼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正在南洋从事实业的陈嘉庚，认为这个政权是孙中山缔造的，已经得到国际上一些重要国家的承认，自然是正统的中央政府，国民应当乐从，便确定以“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作为他创办的《南洋商报》的办报规则，又与他人联名致电居留德国的汪精卫，劝汪不要反对南京政府。陈嘉庚便成为南京政府的拥护者，蒋介石政治上的支持者。

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两广事变爆发。陈嘉庚眼见外侮日迫，心急如焚，几次打电报给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等，劝告他们拥护中央政府，万万不可内讧，自相交战。

同年秋，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50寿辰，请陈嘉庚发动南洋华侨捐款购机祝寿，最初只希望能够捐得10万元，购机一架便是幸事。但陈嘉庚出于爱国动机，积极领导华侨“购机寿蒋”，竟捐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机10多架。望着如此丰厚的“寿礼”，蒋介石自然笑逐颜开。

抗战爆发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捐款总数便高达二、三亿元。另外，还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积极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募集款项。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华侨汇款即达11亿元，仅南洋华侨捐款就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这对于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

陈嘉庚感慨：陪都重庆虚浮之实



1939年的陈嘉庚

陈嘉庚拥护蒋介石,真诚地希望祖国统一,在抗战中更希望全国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团结抗敌。而蒋介石则鉴于陈嘉庚在华侨中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号召力,亦很看重他。与此同时,陈嘉庚对毛泽东与共产党却并没有多少了解。他所听到的是共产党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恶意攻击的话,抗战中又屡闻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磨擦”等国民党蓄意挑拨之言。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1940年春,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同时,自己亦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亲自回国实地考察国内团结抗战情况,并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陈嘉庚回国慰劳,蒋介石非常重视。在重庆一地,即准备了8万元经费用于接待,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以博取陈嘉庚这位“大财神”的欢心。不料陈嘉庚对这样的奢侈应酬十分反感,认为在全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时候,这样铺张浪费极为有害,而且还会引起各地竞相攀比。因此,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敬请政府及社会见谅。

抵渝不久,陈嘉庚便去拜见蒋介石夫妇,表达华侨对这位“抗战领袖”及全国军民的慰问。蒋介石心情愉快,谦恭地细听他的讲话。当陈嘉庚说不久将献一件南侨总会赠的“万世永赖”纪念品致敬时,蒋介石连忙摆手说:“噢!不必送东西了,你老人家来了,比什么都还宝贵”。

蒋介石设宴招待陈嘉庚。恳切地询问对重庆有何观感。陈嘉庚回答说:“余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工厂又还未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意见,惟市区人力车及汽车脏污不堪,与马来亚大不相同。”蒋介石一听,马上掏出笔记本,仔细地将此意见记下,并即刻下令全市各种公用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脏污必须洗刷干净。

蒋介石听说陈嘉庚平素俭朴,因而在招待时特地只用四、五样菜加些面包酬宴陈嘉庚和慰劳团,同时还下达两道手谕:严禁公务员酬宴;惩治开宴的茶店或酒楼主人。

陈嘉庚在重庆的这些天,国民党党政机关对他可谓招待周到,恭维至极。但陈嘉庚并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听,于是发现了在好听言词掩盖下的另一面——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若土;政府要员贪污腐化,偷窃外汇,连行政院长孔祥熙竟也开办起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而监察院并不过问。另外,大街上男着长袍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酒楼菜馆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



1949年的陈嘉庚

理乏精神;报纸版面少,箝制甚严密等。陈嘉庚认为,仅举此外表数事,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而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者,与全国处于抗战艰难时际甚不适合。

蒋介石告诫他:勿受中共欺骗。陈嘉庚愤称:这简直是拿我当三岁孩童看

陈嘉庚对重庆的许多现象感到失望,私下感叹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论年龄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吧,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更让陈嘉庚焦灼揪心的事情,就是国共两党间矛盾日深,磨擦加剧,这可直接地威胁到国内团结抗战的大事,广大侨胞可不愿看到国内分裂再现、内战再起啊!陈嘉庚想着,有必要亲到延安访察,以了解毛泽东及中共对抗战的态度。

一次,陈嘉庚出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欢迎茶会,在致词中坦诚希望国共两党以救亡为前提,竭力避免内

战，合作抗战到底，以免海外侨胞痛心失望。茶会中，陈嘉庚向叶剑英提出，想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蒋介石得知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颇受震动，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

5月初，蒋介石夫妇在成都邀同在成都的陈嘉庚共进午餐。餐罢蒋介石试探地问陈到成都后是否他往，陈答将去兰州、西安。再问还有别处否，答延安如有车通，亦欲前往。一提延安，蒋介石便借机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背义无信。并说要去可以，但不要受其欺骗。陈嘉庚心中不快，认为蒋介石简直是拿他当三岁孩童看。

陈嘉庚在成都逗留数日，深深感到由蒋介石自兼主席的四川省，在政治方面糟糕至极。据访查，该省的钱粮已征至民国70年（1981），简直是骇人听闻。

5月26日，陈嘉庚一行在兰州等处进行慰劳活动后抵达西安。次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访见陈嘉庚，并请他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吃午饭，陈欣然应允。

毛泽东告诉陈嘉庚：我薪俸有限，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5月31日，陈嘉庚一行乘车抵达延安。

6月1日上午，已回延安的朱德及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从女大出来上车时，陪陈嘉庚回国慰问的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头部不幸碰到车门，流血不止，即送往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陈嘉庚原计划在延安逗留三四天，这下因李治伤一时走不了，于是便有了较多时间来深入了解延安。

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磨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作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的、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所以，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还击，这样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民主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同敌人妥协和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统一战线必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被葬送。毛泽东诚挚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为

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之后，毛泽东设晚宴一席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适值风来，纸被吹走，索性弃之不用。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却吃得舒心、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拜访陈嘉庚，或同午饭，或共晚餐。谈话间，陈嘉庚再提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件，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磨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作，而中央多为误信，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慨然应允，心中已自思量，凭着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了延安界，要是有人问起延安情形，即当据实报告。

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了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遂将烟火摁灭，见客回来后又把那半截烟蒂点燃吸完；毛泽东单独请陈嘉庚一行几人吃饭时，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解释说：“我薪俸有限，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此情此景，陈嘉庚大为感慨，钦佩至极。联想到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一级大员，可是当门口传令兵长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陪客立刻全体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喘。等到蒋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方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座，正襟收视，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两相对比，差距可谓大矣！

陈嘉庚耳闻目睹：延安没有“共产共妻”，没有“破坏抗战”

陈嘉庚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安实际情况，还亲自走

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结果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有看见有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应酬，浪费交际的奢侈、浮华现象。

陈嘉庚还在同边区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种地赋税很轻，一亩地至多抽7斤半粮，其它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粮种菜，既保证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予以严惩。陈嘉庚还注意观察男女间之关系，发现男女行路来往，坐谈起居，都自然有序，表现正常。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登记即可。

陈嘉庚是很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多次畅怀交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结果所闻、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下陈嘉庚心里才踏实了。

陈嘉庚延安之行，实地了解到延安的真象，正如他后来所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段发自肺腑的话，的确道出了陈嘉庚的心声。

6月10日，陈嘉庚一行渡过黄河到山西吉县克难坡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晚出席阎锡山招待宴会。宴席间，陈嘉庚仍牵挂国共磨擦事，提到在重庆时白崇禧欲调节磨擦。不料阎锡山竟郑重地说：“此非根本办法，国民党政治须实行改善，则共产党自无效用，否则虽无共产党反对，他党亦能起而反对。”此话出自国民党要员之口，陈嘉庚甚感意外，认为这是“至情至理，金石良言”，真正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蒋介石赠杖陈嘉庚， 自己徒手登坡行

陈嘉庚回到重庆，往见蒋介石。未等及多谈到西北等地考察慰问情况，蒋介石便面红气盛地大骂共产党：“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陈嘉庚见蒋如此动怒，便不再多言，只说依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可待胜利后解决。

这次谈话不甚融洽，蒋介石或许有些后悔，第二天又特邀陈嘉庚至重庆黄山蒋介石别墅吃午饭，何应钦、白崇禧等党政要员陪席。席间，蒋介石似特别兴奋，他把陈嘉庚拉坐至自己身边，频频斟酒加菜。饭后又留陈在客室相谈中外事。言谈间，蒋介石忽然问陈嘉庚：“到国内对国民党观感如何？”陈嘉庚回答：“国内国民党事，实在不能回答，对于南洋却知大概。”于是，陈便数说南洋国民党人贪贿腐化，拉帮结派诸事，已引起多数华侨不满。若中央派人去视察，亦为谄媚奉迎者包围，终日应酬，难察实情。蒋介石听道这里，当即吩咐海外部长吴铁城说：“此后派人往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

正谈话中，防空警报骤响。众人下坡急往防空洞躲避，仓促间陈嘉庚忘带手杖。一小时后警报解除，众人复又登坡回返。蒋介石见陈嘉庚未带手杖，便将他的手杖送陈。陈力辞不获，只好收下助步，而蒋介石则空手



1949年6月陈嘉庚在北京会见毛泽东

与夫人宋美龄挽手而行。此情此景，当时确令陈嘉庚感动，认为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厚意，当终身不忘。辞别时，宋美龄再三向陈嘉庚致意，希望华侨多捐助难童费，陈嘉庚欣然应允。

7月30日，陈嘉庚乘飞机到达昆明，想到几日前会见中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由此而更关心国共团结抗战事，于是，便作一函，航寄蒋介石，内称那日会见钩座对我痛骂共产党，如果说要消灭共产党，那就是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外汇金钱必为减缩。国共间事，还是要在抗战胜利后解决。这些要求完全是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

陈嘉庚明白了：福建苛政之根源，尽在蒋介石身上

陈嘉庚在昆明、桂林等地察访期间，不顾国民党有关方面的提醒、告诫，或公众演讲，或答记者问，或私下交谈，均如实报告到西北考察观感，公正评说中共所行政策，愤然抨击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当有“好心人”告诉他，凡“不利国民党者，请注意勿言”时，陈嘉庚答称：“余天生好直言不欺隐，勇于负责，不怕威胁。”此次“因公回国，非个人游历，为爱国热诚，嫉恶好善，不能附合潮流。”

9月初，陈嘉庚转赴东南诸省察访，仍一路发表回国观感。21日，在金华接重庆友人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已决定三项措施：1. 由何应钦电知东南各省，监视陈嘉庚的行动；2. 通过新加坡总领事馆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禁止陈嘉庚回新加坡；3. 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消除陈嘉庚的影响。陈嘉庚对此举措一笑置之，认为“这于个人并无所损，而所损者义捐外汇耳。”并且华侨也不会那么容易受骗，所以这三项计策必定失败。以后事情的发展正如所料。

陈嘉庚在福建一路考察、了解，深深体验到家乡民众的凄惨生活状况，政府官吏的恶政行为，非常痛心和愤慨。他认为，诸种弊端之根源，皆在任省主席的陈仪身上。于是，多次致电蒋介石，告陈仪重征田赋、统制运输等祸闽情状，但久久不见回音。有人要陈亲往重庆见蒋乞求，陈嘉庚说：“在重庆已见蒋五六次，已明白其为人，虽十次亦绝对无效。”果然在12月8日，已起程返新加坡的陈嘉庚，途中在云南芒市接到蒋介石的回电，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读罢电文，激愤至极，原来福建苛政之源头，尽是在蒋介石那里，难怪陈仪有恃无恐，如此还有什么理说？这样，陈嘉庚对蒋介石便彻底绝望，不抱任何幻想了。与此相反，对毛泽东、对中共则更增好感。

12月15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大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24日，他在槟榔屿对来迎见他的人兴奋地说：“中国有希望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这“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

总结这次回国慰劳经过，陈嘉庚不胜感慨。称此行“始知中央政府要人，多野心不正”，时下“凡政府公务员，概须党员，由是朋比为奸，营私舞弊，上下争利，公然横行，无所忌惮。凡党外人稍一开口反对，则诬以共产重罪。……稍有正气之人，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陈嘉庚在返回新加坡后，就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疾呼团结、抗战到底；同时，组织、运动华侨，敦促国民党枪口对外，勿起反共磨擦。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当时正是蒋介石调动数百万大军，依靠美式装备，全面进攻处于防御地位的解放军的时候。被誉为“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蒋介石执政20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已声名狼藉，而美国政府竟多方援助这一贪污独裁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而与国民党有天渊之别的中共，则获得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因此务望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此段电文，义正词严，酣畅淋漓，表现了陈嘉庚的勇敢无畏精神，深得爱国华侨及民主进步人士等的支持和拥护。

此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嘉庚多次发表政论文章，指斥蒋介石祸国害民之罪恶，论证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欢呼正义之师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并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陈嘉庚居住、工作地方）三楼大厅里挂上毛泽东的画像。

1949年1月20日，新年刚过，陈嘉庚欣喜地接到毛泽东邀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毛泽东言词恳切，诚挚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陈嘉庚阅后即复电毛泽东，表示“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5月5日，陈嘉庚乘船离开新加坡，驶向日思梦想的祖国，驶向正在获得新生的祖国。途中历经一月，6月4日抵达北平火车站，7日，由周恩来陪同，在香山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这位爱国老人的手说：“欢迎你啊陈先生，一别十年过去了！”陈嘉庚激动地说：“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到了。一是告诉蒋介石中共团结抗战无恶意，但他不听；二是宣传延安所见所闻，这可‘得罪’了蒋介石。”毛泽东很为感动，对陈嘉庚之公正忠信表示钦敬，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刘文）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 的晚年交

● 刘梦溪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吴宓大四岁，两个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经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44年年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住进了医院。

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披露的1944年12月14日至1945年1月24日的《雨僧日记》，几乎是天天、有时一天两次，吴宓都去医院看望、陪同寅恪先生。这一时期的《雨僧日记》如同寅恪先生眼病的病历卡一样，纤毫不漏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至爱亲情。陈寅恪的特点是深挚，吴宓的特点的投入。1961年吴宓赴广州最后一次看望老友，陈寅恪赠诗有句说：“幸有人间佳亲在”，这“佳亲”也包括吴宓。

吴宓和陈寅恪在1949年以前，尽管有战乱和流离，总有机会倾心谈叙，互相切磋；1949年以后，本来是寰宇已定的和平环境，反而天各一方、相见时难了。因此1961年已是六十七岁的吴宓亲赴广州看望七十有一的陈寅恪，可不是一件小事。吴宓从武汉抵广州再到中山大学已是夜里12时，寅恪先生仍在东南区一号楼上等待相见。这一天的《雨僧日记》写道：“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

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读这篇《日记》，令人感到凄然。吴宓9月4日离开广州，与寅恪先生有四个整天在一起叙往谈新，学术、政治、人事，无所不及，又交流诗作，劝吴宓与陈心一女士复合。陈寅恪《赠吴雨僧》诗第一首：“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洄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不料想这首记实的诗，后来竟成了谶语，果然是“生离死别”。从此这两位结管鲍之谊的老人再没有会过面。

1964年暑期，吴宓本来还计划有广州之行，因政治风云忽变而未果。陈寅恪1962年跌断右腿，盲目膜足，在十年内乱期间倍受摧残。吴宓处境更为不利。1969年挨批斗，被猛向前推跌倒，左腿扭折，至1971年6月又盲掉右目。扣发工资，每月只给三十七八元生活费。甚至挨饿，每天早、晚各吃一个馒头，不给菜，中午则是三两米饭。住的房又是工棚，无顶、蓆墙，遇雨上漏不止，只能垫上砖头行走。但此情此景，他担心、眷念的是寅恪先生，竟于1971年9月8日写信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问询老友的消息。他在信中说：“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双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

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感盼。”其实寅恪夫妇早在1969年10月和11月去世，吴宓的信晚了差不多两年。

使我们感到格外钦敬的是吴宓的勇气，身处自身莫保的险境，居然敢于写这样一封充满对老友系念、礼敬的信，这只有吴宓才做得出。而且十分细心，开头即说明陈寅恪是“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在当时恐怕也包含有对迫害知识精英的抗议吧。“身故”一词后面加一括号，注明是“逝世”的意思，想得也极周到，因为当时以忧戕贼文化为使命的文化环境，可能读不懂雨僧先生的至诚无华的信，连吴宓的“宓”是否识得，都在未知之数。当时吴宓下放在四川梁平县，不久又由于为孔子和儒学辩护，所受迫害更变本加厉，以至于不得不回到陕西泾阳老家，终于孤独的死去，比陈寅恪更加不幸。

而当晚年的吴宓独卧病榻时，他还大声朗诵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涕泪横流，久之乃舒。”甚至有一次梦见陈寅恪向他诵解新作，其中有“隆春乍见三枝雁”句。一生以维系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而又具有诗人浪漫情怀的吴宓，到生命的晚期，把他与寅恪先生的友谊升华到醇美的诗的境界，管鲍地下有知，也要自叹弗如吧。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我所知道的中共 “一大”代表刘仁静

● 陆立之

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刘仁静，1921年他是个19岁的英俊少年。这十三位代表最后去世的也是刘仁静。1987年他是85岁的健壮老人，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车祸，他肯定今天还活在人间。

刘仁静（亦字），湖北应城人，1902年生。坎坷一生，蹉跎半世，有关他的是非功罪，迄今尚无定论。有人讽骂、有人讥评，有人妒恨、有人叹息，就没有人写出一个真正的刘仁静。年轻一代人不了解他，研读历史的人找不到真实可信的资料，千秋功罪，无人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切历史人物给予应有的评价。应该说，对刘仁静也不例外，不以功掩过，不以过贬功，时至今日，刘仁静的历史问题也该划上句号了。

毛泽东同志剴切地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根据当时环境分析和刘仁静犯错误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点，也就是可分辨出他的三个根源。一、“五四”时期的学术研究；二、“本本主义”的弯路；三、解放后的觉醒。按此评断，刘仁静的功罪是非似可得到一客观的恰如其份的结论。

1919年“五四”时期，刘仁静17岁，是北京大学学生。当时学习刻苦，也主动积极地参加课外活动。在“五四”游行示威中，是他踩在匡互生的肩头上钻入窗孔、再敞开了曹汝霖卖国贼家门的，从而引发了火烧赵家楼的激烈的爱国运动。这时候的刘仁静是一个纯朴的少年。在此之前，1917年15岁时，他在湖北武昌中华大学附中，结识了恽代英，读过一些《新青年》之类的进步书刊，因此，仰慕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上早已向往革命。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最初遵循父志入物理系，准备以后继承父业经商；不久改入哲学系，感到政治事业更重要；继后又转入英语系，由于早年在武昌博文教会学校学习英语的基础，以后就经常在李大钊主管的图书馆中钻研英文典籍，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更是孜孜不倦地捧读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甚至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说……”有一次还登坛演讲了“马克思学说”。因此，李大钊赞誉他少年有为，朋友们也戏谑地称他“小马克思”。

1921年7月，刘仁静与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成立大会。在会上，刘仁静像初生牛犊不怕虎，竟与李汉俊争辩党纲与政策问题。李已是知名学者，主张先研

究考察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有了成效，再参加国民党行动。刘仁静则以“小马克思”精神反对改良主义折中观点，坚决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辩激烈，语惊四座，人们对此饱学的少年刮目相看。事后张国焘却掠人之美，说李汉俊是他张国焘批驳的，并贬评刘仁静只是个读过一些共产国际文件的书呆子。这样一来，党内理论之争也就从此是非颠倒了。

1922年冬，刘仁静和陈独秀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陈代表中共中央，刘代表SY团中央。刘在大会发言，这是第一次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前崭露头角。

1923年，刘仁静任团中央书记，与邓中夏一度合编《先驱》刊物，他以严肃的立场观点，撰文抨击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以前，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刘仁静也曾对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用“马克思说”去驳斥他们，但当时是学术团体信仰自由，不受纪律约束。

除理论分歧外，因一件生活上的事，刘仁静受到压抑和打击，失去了“五四”时期的蓬勃朝气，成了一个“本本主义者”。以后，1925年—1929年间，刘仁静一直窝在图书室里翻阅资料，他要寻找一贯正确的理论根据。

所谓生活上的问题，是由施存

统的妻子王一芝引发的。王是个风流娘子，与刘仁静的恋人史敬一同属摩登型新女性，喜爱修饰，孤芳自赏，两人过从甚密，无话不谈。王渐移情于张太雷，施亦莫可奈何。但王设计拉史落水，唆使史背离刘仁静改投陈乔年，施竟促成此事。本来，在当时这类朝秦暮楚的男女苟且事已司空见惯，刘仁静在“一大”会期中，就曾遇到周佛海、杨淑慧偷情私奔事，当时不知所措，如今又遭遇自己的情侣丑闻，索性拘谨的刘仁静却似当头挨了一棒！生活上不能承受，精神上就开始沉沦了。于是，由于与施存统理论上的分歧，他把身心深深地埋进书堆里，想从本本中找到实践真理的正确道路。在当时，正是“五四”以后各种理论杂说纷陈，社会思潮起伏摇摆不定，有人偏激地向左跳，有人右倾要复古；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只是一个口号，如何实践还是空中楼阁。“以俄为师”，也只是迷惘的探索。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不符合中国实情，造成了分歧与失误，从一开始就带来了错误的基因。刘仁静从此缄默了。他静静地钻入书斋，小心求证，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精神攻读马列原著。这就是他离开团中央后迈出的第一步。正确或谬误？当时对这个一股正气的青年，可能还不能周详地考虑抉择。

二

1925—1929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也许由于失恋的苦闷和对施存统的憎恶，他寄情于书本之中，谢绝交游，闭门苦读，希望自己成一革命理论家。在这里，本本主义使他误入了歧途。古语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刘仁静离开了实践斗争生活，数年如一日拥书自娱却得不出结论。恰恰在这时候由于中国革命失败，共产国际领导阶层争辩着理论问题，中共领导

人也出现了“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等行动，刘仁静从书本理论对照现实，他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主因应归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其次是幼年的中共缺乏经验和个别领导干部的差错。刘仁静从“一大”开始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当时他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硬性指令。继后，共产国际先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偶像，错误的导致革命失败。在总结教训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还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地将失败责任诿卸在中共领导层身上，这使刘仁静感到失望。特别是已经失败后，共产国际还不承认失败，胡说什么正在高涨或高潮，中共领导也盲从地要搞一省或数省暴动夺取政权，无谓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志和无辜。在共产国际六大的纷争中，刘仁静觉得托洛茨基的意见是正确的，认为托氏指责斯大林的错误也颇公允，虽然托氏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提纲被禁止外传，斯大林擅权用特工格柏乌箝制人口，但反对派还是将复印本泄露了。刘仁静开始崇敬托洛茨基。特别赞赏托氏论证、肯定中国革命已失败，认为当时应该从事转为公开的议会斗争，

不能再妄自冒险流血，要储备力量作不断革命。结合反对派的理论，刘仁静又看见了“列宁遗嘱”的秘本，他更感觉斯大林粗暴和托洛茨基的才华横溢，于是刘仁静信仰了托派主张。回顾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和王明、博古路线，刘仁静以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很远，那一伙人唯唯诺诺顺风倒，没有自己的主见，成了官僚主义者，是权势圈子的奴才。个别人刚愎自用，凭匹夫之勇，不顾国内实情，蛮横恣性，把革命陷入绝境。刘仁静傲岸地鄙薄这些人，甚至回国后也不向当时的党中央报到。

刘仁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攻读时，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他自己的思想根源促成，他变成了托派。但他并不是中国托派的始作俑者。他在莫斯科持托派观点，曾与王若飞、马员生等公开谈过自己的见解，也接触过中大同学中的拥护托派份子（范、李、安等）。而他回到中国后坦荡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像别人那样隐匿了托派立场而潜入党中央机构冒充正统。甚至早年结识的恽代英劝诱他顾全大局、按组织纪律应向党中央报到，他也倔强地和恽吵闹，认为



刘仁静和夫人、孙女

当时党中央就是官僚主义集体。

关于刘仁静回国问题，曾被米夫、王明一伙利用作攻击瞿秋白的借口。他们说瞿放走了列宁学院的中国托派头子，瞿唆使刘去土耳其访见托洛茨基夫妇，因此扣的帽子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其实，刘仁静取道西欧归国是经列宁学院校党委同意，也是第三国际交通单位专门安排，发给了护照和外汇川资，再加王若飞私人送他三百元美金才成行的。此事与瞿秋白毫无关联，并且瞿在国际“六大”会上是斯大林指定抨击托派理论的最积极的发言人，米夫、王明的诬陷是无的放矢，刘仁静并没有牵累瞿秋白。

刘仁静于1929年4月间回到上海，当时中国托派已有两个小集团，一曰“我们的话”社，一曰“无产者”社。前者是1928年从莫斯科回国的十几个学生组合的。他们是史唐、张特、梁干乔、陆一远等人，开办了一家“新宇宙书店”，出版了几本莫斯科孙中山大学的讲义，这些人有点狂妄，以中国托派鼻祖自居，轻蔑陈独秀等人。后者即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马玉夫等等，号称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与“我们的话”抗衡。刘仁静回到上海后，因他曾绕道去土耳其小岛亲见过托洛茨基，携回了两件托氏打印的文件：一是《中国革命的前瞻与总结》；二是《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共产主义左派——列宁派的任务》。因之他也马首自瞻，自诩为托洛茨基的嫡传弟子，轻蔑已组成的两个托派小集团，傲然屹立，甚至对陈独秀也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似乎唯有他一人是讲解托派理论的。不久，他与王文元、宋逢春三人合组第三个托派小团体，命名为“十月社”。之后，另有王平一等人又凑合第四个小组，名曰“战斗社”。这时候算是中国托派活

动最红火的了。但好景不常，各派很快闹分裂，王宋联手开革了刘仁静，刘又单枪匹马独自创立——“明天社”。

1930年，刘仁静与陆女士结婚，结束了孤灯孑影的寂寥生活，他有了温暖的家园，开始安详地从事译著工作，先后为神州国光社翻译出《法国大革命史》、《德法之战》，为新生书局译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自传》等。后来，徙家北上，在北京为一外籍进步文化人当译员，此人叫易罗生，当时正纂辑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悲剧》，刘仁静被雇协助翻译史料，生活是安定了，但也为时不久，刘仁静被国民党特务跟踪逮捕，易罗生逃逸，刘妻抚育子女各一，生计维艰，只得奔返上海母家栖息。刘仁静因无确凿罪证，被囚禁苏州反省院三年。出狱后已是抗战时期，生活无着，笔耕卖稿已不可能，幸得北大旧友陶某介绍，暂充抗战宣传机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又由王明等人倡言“一切工作为统战”的归附国民党论调，刘仁静撰文不指名的批驳了中共中央，因此又引起了历史的误解。

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子女跟随逃难，从南京、武汉、重庆、最后到西安才找到较安定的职业（在“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充任语文教员），这是隶属胡宗南管辖的军训机构，收容的是爱国青年男女，尚无悖逆抗战的言行。在这里，崛强的刘仁静因不接受干训团领导人葛武荣分配写反共文章，就被禁闭起来了。

战争结束后的三四年间，最初因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机关单位涣散，干部们争夺“五子登科”，刘仁静被遗忘在西安，无法南归。既无钱购买车票，也没有关系网可请求救援，他本人是个木讷的教师，妻子是普通家庭妇女，也不善言

词，一家四口困窘在西安无以为计。大半年后，幸遇一湖北同乡徐某有商贸车队由陕去沪，刘仁静才得援助，一家四口免费搭乘大蓬车，长途颠簸约一个月抵达了上海。之后，又有同乡人刘叔模介绍充任《时事新报》代主笔，撰写社论，抨击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等。短暂的几个月，入不敷出，难以养家糊口，1948年秋，还是这位同乡邀他赴南京，在国际问题资料室任编审工作，迄至大陆解放日止。这就是刘仁静“误入歧途”的全过程。有人说他是“进一步退两步”。事实是：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遭遇到的社会、家庭、思想等等的打击，以他的个性和所能承受的能量，他迈出的几步路还算是谨慎的。他没有陷害任何人，未损及党的利益，比之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顾顺章等人，刘仁静是正直的。也正为如此，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宽恕了他。他的罪错是个性较迂，迷信本本主义，崛强不会融通，恃才孤傲，太自负，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理论家。但他为人善良，动机还是纯正的。有时候因理论问题尖锐地争吵，即使与人争辩得面红耳赤口沫飞溅，王文元、宋逢春等人排斥他、讽骂他、嘲弄他、贬称他为“刘佬佬”“刘神经”……事后他仍然照顾宋逢春等人生活困境，与人为善的维护友谊。这比之某些人恣睢必报和出卖同志老师的犹太们，刘仁静是高洁的。

三

解放后的觉醒，是刘仁静的革命信念尚未蜕变的表现。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党也走过了左左右的曲折道路，大批的同志死于战斗血泊中，也有不少人逃遁背叛。从“一大”计算，至少是三分之一的人丧失了原有的信念，有人公然走入反动营垒，有人

销声匿迹。后来，曾被共产国际宠信于一时、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却有二分之一人投入国民党做了特务。所谓“列宁主义左派”的信徒们，解放后有的远遁海外，有的则死于沟壑。在这历史波涛冲刷的年代，刘仁静能坚定地随着解放的曙光有所觉醒，受到党的宽恕。

1949年，刘仁静到北京，向党中央自请处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亲自接见了刘仁静，谆谆地告诫他，“不仅是表示认错，还必须彻底挖掉错误的根子。比如你写的文章，即使不写你的姓名，我们也知道是你写的，因为那就有你的思想根子……今后，你一定要改正自以为是的观点，待人接物的态度，特别是对基层工作同志，必须虚心学习，事实并非只有你正确……”刘仁静接受了党中央的教训。

在生活上，党安排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与苏联女教师合讲政治经济学，以后又调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老一辈同志听说刘仁静归队了，都表示欣慰，徐特立老人还欢迎他移住他家（因徐老家庭成员不同意未果），最后居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又从新建立了家园。

本来，功过是非已经剖白，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有了安逸的家，刘仁静安心工作，先后又翻译了几百万字的马恩巨著以及《普列汉诺夫哲学论文集》、《外交特权》等书。家庭和睦，生活无虑，思想上不应再有什么波折了。不料，不知是什么刺激，刘仁静竟一度精神失常。他有时候偶发性地不能控制自己，疯疯颠颠地在街道上闹笑话：或是俯拾街上的碎纸破布塞满衣兜，或在铁道附近聚沙成塔，像个顽童嘻嘻直笑。这样，引起领导关注，将他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在医疗中，他



1984年，刘仁静夫妇和人民出版社同仁游烟台时留影

又并发癔病，产生幻觉，喃喃呓语，以为医生要吃人肉，甚至昏迷地丧失了记忆，认不出自己的妻子儿女。经过领导特别照顾和专家医师的长期悉心治疗，大约一年多才恢复正常。

出院后，正遭逢十年浩劫，“文革”红卫兵又将他当文攻武斗的活靶子，囚禁在秦城监狱中。幸得周恩来关怀，将刘仁静调离北京，到郊县保护起来。为了防范红卫兵再揪斗，一度以少教所果木护工为名幽居在少教所中，家属移居一处。1968年，毛主席点名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呀，就不要关了吧。”刘仁静被重新安排居住在北京白云路一幢新楼里，改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译。

1982年，刘仁静八旬高龄，党中央又遴选他为国务院参事，另行安排在国务院宿舍楼居住三室一厅，天伦团聚，其乐融融。

刘仁静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清晨五时左右起床，先到对邻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去做打太极拳之类的活动，七时回家早餐；上午读报和整理书稿；饭后小眠；下午漫步或

访友（经常晤谈的老友是师大教授陈友松和许德珩、谌小岑等老人）老人们特别关心年轻一代人的教育话题。刘仁静的客厅中就悬挂着许德珩萧劳等人的墨宝，其中一副七绝是：“五四回头六十年，吁吁茄鼓着先鞭，此身虽在嗟吾志，国事长筹仰后贤”。这是老人对往事的叹息和对新一代人的寄望。

但很不幸，他只安祥地享受了五六年幸福生活，在一次偶然的飞来横祸中，刘仁静被车撞死了。1987年8月5日清晨五时许，他按每天的习惯，提了“太极剑”，从院门口跨越马路往对面北师大校园去，当时天色微曙，突然一辆失控的公共汽车飞速冲来，撞得刘仁静头破血流，当场死去。这时他是85岁。

事后，由国务院参事室和人民出版社共同料理了后事，在八宝山举行了从简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就留存在八宝山公墓。他的历史就从此湮没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反共摩擦 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 穆欣

阎锡山克己克先鋒

抗日战争前夕，当日本侵略者严重威胁晋绥地区时，一贯亲日反共的阎锡山，为了自身的生存，他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真正促使阎锡山这一转变的，是毛泽东亲自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在释放红军东征期间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时，对他晓以大义，要他带亲笔信给阎锡山，并转达合作抗日的具体意见。经过繁复地折冲尊俎，阎锡山才逐渐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当即派彭雪枫于10月20日起常驻太原，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谈判，后又多次派周小舟携亲笔信前去太原。1937年7月28日，阎锡山回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方针，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共赴国难也。”7月31日，阎锡山向彭雪枫正式表示：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这样，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实行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军事上抵抗日军也比较坚决。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以后，阎锡山撤到临汾，他半生经营的这块地盘大部地区已沦陷。山西是阎锡山魂之所系，离开山西他将一无所有。而要坚持山西抗战，只有依靠八路军以游击战争拖住日寇，依靠共产党发动全省群众，组织新军，积蓄力量，才能进行长期抗战。这年10月下旬，阎锡山急切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并与中共商谈具体指挥事宜。毛泽东通过彭雪枫向阎详细提出

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基本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晋绥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至此，出现了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高潮。

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固然有“共同抗日”的因素，但他信奉“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唯我哲学，他的一切措施和出发点，都以能否“自存与自固”为转移。在大敌当前，他和共产党联合，是为了维系他“山西王”的地位，一旦进步力量及群众运动兴起，使他感到控制不了的时候，又会变“联共”为“反共”。

因此，毛泽东多次指示，在同阎锡山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团结。193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他们答应



阎锡山

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一个基点上。”

随着抗战时日的延长，阎锡山对抗战开始动摇，山西政局迅速逆转。1939年3、4月间，阎锡山在他的战区总部所在地陕西省宜川的秋林镇召开的布置反共投降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制造对日妥协空气，说：“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宜而战”；公开抛出一个《军事统一方案》，取消由中共帮助建立的新军番号和政委制，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还向旧军官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意谓形势将有巨变，和日将要代替抗日，要打八路军和新军了。

秋林会议结束后，山西新军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共产党员雷任民受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委托，绕道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谈到阎要取消新军的政委制时，毛泽东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叫新派别听他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毛泽东还会见了途经延安返回晋西北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会主任续范亭，进一步了解了阎锡山的动向。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动向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了客观的分析：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并指出：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团结他，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5月13日，中共中央本此方针发出《关于宜川会议后对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

9月初，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

政治情况，研究加强反逆流斗争问题。林枫与毛泽东谈话时曾经问道：“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就在这时，9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晋西新军奋起自卫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事前曾与日寇有过密谋策划。阎锡山抗战后与日寇勾结也从未间断。1939年10月下旬，阎锡山就决定成立“讨叛军总指挥部”，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游击区行署主任陈长捷任总司令，联合日军“讨伐”驻扎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11月1日，阎派其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吕瑞英，第十九军副军长梁培璜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长的代表山下会谈，达成共同反共的协议。11月初，日军即分兵3路向第二纵队进行合围。阎锡山为了顺利实现其消灭第二纵队的阴谋，就前赴秋林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羁绊在秋林，不让返防。韩钧得知阎锡山许多勾结日寇加紧准备进攻新军的情报，机智地冒险离开秋林，赶回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即刻召开紧急会议，向部队领导成员指出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形势，强调不能坐以待毙，而要先发制人。果然不出所料。紧急会议刚完，就收到阎锡山命令第二纵队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灵石至霍县段日军“大举破击”的电报。

第二纵队领导人十分明白，如照阎锡山的命令行事，必将立即坠入日顽夹击的陷阱。此时，阎锡山



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
总指挥续范亭

的第六十一军由南向北，第十九军由西向东，共计47个团的兵力，正向第二纵队包围逼近；同时同蒲线上灵石、霍县的日军正在增加兵力。韩钧即于2日在下桑峨召集第一九六旅团以上军政干部开会，进行迎击顽军进攻的紧急动员和作战部署，并下令把第六十一军先前安插在纵队司令部近旁诸正村的一个营解除武装。3日，第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原是旧军官，他勾结第十九军在永和驻地叛变，捕杀政工人员；顽军先后捣毁了永和、大宁、蒲县、临汾、洪洞、赵城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杀害了蒲县县长李玉波、临汾县县长李从文、牺盟特派员陈祖辰以及第六区专署秘书、原洪洞县县长高希敏夫妇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干部。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即就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发出电报，指出：“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



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雷任民

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军本身应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反磨擦问题。在12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我们对付的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样子上还未投降，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锡山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当着内战行将爆发的紧急关头，决定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廖井丹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统率晋西南

所有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政卫第二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一致行动，而以八路军为后盾。

这时旧军的进攻有增无减。韩钧等多次向阎提出抗议，均被置之不理。韩钧气愤难忍，12月7日，以他个人名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奋起自卫的决心，声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锡山当天收到此电后即召集高干开会，宣布“韩钧反了”，诬指第二纵队为“叛军”，即令：“韩钧着即撤职拿办。”

第二纵队即在八路军晋西支队支援下奋起自卫。12月10日，韩钧指挥晋西支队第一团和第二纵队第六团出击隰县，一举歼灭第十九军一个营及一个团部，顽军一个旅逃走。

部队连续苦战20多天，极度疲劳，兵员、弹药无法补充，有三四个团尚未着冬装，而且仅有12个团对抗顽军47个团，兵力悬殊。为保存革命实力，配合晋西北我军行动，区党委乃果断决定向晋西北转移。

12月27日，区党委率晋西南新军和晋西支队，进至方山、交城地区。政卫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以及八路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等部，均于粉碎顽军的围追堵截和日伪军的阻拦之后，先后到达太岳区沁源县境。

顽固势力全部肃清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山西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兼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即将骑兵第一军、第三十三军各部从抗日前线调到后方的兴县、临县，监视新军及八路军。

毛泽东在给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人的电报中说：“赵承绶在没有公开打我们以前，还是要联络他或敷衍他，使他的反动行为慢一点，以便我们及新派有时间巩固四纵队与牺盟，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此时派一个适当人去见赵谈一次，是否有益处，目的在于使赵稍微犹疑一下，以便争取少许的时间。对赵部下比较好一点的人，更要注意影响他们。对赵下级干部及士兵，更要设法争取，不可无分别的骂他们。”

晋西事变爆发后，中共决死队第四纵队党委连续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采取主动，逮捕部队内部的顽固分子、纯洁队伍，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外部的顽固分子的进攻。12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第四纵队各团同时行动，除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第二十团团刘鸿绪等少数逃跑外，反动旧军官全被逮捕。

12月15、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定向晋西



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
总指挥张文昂



领导晋西南新军八路军奋起自卫的
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

北新军和八路军进攻计划。参加会议的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寻机离开会场，于18日赶到岚县史家庄，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报告。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即于23日指示晋西北反顽斗争方针。12月28日，毛泽东、王稼祥又来电指示“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之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对郭挺一及其同类人物应严防其背叛新军的阴谋”。

郭挺一是二〇七旅旅长，并兼任第二行政区委员兼保安司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1928年被捕后叛变，后来投靠阎锡山。是埋藏在新军内部的一个隐患。郭挺一按照阎锡山、赵承绶的部署，准备将部队靠拢赵承绶骑一军，企图消灭工卫旅内部的共产党员，控制工卫旅。该旅的中共组织于1940年1月3日将郭挺一逮捕，并于12日在岚县东村黑龙沟将其处决。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阎锡山进入晋西北、隔断我华北区域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将率

动华北全局，是关系全党的重大事件。要求新三五八旅和新军做好战斗准备。30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一二〇师的贺龙、关向应：“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

晋西南我军越过离（石）军（渡）公路，震撼了晋西北的顽固派。赵承绶以骑一军8个团拦阻我军南下接应，以第三十三军6个团阻挡晋西南我军北进。

12月30日，晋西北区党委召开军政干部紧急会议，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一致推举续范亭为总指挥、雷任民为副总指挥（经续邀请，罗贵波、彭绍辉协助他指挥作战）。会议还确定了行动部署和作战计划。翌年1月2日起，总指挥部指挥各部开始在临县、方山地区向顽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顽军近3个团。

1月8日，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抵达晋西北。10日由他主持召开会议，组织统一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军事行动及行政问题；同时商定两个地区部队分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夹击顽军；中央军委并令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由陕北东渡黄河配合作战。

1月11日起，滕代远统一指挥各部相继攻占临县外围据点。守敌于13日夜弃城逃离军公路南逃。我军乘胜歼其后尾一部，赵承绶只身光脚逃走，连老婆和银行的金柜、印钞票的机器都丢失了。

贺龙、关向应于1月下旬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晋察冀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我军；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集结14个团的兵力将在晋西北地区顽固派势力全部消灭。至此，晋西北反顽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结束了两年多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使晋西北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妥善解决晋西事变

对于这场战争，蒋介石格外“关注”。他在耸恿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准备随时把他的力量伸入山西。12月下旬，蒋令阎“将本战区所属各游击队主官姓名，现有人马枪支数字及经费”向他报告。30日，又命令其西安行营主任程潜“迅即亲往山西视察现况，询问百川兄对该案意向，交换意见，俾以后易着手处理”，并“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1940年1月10日，蒋更下令阎锡山“藉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极力反对政治解决，坚主武装进攻。阎锡山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又趁机向阎提出愿派



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韩钧

1940年1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阎锡山、朱德、彭德怀等同志。

（一）（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940年1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阎锡山、朱德、彭德怀等同志。

两个军过黄河“增援”，接替原第六十一军防地，而其原在晋南稷王山区的第九十军李文部已奉胡宗南命令北进乡宁，续向吉县移动（吉县是阎的老巢），致使蒋阎矛盾激化。阎为巩固晋西，令第十九军、六十一军停止北进、赵承绶南撤，改变了原先的计划。

阎锡山原想一举消灭山西新派，打击八路军力量，结果损兵折将，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也把绥东抗战以来多年捞到的一点政治资本丧失殆尽，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中央及时指示：“我们应利用这种状态”，“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要新军、牺盟会领导人不断打电报给阎锡山，痛陈旧军进攻的罪行，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和平解决晋西事变，保持与阎锡山的合作

关系，恢复山西内部新旧两派的团结，拉住阎锡山继续抗日，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大局有利。2月1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发出电报，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肖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中共中央在1月27日以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的名义，向阎锡山提议调停。阎已山穷水尽，只得表示：“如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25日，毛泽东即派肖劲光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达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旧军团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他给阎锡山的信

中写道：“百川先生勋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目前国际形势日渐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兹派肖主任劲光、王部长若飞趋谒左右，敬祈接见指示一切，未尽之意统由肖、王二同志面达，专此敬颂勋祺。毛泽东谨上。二月二十三日。”

4月初，经过谈判，中共与阎锡山终于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东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第二战区和晋绥军活动的范围，晋东南和晋西北地区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地区。

表面看来，新军和八路军的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晋西南地区，但是阎锡山集团的反动势力却被彻底从晋西北和晋东南地区清除出去，这些地区从此成为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国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毛泽东曾在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11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

阎锡山经此教训，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就未敢附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阎锡山困居晋西南一隅，虽消极抗战，暗中虽与日军信使往返不断，但始终未敢公开投降敌人。

（责任编辑 方实）

阎锡山以父为质 三次觐见袁世凯

● 徐崇寿

以父为质

袁世凯想称帝，挟武力、施权术、密探遍地、网罗四布的情况下，暗杀了宋教仁，造成一时的全国恐怖黑暗统治局面。“山西王”阎锡山为了博得袁氏对他的信任不疑，他着实地下了一番苦心：一方面疏远同盟会；一方面派员到北京贿赂袁氏左右。按当年袁氏把各省都督都排了队，凡属同盟会者大都撤了职，只留下云南的唐继尧和山西的阎锡山。

阎氏在他的《早年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皆已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四年（1915）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正由于此，他把他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了一处院子住下，派了人伺候照顾，口说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上是把父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

三次被袁召见

袁世凯以赴京述职商讨“国事”为名，分别召见各省都督，以审视心迹，时为1915年（民国4年）2月。阎锡山认为决不能稍露锋芒，一定要装作恭恭毕敬，软弱

无能的样子，才能先屈后伸。他惊惶之下，不敢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偕了一文（赵戴文，时任将校研究所所长）一武（张树帜，字汉杰，时任骑兵团团长）二心腹随员进京。

袁世凯召见阎锡山共三次。第一次，阎氏在这天的早上连早点也吃不下去，面色阴沉，他偕张树帜乘着马车（当时尚无小汽车）驰至总统府，由张先打过招呼，只见袁氏戎装盔缨、胸前挂满勋章、肩绶闪闪发光，端坐不动，两道目光射向进入大厅的阎氏逼来。阎吓的出了一身冷汗，屏气凝息不敢抬头，慢趋前行了90度的三鞠躬礼。袁只说了声：“请坐吧。”阎氏那敢就坐，仍旧低首偏坐在椅子的一角。袁心暗想原来是个“窝囊货”，又说了句：“回去休息吧，过几天再和你谈。”阎不敢就走，站起又行了个90度鞠躬礼，袁氏略微欠了欠身算是送客。阎仍弯着腰一步一步退出来。回到寓邸，没等赵戴文问他觐见情况，阎氏脱口一句：“可厉害呀！大总统的那两道目光直射入肺腑！”说着擦了头上的汗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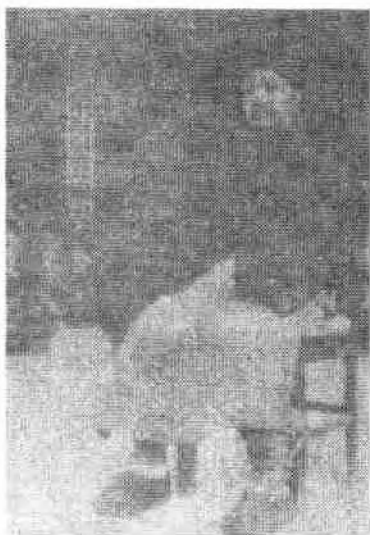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又接到总统府召见的通知，阎氏虽了解当时的政治气氛与袁氏的动向，心中有了准备，胆子也就壮了些。袁氏见他进入，稍一点头已是十分礼貌了。阎氏仍是提心吊胆地赶紧趋前屈着双膝跪下，叩了三个头。袁氏满心欢喜，比第一次和气得多，命他赶快起来。坐定之后便道：“听士诒（按梁士诒时任总统府秘书长）说，令尊



督军阎锡山

住在北京，来游玩很好。有空时再相见见令尊。你先代我问好。好好照顾老人家。”阎氏仍是俯首半个屁股坐在雕纹的放着红垫的太师椅子上，吞吞吐吐地答话，装出一副驯顺的奴才相。袁氏便说：“你再住几天，另候通知。”这是第二次的觐见完毕。

又过了几天，袁氏对他第三次召见。他还是和前两次一样恭顺。袁世凯见了他也没多说几句，只简单地问了问山西的情况，让他在北京游玩几天再回去。阎氏一出来迈步轻松的多，不禁眉飞色舞地说：



袁世凯任命山西都督时的阎锡山 (1913年)

“汉杰，咱快回公寓，叫上次脱（赵戴文之字），上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老字号）吃一顿。大总统客气多了，让我在京游玩几天就回太原去。”

阎锡山的三次被袁召见是1915年（民国4年）4月间的事，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第一次，使他一直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他到后来对其干部们也这样说过：“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徐树铮、曹琨、甚至张勋、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使人不敢仰视。”按阎锡山于1911年辛亥起义时才29岁，被举为山西都督，是响应武昌起义各省中任都督中最年青者之一，连蔡锷将军也比他长一岁。阎锡山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步入政坛的年青人，竟识得袁氏对他的先示之以威，继示之以和，乃“顺昌逆亡”之暗示，于是他便施出了百般奉承驯服的一套伎俩，瞒过了足智多谋、不可一世的袁世凯而未被撤下都督宝座来。

阎氏的自述分析 没被罢黜原因

另据阎氏自撰的《早年回忆录》中叙述：“袁氏所派的（心腹）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开了一个山西省曾参加过革命者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30余人，咨我扣捕，交他审讯，我于扣捕以前都密告他们跑开了，只是金永对我深表不满。……金永对袁氏曾上了一个很厉害的奏摺，详叙我在山西不利于袁之种种措施，其结论大意为：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的民军势力，若不消灭山西的民军势力，则我（阎自谓）将配合反袁军事，由平绥路进攻北京，欲消灭山西民军势力，非将我（阎自谓）撤职，无以为济。此奏摺到袁手中时，袁已病笃，……未及看完，奏摺即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侧，劝其病愈后再为处理，袁氏从此即一病不起。此是段亲自告我者，当不为虚。段并曾对我说：如项城那时看完这个奏摺，一定要撤你职，下令讨伐你。……”还有一小段回忆自述其未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原因，原文如

下：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

按以上阎氏的回忆自述两段，对袁氏对他的三次召见，亦有助于了解研究其人之历史，故撮录之以供参者。

（责任编辑：杜导正）

（徐崇寿：现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早年是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待从秘书室主任）



1912年孙中山视察太原

阎锡山在台湾无可奈何的最后岁月

● 徐崇寿

统治山西省达 38 年之久的阎锡山，从当时的国民党残山剩水的政局中最后被排挤下来，卜居青山草庐，落了个栖惶凄凉而终。在台湾的十年的光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兹就我所接触与搜集到的材料，写成此稿，以供参考。

昙花一现组阁 跳火坑的表演

阎锡山是 1949 年 3 月 29 日从太原市仓皇搭机逃走的。同年 6 月 3 日国民党立法院举行第三次会期的第 25 次会议，以 254 票对 56 票的压倒之势通过了阎锡山当选为行政院长。6 月 7 日下午，他在广州市保安街寓所招待中外记者。记者们首先问道：“此时正大局动荡，人心惶惶，多谓先生出面组阁系跳火坑！”阎答：“不错，所以我亦感到‘其愚不可及也’，但‘国家’危难，义当本‘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我中华民国于不坠。……”他正是在如此情况下组阁的。

当阎氏带领他的“战斗内阁”，于同年 12 月 8 日偕新任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副院长朱家骅与部会首脑、政务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关吉玉、教育部长杭立武、政务委员陈立夫、万鸿图、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等 14 人乘专机抵台北市时，台湾这座孤岛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经济上由于人口突增，导致日用消费品奇缺、物价猛涨；政治上国民党领导混乱，人心涣散，蒋家的残余势力与台湾地方势力之间

的矛盾激化；军事上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的 60 万残兵败将已成乌合之众；外交上，美总统杜鲁门于 1950 年 1 月 4 日公开宣布，要抛弃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处境，蒋介石在对他的部属讲话时哀叹：“我们……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惨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这真是一幅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但阎氏却仍想挣扎一番，按他的话来说，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既入地狱，只好安于入地狱”之意。（1949 年 10 月 29 日农历 9 月初 8 日阎氏六十七岁生日那天，应贾景德与徐永昌之邀于重庆市化龙桥商震旧寓晚餐时三人的谈话）贾氏当时捧场说：“宁武子之愚，不算高明，孔子栖栖惶惶，到处碰壁而不休，那才是高明之愚，仁者当如斯。宁武子可算是个智者，院长（指阎氏）向来重仁次智，以孔子为仁，以老子为智；智者仅可善自身，仁者方能善天下。我愿院长学孔不重老。”（宁武子名俞，卫国大夫，见《论语·公冶长》章：“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正是在以上的认识，阎氏决定了自己的“跳火坑”、“入地狱”的行动：他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对付“×”的船海战术

之来攻。他还选训了所谓“革命种能干部”，准备作为“收复大陆”重建政权的骨干力量，尽管他如此殚精竭虑为蒋家王朝效忠，最后还是被蒋介石黜免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他撤退至广州过海珠桥时曾感而赋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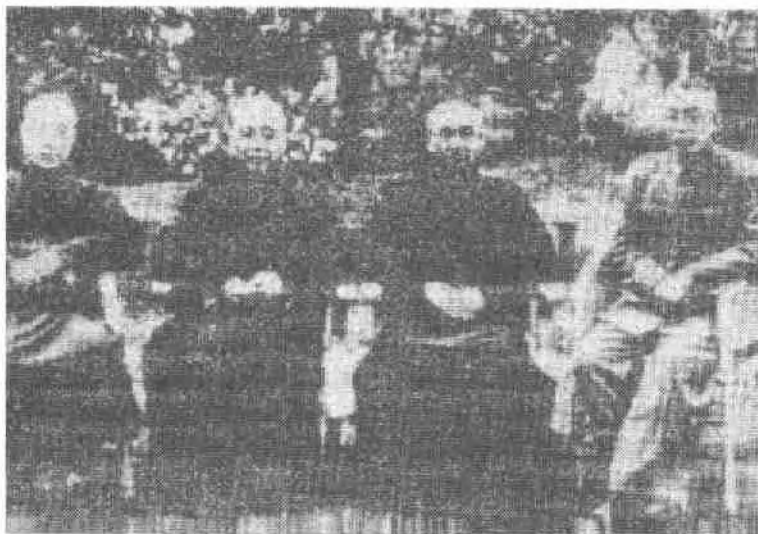
“钢筋水泥兮，合则坚牢。
劳燕分飞兮，孤鸣嗥号。
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

他在这几句诗中暗喻要做调和蒋、李（宗仁）之间的“宏桥”，但他却先被甩在旁边了。

这是因为他的出任行政院长，本是蒋、李（宗仁）矛盾下的产物，他的去留也必然受到蒋、李矛盾决定性的影响。国民党残余势力准备逃台之际，蒋、李之间的矛盾已经



离大陆前，阎锡山与蒋介石在溪口



阎锡山与贾景德、徐永昌、杨爱源（1949）

发展到公开决裂地步。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拒蒋的邀请去渝“共商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的要求，在南宁发表谈话，宣布赴美治病，将“中枢军政事宜”交行政院长阎氏负责。同月22日，蒋氏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携他的亲笔信飞香港慰问李宗仁促早返渝，并以“充分权力”交李宗仁掌握作保证。但结果李宗仁仍拒邀。阎氏则奉蒋命电劝李迅速归国，也未生效。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等离港赴美，临行前电阎锡山：“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阎氏有自知之明，故一切仍听命于蒋。

李宗仁在美托词“养病”不返，阎氏曾频电催请李氏命驾回台，一时众议纷纭，责难四至，如监察院大会决议：“致函李代总统指陈其居美遥领国事措施之错误，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之。”当时阎的处境十分难堪。在他出席2月13日的国大代表会议质询会后感慨地说：“讲演式的会议，易形成夸功矜识，泄愤激人，不止时间不经济，议事无结果，且使各方异见益深，造成无公道、无是非的局面。”有人以李

代总统复电不能回国，总统复职问题为询者，阎氏以“总裁的出处，关系国基，总统的复职是今日国家的需要，亦为台湾人士一致的要求”作答，可知他已作了辞职的准备。立法院对总统复职事，多认为应由立委个人签名，今有立委380余人联名电请总统复职。2月26日，台北市某杂志对阎提出恶意批评，有乖事实，有请阎氏答辩者。阎氏为此特致函贾景德秘书长云：“我说不辩，才敢从政，贵在瘴恶禁非，自不能不拒请托。若辩则不胜其辩，何堪从政！无论其为善意批评或恶意侮辱，有则视为医病剂，无则视为防疫针。”

阎锡山以独据一方，唯我独尊，称孤道寡的局面而至到台后屈身檐底，仰人鼻息的处境，当时能为他效力而推心置腹、甘苦同尝之幕僚，只有1949年4月他在南京时与他合影见附照片中的三个人：贾景德（由考试院副院长不惜降职充其秘书长）、徐永昌（由军令部长、随大校长退而被昇以总统府资政空衔）、杨爱源（由太原绥署副主任退而被昇以战略顾问的空衔）。由此可以概见其辞职前的尴尬之心情。

蒋介石的复职总统已成定局，阎氏在攻击侮辱压力之下以“仰面唾天”之语自我解嘲、自我宽慰，亦属无可奈何。尽管2月10日晚，贾景德、徐永昌二人奉蒋介石之命对阎氏很恳切地传达蒋介石召见时说的话：“院长万不可轻言辞职，因之动摇人心。”并嘱转告院长：“国大之询，系我与德邻（李宗仁之字）及伯川（阎氏之字）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阎先生万勿误会。”虽有蒋氏的这一挽留表示，久在政海中浮沉的阎锡山岂有不识此手腕之理。他于2月11日晚与部属王平（字均一，曾任财政厅厅长）、刘杰（字子英、时任立委）的一段谈话，道出了自己尴尬的处境。刘杰说，舆论方面批评院长是孤掌难鸣，曲高和寡，一切方案、计划难行。阎氏说，只要有权，孤掌很容易变成不孤，曲不论高不高，亦能得到众和。王平说，责任内阁的阁揆，尚能说无权吗？阎氏说，内阁的阁揆，等于驾辕的骡子，绊住了腿，寸步难行。可见这个干了9个月的阁揆的阎锡山，等于是做了绊住腿的驾辕骡子，落了个“寸步难行”的下场，个中甘苦，可想而知了。他于2月27日最后还托远在华盛顿的台湾大使转呈李代总统一电，备述其苦衷，略云：“当钧座赴美之前夕，锡山曾迫切陈词，以时局艰危，非承平时期可比，不可一日无元首躬亲主政，无论在职权，在能力，锡山决不能担负在元首离国后之军政重责，恳请即日力疾返国，以慰众望，乃未蒙见谅，攀缘莫及。当此大陆战事迭遭挫败，亿万同胞沦入‘铁幕’，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钧座既远羁海外，而总统亦未复行视事，一切有关总统及统帅职权之军政大计，为迅赴事机，每须决于俄顷，胥若无所秉承，延搁则误国，处理则违宪，用是政府举止失据，锡山个人尤感进退维谷。……为此，决心去

职，以明责任。今国家如垒卵之危（指台岛），人民有‘倒悬’之急，法统不能一日中断，元首实难万里遥领。恳请钧座在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回台，以定国是，情势艰危，伫待明决。”

李宗仁代总统一去不返，于是蒋介石于3月1日在台北发表文告，宣布复行视事。复职后的第一着把亲信陈诚任命为行政院长，同时任命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其他亲美派军人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其子蒋经国则任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同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临时会议，说明本人请辞院长职，遂决定进行阁员全体总辞职，即与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以及兼各部部长等呈请总辞。3月2日上午，蒋氏莅行政院长办公室与阎氏进行了长谈。3月6日，国民党常委临时会议批准阁内阁辞职，并通过陈诚继任行政院长。3月8日立法院举行会议，同意陈诚任行政院长。

陈诚专诚拜晤阎锡山时表示：“奉命继任行政院长，至感不足，尤为惶恐。”阎氏道：“今日的国事，是一个历史性的责任，国家需你负起责来，保卫台湾，同时也是保了国家仅留的人才文物。你对军事、经济二事均有基础，台湾人民对你治台的印象均佳，我与少谷（黄）亦谈过此意，盼你以舍我莫属的负责精神出来任事，在自己虽然是需要多费点力，多为点难，而实际是适应了国家的历史的需要。你比别人可加一半效率，请匆逊让。……”3月10日，有“国大联谊会”代表张晓景等四位来向阎锡山致敬称：“拟开茶话会，以示惜别之意。”阎锡山云：“我于交卸之后，应静中闭门思过，对贵会茶话之盛意，敬表谢辞”。同日，接到蒋氏“台总字第217号令准予辞职”。3月15日，阎锡山本着“旧令尹之政，必此告新

令尹”之精神，约新任陈诚院长召集新旧全体阁员举行联席会议，进行了新旧任内阁交接仪式。

按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大陆覆灭之际，奔走于挽救国民党统治危难之间，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一个外国记者称他是“激流里的勇夫”。尽管他“苦心孤诣”，“功不可泯”，但却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到头来结果还是被罢黜赶出权力机构，给了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的空头名义。这说明阎锡山这个“西山”的土地离开他的独立王国，到了“东山”，毕竟不灵了。

卜居菁山草庐“种能洞” 静观大局

阎锡山被罢黜行政院长职务之后，于1950年3月16日由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05巷16号移住丽水街8号，独居小楼，致力著述，开始撰写《人应当怎样》。8月12日由丽水街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菁山草庐。此地原是当年侵占台湾时修建未完的一个农场区域。地区偏僻，交通不便，自来水、电灯、电话等现代化诸般设备均付阙如。其地乃废耕之茶田，杂草及胸，道路坎坷，距山仔后公路站步行须30分钟。经他雇工略加开辟，建筑草庐，并向金铜矿务局租地，避建“种能”农场，披荆斩棘，植松杉柑桔。

按此地区本属士林镇之金山（亦名菁山），初铺草顶木柱造房屋数间，取其僻静，便于从事写作。继感山西乡间之窑洞，冬暖夏凉，居住较为舒适，因命工匠凿石窑数孔，特名曰“种能洞”。阎氏曾勒碑述其筑“种能洞”的动机，题为《种能洞命名记》中说：“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那末，阎氏所标榜与炫耀的这

个“种能”，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向以种能观察宇宙”的“宇宙观”又是什么？他在一次主持孔子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典礼会上，作了《孔子与东方文化》的讲演，其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东方文化，是一个‘中’字，很明白，这个文化是尧传舜、舜传禹，以至孔子而集其大成。”他又说：“中”即是“种能”，世界上若把种子抽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小之如人与人之争执，大之如国内外之战争，均因失了“中”的缘故。政得“中”则政通，情得“中”则人和，制度得“中”则不会发生矛盾。“得中则存，失中则亡”。他的这一套说法就是他一向主张的所谓“中的哲学”，也就是他的宇宙观，他有一副自诩得意的联语为：“中为治事之极则，得中乃存，失中即毁；仁是从政之根本，安仁固善，利仁亦佳”。也足可说明此问题了。

阎锡山被去职后，曾一度有赴美或日本之说，因蒋介石对他的不放心而未获首肯，他也只好留在台湾，继续受制于蒋氏。其部属与其左右侍从人员中亦有劝他出国作寓公以静观大局之变化者，他却本着“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观念，



1959年阎锡山在台北

认为出国寄外国人之篱下，更无什么出路可言。且自己年已老境，住于菁山，以在野之身，静观形势，反倒有利。

据阎氏的家属们谈，他由太原逃出，到了上海时，即对他的全家以后的动向作了安排：将其继母陈秀卿、夫人徐竹青及二儿媳（二子阎志宽之遗孀）包括其三堂弟阎锡圻、四堂弟阎锡珩、五堂弟阎锡垣的家属送往台北（后此三家均赴美），在美设置了寓所，将其四子阎志敏与媳送到美国经营电业。后来其二儿媳偕其女亦赴美。此外又派他的一个堂内弟偕其五子阎志惠到日本，也作了设置寓所的计划，可谓“狡兔三窟”，考虑周全。从他1950年2月17日夜与杨爱源王怀明（字念文，由台赴美，后回台湾定居病逝，曾任教育厅长、省议会会长等职）王平的谈话中所说的：“我自从政以来，近四十年，每年只在旧历元旦清理自身准备死上应处理的事，我之家事，早年已处理完毕，无须再作考虑。……”可见其深谋远虑，诡计多端，根据处境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再分心于家事了。

10年山居反共嘶鸣 了却残生

关于阎锡山在菁山10年（自1950—1960年，68岁—78岁）山居的情况，有人曾作了概括的描述：“阎氏隐居金山，即专事著述，闭户不出。非国家大典或总统有召外，不轻易入市，每晨7时起床，晚10时入睡。午膳后休息2小时。其余时间即为会客、外出讲话、会议、思考与写作。晚餐后，独出野外散步数十分钟。就寝前，展阅床头木版《易经》以自怡……”

从这段叙述中，好像他已成为不再过问政治的人了，其实并非如此。阎氏是一个政治漩涡中斗争过来之人，山居十年中，他不惜拼出老命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一）借任“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之职，出席蒋氏召集的重要会议，面陈反共建议、发表反共演说。如：

1. 1951年1月23日作《土地改革问题》报告。

2. 1951年6月17日，应国防部总政治部之邀请，作《怎样胜过敌人》的报告。

3. 1951年7月30日，以所著《大同之路》呈送蒋介石。

4. 1951年11月15日，在蒋的午宴中，王云五提及整理中国文化，蒋请阎发表意见，阎讲“整理中国文化”（主要内容为其“中的哲学”）。

5. 1953年（时阎71岁）2月，在蒋的一次宴请中央评议委员，席间，阎发表题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结束韩战及对俄决策》的演说。

6. 1953年3月10日，在蒋于春节后邀宴各党人士及社会贤达席上，发表分析《马林科夫继承史大林后的政策》讲话。

7. 1953年4月10日，在蒋邀宴评议委员席间，阎讲《对苏俄马林科夫发动和平的看法》。

8. 1956年（时阎74岁）9月14日，蒋宴请中央评议委员席上，阎讲：《对时局的观察》（按：其要义为：美、苏两大集团不能并存，战因很大……）

9. 1956年7月17日，阎面陈蒋介石《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收复基础之意见》。7月18日，又将书面《意见》呈蒋。

10. 1956年4月19日，在蒋宴会中阎讲“两大集团的演变”（按：其要点为：时间不利于美而利于苏）。

11. 1956年9月17日，出席总统府资政会议，阎发表《对国际局势的观感》。

12. 1959年（时阎77岁）2月16日，往台大医院住院，继续修改《三百年的中国》及《世界大同》两稿。阎于4月24日复王念文函云：“我写书就是我最乐做的事，我是为古人鸣冤，为今人申冤，为后人防冤，如泉水外涌，越涌越舒畅。我在世的日子很短了。再有二年，就将我一切愿说的话，愿做的事，可以说完、做完了。我这虽不是闻道而死，可以说是尽情而死，了无遗



1950年，阎锡山在台北菁山草庐

憾。”

(二) 经常接受各机关学校团体邀请,在公众场所发表反共演说或讲话。在这方面,阎到台湾的前三年中最为活跃,几乎每周都有单位邀请去讲话或作报告,有时一天竟达数次,比如1952年1月12日至17日应台中市各界之邀请去演讲,每天最少讲三次,最多达七次。

兹举1952年1月14日这一天的活动量:

上午9时参加台中市政府动员月会,讲《共党的错误》;11时参加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孙中山纪念周会讲《怎样做一个党员》;12时孔资政德成(系孔子的七十七代孙奉祀官)邀宴,谈“复兴儒学,发扬东方文化,以补救西洋文化之不足,安定人类”。

下午1时30分对装甲兵学校讲:“怎样练成反共的军队”;3时对空军驻台中各单位人员讲:“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陆后重建国家问题”;5时参加台中市教育界第二次座谈会,讲:“中国前途之展望,收复大陆后之措施,目前国际形势之分析”;6时30分赴刘司令官安祺宴会;8时应国民大会代表台中联谊会邀请讲:《“美苏关系,中日关系,“匪”俄关系。》。

看了以上这样紧张忙迫的活动,真可谓,马不停蹄,每请必到,“席不暇暖”了。

(三) 经常在他的菁山草庐会见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进行“反共”、“诬俄”宣传。据吴文蔚于《艺文志》上所撰一文介绍:“阎氏虽卜居山野,但自他离开政坛后,每日远来晋访的人士仍络绎不绝;有政府显要、“民意”代表、军政首领、实业巨子、企业领袖、教授学者、神甫牧师、新闻从业等等,这些人士来自世界各地及台湾各界。”

(四) 接受记者的邀请,为中外报刊杂志撰写了大量反共文章。



阎锡山病逝后,蒋介石参加公祭

(五) 组织座谈讨论会,研究哲学、政治、经济等问题,儒家义理及现代各种主义,期能反共报国。

故弄玄虚的四副自挽联与感想日记

阎锡山在抗战前,于每年元旦家人行礼毕,即撰写或检点其本人之遗呈(指向国民党中央)与遗嘱(指对其死后之安排),是日上午不会外宾与亲戚,只传其随侍秘书陪侍抄录。此项遗呈、遗嘱均归其内勤队长(后改称侍从长、寿阳县人字惠卿,已逝)保管。

阎氏病逝于1960年5月23日,其夫人徐竹青、贾景德资政与旧属等在侧。于公祭及殡葬时,均遵其遗嘱分别写贴。

其自挽联、额如下:

一、贴灵前:对联为

“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

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额为 朽曷化欲”。

二、贴檐柱:对联为

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

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横额为 努力摆持

三、贴院中:对联为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横额为 公道爱人

四、贴院门:对联为

对在两间才称善;

中到无处始叫佳。

横额为 循中蹈对

他又自择其《感想日记》二则,遗嘱镌墓内壁上:

《感想日记》第一百段: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作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感想日记》第一百二十八段: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以上二段并未镌刻,据悉台方特制成小玻璃屏二,分列坟内。)

(责任编辑 杜晋)

蔡畅与陈毅前妻赖月明的两代情

● 赖昌明

赖月明说：这个故事对我自己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是想通过它让更多的人了解陈毅。

赖月明，1914年出生在兴国白石村，家贫如洗，三岁时就过继给了叔父，叔父吸食鸦片，家道中落，叔父只得将月明卖给了杰村圩一户姓谢的人家作童养媳。

1929年，红军解放了杰村，村妇女改善委员会成立。赖月明被妇女们推举为主任。1932年4月，瑞金列宁师范成立，组织上决定选派她去学习。结业时，少共中央特地指派她到少共江西省委工作。

她来到宁都，在少共江西省委办公处儿童局任干事。反“围剿”期间，她带领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协助妇女慰劳红军。尤其是组织儿童团实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做好事，得到了党组织的嘉奖。

宁都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城镇，被打倒的地主、土豪劣绅不甘心失败，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天夜里，儿童局通信员小曾被反动分子秘密杀害了。

蔡畅闻讯赶来，看到死者被肢解的惨状，泣不成声。赖月明和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哭了。

这次事件发生后，蔡畅要求少共省委制定严密的安全措施。一部分同志转移到省委，与省委的同志住在一起。赖月明有幸成了蔡大姐“家”中的一员。

蔡畅每天坚持教她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外出工作时，常带着她，让她在实际中得到锻炼。蔡畅在中央苏区亲自培养的妇女干部并不多，确切地说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赖月明，第二个是危秀英。

8月初，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部队在陈毅总指挥的率

领下回到宁都作短暂休整。苏区人民敲锣打鼓迎接凯旋归来的子弟兵。少共省委组织了文艺队进行慰问演出。

那天晚上，赖月明一首接一首的唱起兴国山歌。歌声激情动人，陈毅与兴国妹子赖月明相识了。

蔡畅得知陈毅对赖月明印象很好，非常高兴。她有意说合这桩婚事。陈毅自肖菊英去世后，一直孤身一人。蔡大姐对他很关心，要帮他重组家庭。

赖月明参加革命后，还是头一次碰到别人跟她谈个人婚事，有些不好意思。她想：陈毅平易近人，谦逊豁达，可自己只有18岁，又是个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怎么配得上一位红军首长呢？

蔡大姐耐心地开导她，给她讲起肖菊英的故事：肖菊英是陈毅在苏区的第一个妻子。

那是1931年1月17日，中共赣西南特区委成立，陈毅任书记，办公机关设在兴国县城，肖菊英调特区委任妇女部长。

此时苏区中央局正在“肃反”，不少好同志被当作“AB”团错杀。这场红色恐怖，人人自危，向来神情开朗，情感外露的陈毅变得沉默寡言，心头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阴云。他的情绪影响了年轻的妻子，肖菊英日夜为他的处境担忧。

4月份的一个夜晚，几个身背武器的红军干部来到陈毅住处，说要他去开会。在镇压“AB”团的日子，时常有人晚上被叫出去，从此就“下落不明”。陈毅感到他的这一天来了。他对妻子说：“菊英，要是我在天亮前没有赶回来，就可能

出事了。你不必再等我了！”肖菊英依着门框，目送丈夫离去。

这确实是一次会议，结束后陈毅怕妻子担惊，立刻策马急急赶回，不料途中遭白匪袭击，白马中弹而死，他只好与警卫员黄朝天取近道步行，两天后才回到兴国。陈毅万万没有想到，妻子竟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心里压力，精神恍惚中投井自杀了。

陈毅悲痛欲绝，送葬归来夜，油灯下整理亡妻诗文遗稿写下《忆友诗》：

泉台幽幽汝何之？

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

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

几回读罢几回痴。

人间总比天堂好，

记否诺言连理枝。

依稀门角见玉姿，

定睛知误强自支。

正当送葬归来夜，

幽幽泉台汝何之。

赖月明被陈毅与肖菊英生死不渝，柔情似水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蔡大姐为他们择定佳期：农历九月初九日。九九重阳，以示白头偕老，天长地久。

结婚前几天，陈毅抱来一捆布，要给新娘添置新衣。赖月明用它做了两套夏装和两套冬装，这在当时已够“奢侈”的了。

蔡大姐也把一块绸料递给月明，半开玩笑地说：“赣南的姑娘结婚时少不了提几个条件。月明，你也提几条。”

赖月明说：“我有六个条件：第一，别人结婚要办酒宴，我不能少；第二，为我买一件羊毛衫；第三，买一块手表；第四，帮我提高文化水平；第五，培养我入党；第六，陈毅不能离……”

赖月明与陈毅的婚礼在宁都东门一家餐馆举行。江西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和附近县委的同志都赶来祝贺。办了九台酒席，钱是赖月明的15元公债券和陈毅平日积攒下来的伙食尾子凑起来的。

他们的新房是在大路口的祠堂里，房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盏高足油灯。但赖月明感到非常满足，庆幸自己有个好丈夫。

“蜜月”是短暂的。几天后，陈毅离开了新婚的妻子，又投入到反“围剿”的紧张斗争。黄陂战役、东陂战役、组织各县模范师团，使他无暇回宁都看望妻子。

赖月明在后方除了负责儿童工作外，有时还协助蔡大姐做些妇女工作。

一天，蔡畅和赖月明到附近乡里检查妇女做军鞋和生产情况，使大姐奇怪的是：清明早已过去，怎么冬水田还没动犁？

赖月明告诉大姐：“现在青壮年都上了前线，留在家中的是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赣南妇女能吃苦，就是迷信，说女人动犁会遭雷劈死。生产就这样耽误了。”

后方生产跟不上，最终还是要打败仗。蔡畅穿上粗布衣服，光着脚，来到村中找到老农，向他们求教犁田耕地的基本技术。开头老头们都不同意，说这是“罪过”。一位姓谢的大爷见她心诚意切，壮着胆子教她。蔡畅心灵手巧，不到半天就掌握了。

蔡大姐学得犁地耕田的本领后，就召集宁都郊外的妇女，给她们当场示范，把刚学来的本领再传授给她们。赖月明看到身为高级干部的大姐能身体力行，做妇女的榜



赖月明

样，很是感动，卷起衣袖第一个下了水田。妇女们见他们并没有遭雷劈，胆子大了起来，纷纷下田学掌犁耙。赣南妇女大都是小脚或放脚的，水田劳动极为不便。为了抢农时，妇女们群策群力想了很多办法。根据脚的情况，做了分工。大脚负责犁耙田，小脚拔秧、莳田。为防小脚在泥沼中越陷越深，她们就搬来椅子坐着干活。由于妇女们的努力，农业生产争得了时间，青苗长势良好，秋季获得丰收。看着场上堆着金黄的稻谷，妇女们都说应给蔡大姐和赖月明记上一功。

1933年8月，江西省委决定选送赖月明到中央党校深造。正好陈毅、蔡畅和李富春去瑞金开会，于是，赖月明与他们结伴而行。

中午，他们到达瑞金。稍事休息后，蔡畅带月明去见毛泽东同志。刚踏进门楼，只见毛主席两手叉腰，在院内来回踱步，显然心情郁闷。贺子珍招呼她们进屋去。

院子一角圈着十几只鸡，贺子珍说：“附近老表知道他身体不好，把他们下蛋的母鸡都抓来了，要给‘挖井人’添些营养。”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排挤，被撤销了

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她们又去见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谦虚、随和，一张普通农民的脸让人觉得格外亲切。当得知蔡畅和月明还未用饭时，特地吩咐伙夫炒了两碗粉干“犒劳”。

下午，蔡畅要去参加会议，分手前，大姐将一支派克笔送给月明，嘱咐她好好学习。随后让通信员送月明去党校报到。

中央党校位于瑞金县城的东北约15华里的洋溪村，创办于1933年3月，是我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级党校。校长是董必武，副校长是冯雪峰，教务主任罗迈（李维汉）。赖月明这批学员共200多人，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选送的最优秀的同志，少量来自红军部队的政工干部、白区地下工作者和参加“二苏大”的部分代表，学员中有些东北同志。200多学员分成五个班：高干班（李坚真在内）、一班，班主任姓郭；二班，班主任冯文彬；三班，班主任吴仲康；白区工作班，班主任陈云。每班40到50人不等，赖月明编在3班。

党校生活是艰苦的。每天每人

定量只有12两米,合现在0.75市斤。学员们自备用蒲草编织的饭包。由于定量较少,东北来的同志不够吃,赖月明就匀出一半给他们。“卫生间”是大家齐心协力在水塘上搭起来的一间草棚,男女轮流使用。

党校教学大多数由领导同志担任,开设的课程有:《西方革命史》,由董必武讲授;《党的建设》由罗迈主讲;《政治常识》由冯雪峰主讲;音乐课是专职教员李培南和洪水教唱革命歌曲。1934年春夏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增开了军事课程,如游击战术、爆破等。

在中央党校这座大熔炉里,赖月明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入校不到一个月,就由党小组长肖财李和学习班长曾月茹(江西赣县人、江口区委妇女部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校管理严格,学习时间一律不得请假。一天,陈毅又来到瑞金参加会议。刚住下就吩咐警卫员到党校来找月明。分别两个月了,陈毅想开会前抽空见见妻子。

警卫员很快找到了赖月明,赖月明深知每一次相见都是宝贵的,一次见面也许意味着又一次长久别离。于是,她向老师请假。没想到得来的是“上课时间不准外出”冷冰冰的话。

1934年1月21日,瑞金城内外热闹非凡,中央大礼堂装饰一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700多人,旁听或列席者1500多,赖月明有幸作为旁听代表列席会议,并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2月1日,会议最后一天,第二次全苏大会进行选举。一致选出博古、陈绍禹(王明)、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结果公布后,毛泽东致闭幕词。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纷纷起身,正欲退出

会场,“哎呀嘞——”礼堂靠后的位置上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大家知道,这是兴国山歌的起始语,又可以吃饱耳福了。

“白区的同志催(我)话(告诉你),

要把‘二苏’的精神传下去。

号召工人来罢工,

发动农民来暴动。

为了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

声音是那么地熟悉,这是月明吗?陈毅、蔡畅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向她挥手致意,并为她鼓掌。

会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会者无不佩服这位只有十八九岁姑娘的胆量。她人美,歌声更美。

“二苏”会议刚结束,第二期党校学员进行了毕业考试。赖月明各科总分名列第四,在所有女学员中位居第一。

文化考试结束后,全体学员赴福建河田实习,主要任务是参加当地“扩红”。

一个月的实习结束了,学员们回到瑞金,总结会上,赖月明实习成绩评为第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她颁发了奖品:一条脸巾、一支牙膏、一把牙刷、一百张白纸和一本日记本。周恩来对她予以很高评价,称她是“党校第一女子”。

蔡大姐看到月明日益成长起来,甚感欣慰。她亲切地说:“月明,我本想把你留在身边,可地方工作更需要你。组织决定让你去石城任妇女部长,独立开展工作。”

赖月明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说:“我明天就走!”

“不,你们夫妻好长时间未见面了,陈毅同志回来再决定吧!”

一个月过去了,仍不见陈毅回来。一天,蔡大姐通知她说:“明天省里有四位干部去石城,你准备一下,跟他们一道去,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到那里有什么困难,就写信回来。”

石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

蒋介石集中50万精锐部队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仅北线就投入了33个师另3个旅和1个税警总团的兵力,来势十分凶猛。石城危在旦夕!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急如星火赶往前线,部署兵力。

在石城阻击作战的日日夜夜,赖月明在小松区组织支前工作。她号召青年上前线,仅9月底就送了35名青年参加红军。为配合前线作战,她率领老弱妇幼坚壁清野:筑夹墙隐藏粮食、封水井、藏炊具。红军需要军鞋,赖月明又领着妇女彻夜不眠,赶编草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将11870双草鞋送到了前线指战员手中。阻击战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小松视察工作,满意地说:“小松的支前工作做得很好!”

经过十几天的苦战,红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战斗到10月6日,红三军团原来的老连长大部死伤,肖华领导的少共国际师也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减少到五千余人。7日,敌人占领了石城。

赖月明与三名同志一起向红都转移。一路小雨,一路硝烟。她不知道陈毅现在怎么样了,蔡大姐也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赖月明赶到瑞金下坝,这里的气氛更是紧张:马车装载着成堆笨重的物件,随时准备远行。

赖月明四处打听陈毅、蔡大姐的消息。三天后上午,她拖着疲惫的身子正欲回住处,突然发现前面走过几个人来,原来是梁柏台和毛泽覃。

毛梁二人告诉了她陈毅的住处,赖月明听了差点笑出声来。自己就住在陈毅隔壁。几天里几乎找遍了整个下坝,就是没有到隔壁打听。

赖月明喜出望外，直奔陈毅住处。警卫员把她让进屋。掀开门帘，她惊呆了：陈毅右腿缠满绷带，用一根白带子吊了起来。

赖月明见状，扑了过去，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

陈毅反而安慰妻子，把月明拥在怀里。

石城阻击战失利后，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0月8日，陈毅看到医院的器械都已打包，心中预感到红军有新的行动。怎么没有哪个通知他呢？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命警卫员李先基给周恩来送去。

次日，周恩来赶来医院，并带来了汽油发电机。他察看了陈毅的伤情，指示把装好的医疗器械取出来，给陈毅伤腿拍片。随后，医务人员给他做了手术，取出了作祟已久的骨碎。

周恩来一直站在床前，待陈毅从麻药中醒过来后，正式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主力红军明天黄昏后开始行动。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和梁柏台分别任政府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

第二天傍晚，远近山头渐渐涌起了团团雾气。陈毅忍着疼痛到中革委驻地，为战友们送行，同去的还有毛泽覃、梁柏台和《红色中华》的主编瞿秋白。

博古慢条斯理地说：“陈毅同志，本来我们是想把你抬走的。考虑到你在江西工作时间较长，党内党外都有较高威望，便于开展工作。项英在江西只有两年，缺乏游击战的经验，所以把你留下来，协助项英同志。”

陈毅明白，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无论去留面临的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危秀英和钱希钧等31位女同

志被批准随中央机关转移。走前，蔡畅留下了一个小布包，赖月明打开一看，是一件重丝呢的列宁装和的一封信，信中说：

月明：

本想等见到你再走，但局势紧张，行程已定，来不及面别了。

陈毅同志现在伤势较重，你留下来好好照顾他。

主力部队走后，留给你们的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碰到多大困难，都要坚持斗争。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蔡畅

10月10日

赖月明手捧小布包，流泪千行。大姐，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们何时才能相会？

一等等了38年。

1972年1月，于都仙下寒风裹着细雨，雾气笼罩群山。村庄周围的田野水汪汪的，散出阵阵寒气。

这天，通往圩镇的一条泥泞的田间小道上，走着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太。二十多分钟后，老太太出现在积着泥水的街上。

“……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低沉的声音。

是他，是他！蓦然间她觉得脑中一片空白，手脚冰凉。她暗暗地提醒自己，千万别倒下去。山在移动，水在倒流，赖月明踉跄地朝家走去。

她没有进家门，而是坐在屋前的石板上。38年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个不幸，一个令她心碎的不幸。赖月明凝视涓涓流水，远眺黛色群山，万般思绪涌上心头……

那年10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中央分局驻龙泉村，陈毅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驻石口村谢家祠堂。红军家属分驻两地。

晚上，陈毅对身边的妻子说：“我们的队伍中老人妇女小孩很多，加上一万多伤员，行动慢，目标大，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月明，你看怎么办？”

陈毅刚把话讲完，赖月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着他的双腿，说：“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现在你又要我走。我就是不走！如果你一定要我走，就开枪打死我算了。”

陈毅耐心地说：“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也为了游击队的机动灵活，家属们一定要疏散。领导干部的家属更要带头，以实际行动说服其他同志。”

在随队家属中有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温吐秀，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傅连璋的妻子周月林等。

陈毅接着说：“月明，你走吧！我也一定会找你的！”

陈毅要宣黄县委组织部长，兴国人万香送月明回老家。第二天清晨，天空飘着蒙蒙细雨。陈毅把月明和万香送到村口。妻子就要走了，陈毅从身上拿出平日积攒下来的四块银圆塞到月明的衣袋里。

陈毅和赖月明就这样分别了。

赖月明回到老家一星期后，兴胜县委在于都桥头成立，赖月明任妇女部长。

蒋介石弄清红军主力的去向，调集20多个师包围中央苏区，叫嚣“石要过刀，人要换种”，不能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

兴胜县委决定打击叛徒，为革命力量的保存和发展铲除障碍。县委所有同志分赴辖区各地，掌握情况，组织打击叛徒工作。赖月明分配到敌情最为复杂的汾坑、邹坑、潭石三角区域。

一天，她来到一条大路旁，突然发现前面烟尘滚滚，冲过来一支

队伍。还未等赖月明辨认清楚,只见领头的那位青年飞身下马,站在了她的跟前。赖月明定睛一看,原来是党校同学黄石志。

黄石志是去吉安传达党的指示,他给赖月明带来了一个消息:陈毅已痊愈,这几天在都黄麟(原黄龙)井塘一带活动。这是分别三个月后第一次得到陈毅的消息,赖月明恨不得马上见到自己心爱的丈夫。她决定,向县委汇报完工作后就去找陈毅。

经过三个小时路程,赖月明赶到桥头,得知县委已迁往莲塘,又接着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在一位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县委新驻所——那里已是一片残垣断壁。早在半个月前,反动铲共团抓走了所有在场的同志后,放了一把火,兴胜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第四天傍晚,赖月明兴冲冲地进入井塘村。就在这前一天晚上,陈毅率红军转移了。

赖月明带着像灌了铅的双脚回到家。不意叔父早已手持扫把,站在村口怒目而视。他不让月明踏进村里一步,赖家没有这样一个“土匪婆”。

家在何处?赖月明默默地朝当地最高的山峰九山走去。山中的一座破庙就是栖身之所,野菜和水是她每顿的食物。只因心中有盏不灭灯,只因心中有个日夜思念的郎君,她顽强地生活着。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生父听说女儿在九山避难,老人流泪了。他拄着拐杖到山中把月明接出山来。赖月明结束了野人般生活。

1935年7月初,白石村来了一个肩挑小贩。

“鸡毛换线——”,“卖牛筋糖——”,“卖女人首饰——”声音响亮悠长,似乎非得把屋内所有的人喊出来不可。

这“货郎”是赖月明党校时同班同学罗昭荣,时任油山游击队侦

察员,这次下山是奉陈毅之命来白石村找赖月明的。他悄悄地告诉月明:“陈毅在信丰一带打游击,分别半年多了,他很想念你,要我转达他对你的思念和问候。”

赖月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说:“明天你带我去找他,即使是要饭也要把他找到!”

罗昭荣十分理解赖月明此时的心情,真不想让她失望,可又一想,国民党对油山日夜搜剿、封锁,再说,陈毅也没有交代要把月明带上山去啊!罗昭荣为难了,只随口说了一句:“那好吧!”

这是一个漫长的黑夜,启明星还未升起,赖月明已坐在了家门前的土坪上,两眼注视着那条田间小路。太阳升起来了,她来到村口,又坐在大榕树下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夜幕降临,她还伫立于山坡上,四周仍空寂寂的……

时间到了1949年4月,解放战争胜利的喜讯频频传来,给这个春天带来了融融暖意。更使赖月明感到欣慰的是:据说陈毅与其他解放军将领率百万雄师南下,她与陈毅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赖月明心情激荡,加紧寻找党的组织。4月底,她来到兴国县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经十几年了,几乎断了一切线索,找起来又是何等的不易。在街上转了大半天,她渴了,累了,朝一家茶馆走去。突然,有人在后面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粗声粗气地说:“往哪里逃?”赖月明转身一看,讲话者是原江西军区文艺队演员吕继鸾。

1934年初,苏区成立文艺队——蓝衫团。后来,由于李伯钊建议,蓝衫团改为江西军区剧团,全团人数30多人,分成三组:演戏组、乐器组、事务组。吕继鸾在演戏组他是苏区有影响的演员。江西军区剧团于1935年春节在井塘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后宣布解散,这样,吕继鸾就回到了兴国。

吕继鸾、赖月明都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两人约定:分头寻找党,谁先找到都要通知对方。

这年桂花飘香时节,赖月明收到了吕继鸾的信。信中说:我来到赣州,大约10天前,一支解放军部队(后来得知是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三〇团)解放了这里,我向解放军的一位领导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特别说明了月明同志可以证明我的一切。结果我留下了,分在军管会工作。请你一定来赣州找我。

赖月明两眼闪着幸福的泪花。丈夫老方见她如此兴奋,问道:“有什么好事?”

赖月明把信递给他,说:“天大的好事。”

老方很快把信看完。他“嗤”地一声把信撕了,重重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共产党对叛徒向来是毫不留情的,你不怕共产党把你当叛徒杀了?!你别想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

1954年11月的一天,赖月明背着刚五岁的儿子军寿走进仙下百货商店,她突然眼睛一亮,柜台上那张报纸上与外宾站在一起的共和国的副总理,不就是她当年的郎君陈毅吗?她百感交集,回到家里向老方叙说了自己与陈毅的前后姻缘。丈夫老方知道妻子是个苏区干部,曾是共产党员,但她与陈毅结过婚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他听罢大吃一惊,莫非妻子想党想得神经出了问题。当赖月明再次叙述了这段似有传奇般故事并要上北京找陈毅时,他信了,信得很不自然,他说:“陈毅是你以前的老公,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我们有了儿女,你一走,我这个家就要散了,你不能走!”

儿女们听懂了母亲的话,个个扯着她的衣衫大哭起来:“妈妈,妈妈,您不能走,您不能走!”

赖月明看到这些年幼的孩子,

个个哭得像泪人一般,只得再次饮下这杯又苦又涩的酒。

时间转眼到了1962年5月。

吕继鸾恢复党籍后,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领导和同志的高度赞扬,这年她刚当上赣县副县长,又给赖月明写信,希望她能到赣州一叙。

赖月明收到信,没有过多思量,就决意放弃了。原因是这之前她回兴国娘家探亲时,听说了这么一则故事:

某位厅级干部,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扩红中参加红军的人。1934年10月初,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到于都集中。队伍途经银坑镇,家中老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急赶30里来看望亲人。这位战士因拉肚子十分虚弱,母亲心疼地问:“你们就要走?孩子,想吃些什么?妈回去给你做!”

战士回答道:“我想吃母亲做的腌菜。”

母亲和妻子连忙顺原路赶回。第二天,母亲和妻子又来到他跟前。母亲捧上钵头,说:“孩子,带在路上吃吧!”

妻子怀着眷恋:“我们的孩子就叫盼新吧!盼望新的幸福生活,盼望父亲早日回来!”

解放后,这位带着战争伤疤的战士成了某省一个厅的负责人。几年后,他从省城回乡探亲。母亲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反动派刺瞎了双眼,妻子支撑着这个家,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岁月,如今终于盼到了亲人回来,怎不让人高兴!妻子用布满老茧的手在他的脸上抚摸着,说:“阿贵,这回你不能再走了!”

第三天的黎明,勤勉的妻子照例早起,丈夫已不在身边了,只见枕边端正地放着50元钱和100斤粮票。

他走了,似乎内心藏着苦衷。妻子为了解究竟,次日就追来省

城。人是找到了,但家门不得进,只能站在楼下与楼上的丈夫“对话”。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干部已另有妻室,据说内人还很厉害。

赖月明想起这事心里就害怕。如果自己真上北京结果会怎样呢?会不会影响陈毅的形象呢?

赖月明把信寄出后,就三天两头到大队部打听情况,查询有没有她的信。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68年春仍是没有消息。她要儿子军寿再写一封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又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月,一辆轿车卷着烟尘驶进了仙下公社小院。仙下是于都通往南昌的必经之地,毗邻宁都、兴国,时常能看到轿车经过,但轿车停在公社小院,这还是头一次。公社书记罗华伦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走出办公室,一时不知所措。

车上走下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县委办公室主任介绍说:“这两位同志是程世清主任派来的。请你们协助查找一个人,她叫赖月明。”

罗华伦把客人们带到洋田大队,大队书记方奕梯不容置疑地说:“我们大队没有这个人!”在客人们的要求下,方奕梯拿出户口登记簿逐页查对。真有此人,是方良松的妻子!不过,当地人都习惯地称她为“崇背新人”或“崇背奶奶”,即是山那边嫁过来的。久而久之,村民们就渐渐地把她的真名实姓淡忘了。

来访的客人和赖月明见了面,并详细询问了她的过去现在,说:“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子孙满堂,生活美满。陈毅同志也已另有妻室,也是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同情你的处境,要是孤身一人的话,可以把你接走,按有关规定安排你的生活。现在看来,你就不要去北京了。你去了,对双方的家庭都不好。”他停了停,又说,“陈毅同志现在的日子也不大好过。”

赖月明原是欣喜,听后心中一片茫然。过了一会儿,她提出希望陈毅能不见她或亲自给她回个信,以了却多年的愿望。

几年过去了,还不见有任何音讯。陈毅出什么事了?此时,她更为陈毅担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党中央决定坚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开赴抗日战场。

这年10月,陈毅从赣州到兴国参加国共谈判住进了县城芳园旅社。这晚他久久不能成寐,“回忆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昂首夜空,联想翩翩,写下一首凄惨悲凉的诗:

兴国旅舍

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兴城旅夜倍凄清,
破纸窗前透月明。
战斗艰难还剩我,
阿蒙愧负故人情。

这首诗看似通俗,但一直未能释其真意。本来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南方游击健儿扬眉吐气“下山来”。将军应是豪情满怀,精神振奋,又为何独自“倍凄清”?据查十月四日,农历是九月初一,俗语称“初三初四蛾眉月”,初一是彻夜无光,“月明”从何说起?再说古今诗人借月抒情,皆言“明月”,陈毅为何独用“月明”?诗的后两句感情凝重,字里行间透着对故人的怀念和愧疚,这是为什么?

陈毅与赖月明分别后,他曾多次派身边工作的同志去看望过月明,但自1935年底起,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在“持枪推枕”、“空山夜静”、“大树遮身待晓明”的日子里,陈毅常常遥望星空,心里呼唤着月明的名字。“月明,你在哪里?”这次来兴国,陈毅一面与熊式辉谈判,一面派身边同志继续查询赖月明的下落。得来的是赖月明投井自杀了。他心情沉重,自责愧对妻子,

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9年冬由朱克靖介绍，陈毅与本支队战地服务团的张茜结为夫妻。

解放后，陈毅一直以为赖月明早已不在人世了，也就再未找过她，只把思念长驻心间。

1967年赖月明发给陈毅和蔡畅的信，他们是收不到的，因为那时正是“文革”，多少人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陈毅、李富春和蔡畅已处逆境，无自由可言，他们哪会知道赖月明还活着，还在苦苦地找寻？

陈毅逝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赖月明击倒了。她把丈夫叫到床边，无力地说：“老方，你去厅堂立块灵牌，替我烧几炷香，算我对陈毅的最后一点心意吧！”

丈夫理解她，轻轻地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转身出去照办了。缕缕轻烟啊，你是否能飘去远方？

儿子军寿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思，拿起笔代母亲写信给张茜，遥寄远方的问候。

江西省委委员、妇委书记危秀英1954年去北京开会，会间抽空去看望她在“革命大学里的恩师”蔡畅大姐。

好多年未见面了，危秀英一见到大姐，禁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流个不停。

蔡大姐交待她：“你这次回去，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赖月明。如果是牺牲了，就替我在她的坟头放上一个花圈。她是一个好同志。”

危秀英一直把这事挂在心上。身边工作的同志有去赣南的，她总要他们带上一个特别任务：寻找赖月明。有从赣南来的同志，她也总是要打听或要他们回去后协助查找。

20多年过去了，兴国、石城、宁都……都找遍了，得来的都是同

一个答案：查无此人。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心情舒畅。蔡大姐扬眉吐气。她又想起了那件往事，要危秀英继续查找。

1985年元月6日，赖月明发出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国妇女》杂志社，另一封直接寄给蔡畅。

编辑得到这封信很沉很沉，这是一个革命老人发自内心的呼唤。他们当即把这封信转给了蔡畅的秘书蔡阿松。

几乎与此同时，蔡畅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信写得很长，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综合说出它的内容。

……1934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兴胜县委遭到彻底破坏，我成了县委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我保存了部分文件，后来为去找陈毅，我把它用箱子装好交给一个亲戚，要她妥善保管，没想到，她怕连累自己，把它烧了。

为免党证丢失，我把它塞进了山上一座破房子的门框里。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我秘密地嫁到了仙下一个姓方的家里。父亲为了我的安全，就对外散布消息：女儿投井自杀了。

这个丈夫是个鞋匠，人老实，本份，一年后我们生了一个女孩。一次外出，我就再也没见着他回来。他得了病，没有钱治，死了。

我干起了卖水酒营生，上有老人，下有小孩，活得太累了。1945年，有人给我作媒，认识了方良松，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他是第四次反“围剿”南城战斗负伤的红军战士。他右腿落下了残疾，生活上要有人照顾，也就答应了。后来我们生有两男一女，生活得很好。

在仙下的这些年，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也没有停止斗争。我要求恢复党籍，他们要我提供证人。熟悉我的人要么叛变了，要么牺牲了，我想起了山上的那座房子。

我顶着烈日，来到山上。房子依旧在，门框虽已腐朽，我开始找党证：用手指抠，没有。用树枝撬，没有。门框掏空了，没有。

我从附近借来锄头，挖掉了两边的土砖，门框倒下来了，还是没有见着那两指半般大小的党证。我伏在土砖上，哭不出声来……

尽管我现在没有恢复党籍，但我没有停止交“党费”，自解放到现在，我总是将一角钱按月锁进小箱里，30多年从不间断。

蔡大姐，我今天投书给您，并不是要得到特别照顾。只希望能到北京来见见大姐。

蔡大姐看完了月明的来信，这位坚强的女性流泪了：月明妹妹，你受苦了！她当即向秘书口授了意见：解放后，我没有向中央提一个要求或解决私人问题。但这件事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尽早解决。

意见和信转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四个月后，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处理意见直飞于都县委，原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中办字(85)赣字142号
中共于都县委：

你们好！我们受蔡畅同志委托给你们写这封信。

蔡畅同志最近接到你县赖月明同志的信(信附上)，信中所讲她于1929年至1934年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并与陈毅同志结过婚这段历史，蔡畅同志说她是了解的，情况属实。赖月明同志后来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家乡，但只要她没有做什么不利于革命的事，我们对她还是应给予热情关怀，肯定她那段历史。因此蔡畅同志希望你们抽空派人前去看望她。和她谈一谈，在政治和待遇方面，请按照党的有关规定，予以研究，适当帮助她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使她感受到党的温暖。如果她能够提供一些宝贵历史资料,也请予以协助。

另,蔡畅同志因年老多病,长期住在医院,不宜于会客,也请你们代为致歉,婉言劝她不要来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5月14日,信函送到了于都县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两天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党史办主任、民政局长一行带上慰问品来到赖月明家中。

一切都清楚了,赖月明喜上眉梢。大姐还记得她,且还是像当年那样那么关心她。党组织也承认了她。她表示,就暂不去北京了。

5月25日上午,县委会议室,县委、县政府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讨论了赖月明的待遇问题。5月29日,县委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做了汇报:县民政局定期发给赖月明生活补助,每月30元。

又是两年过去了。

一天,绿衣人给赖月明送来了已知她下落的危秀英的信。信中说:大姐近些日子病情有些加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们宁都相别,就再也未相见。还是去趟北京吧,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988年9月,正是北京枫叶生醉的季节,赖月明在小儿子方斌的陪同下,来到了首都北京,当天下午就找到了钱希钧的家里。

钱希钧了解到赖月明的来意后,颇感为难。“月明,蔡大姐病了好多年了,现在连讲话都不方便,一般很少会客。前几天,大姐一个妹妹从湖南来,希望能见上一面,但大姐还是没有同意。你去恐怕会一样的。”

赖月明没有灰心,又接着找到全国妇联,请求妇联帮助。工作人员对她很热情,让她留下地址,说等联系好后再通知她。

几天过去了,她又去妇联,仍



1988年9月,分别54年的蔡畅和赖月明终于在北京医院相见了

未传来一个字。

赖月明无奈地对儿子说:“方斌,买好车票,明天回去!”

快走出大门了,一位工作人员追了出来。急促地说:“快,快!大姐答应见你们。我们马上送你过去。”

两位老战友,两个老姐妹终于在分别了54年后相见了。

半个小时的相见是短暂的。赖月明正欲起身告辞。蔡大姐忙拉住她的手,示意照张相。54年与半小时,这是多大的不等式啊!赖月明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又“唰”地流下来。

秘书操起相机,见她哭得像泪人,两次想按快门,都没敢。他说:“赖老,您笑一笑,您这么难过,我的手也在抖!”

蔡大姐握住她的手,安慰她。秘书终于把快门按下了,但赖月明还是没有笑起来。

1990年9月11日6时22分,蔡畅同志在北京医院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了。消息传来,赖月明以农村祭奠逝者特有的方式哀悼了她敬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前些日子,我带上完成的稿子来到赖月明家,恰逢圩日,见她忙里忙外,不停地给顾客添水酒——

农民们赶圩常渴这个解渴。看到我她笑着说:“现在搞市场经济我也要劳动致富。”这位革命老人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朝小康迈进。

(责任编辑:刘家驹)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特色●

●立论严谨
●史料扎实
●观点新颖
●学术性强
●奖掖后进
●体裁多样
●长短不拘
●文字流畅

●栏目●

●专题研究
●史学理论
●专题述评
●人物研究
●史实考证
●读史札记
●书评书讯
●学术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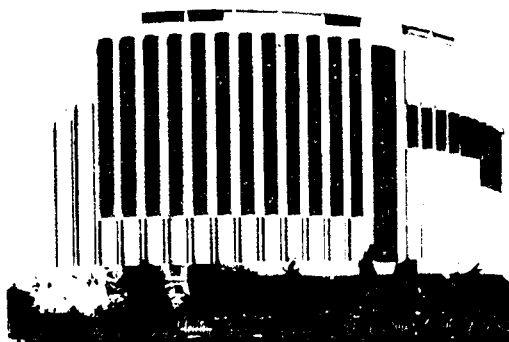
双月刊 大32开
邮发代号 82-472
统一刊号 CN11-1215/K
单 价 5.00元
主 编 曾业英
副 编 雷 颐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 码 100006



历史不再回头

——几个当代私人企业家的素描

●李德复



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注册数目已超过 30 万户,从业人员超过 500 万人,投入资金超过 1000 亿!其特点为,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已成为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笔者在内地湖北武汉选择了三位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家作素描,不知能否从这几滴晶莹的水珠中,透视出大海的辽阔与宽广。

私营公心： 一个蛇吞 象的当代 现象

1. 1994 年 1 月 13 日下午,我在原武汉火柴厂的大门口看到了一幕:一个高 1.78 米的男子汉拦住了一个 1.68 米的男子汉,轻声地喊了一句:“李总。”

1.68 米的微微抬起头,没吭声。

“李总。”

对方还没吭,在默默地思索。

“您一江水都喝了,未必这一口水还喝不下……”

1.68 米的抬起头,举目远眺。前方是一排排耸入云际的高楼。高楼前面则是日夜奔流不息的滔滔长江。

他在思索什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么?还是大江东去浪淘沙……

2. 他是谁?他就是 10 年前在汉正街练摊——而今是领导九

个子公司、工厂、研究所的武汉大地(私营集团)总部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裕安!

10 年前,他和袁军父子经营小百货,分得利润 7000 元,就由这 7000 元起家,平地垒起了高楼,而今资产总额达 6000 万!

10 年前,当他以个体户的身份,从显赫的、有百年创业历史的、称之谓我国三大火柴厂之一的武汉火柴厂大门口经过时,他能想象得到——10 年后,他用 4080 万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这个有 1800 名职工的大厂,成为这里的、至高无上的总管!

10年前,又有哪个新闻媒介注意到这个拥挤在汉正街窄狭门面的小小经营者,而今他不仅是武汉市、湖北省的新闻聚光点,全国的、甚至海外的报刊,也以动情的大标题和篇章在渲染,在传播:

《蛇吞象……私营企业买下国营大厂》(《长江日报》、《上海文汇报》)

《武汉私营企业(大地集团)兼并(购买)国有老厂》(香港《明报》、《星岛报》)

……

我在这里访问了三天,一直在想:蛇怎么吞了象呢?据了解,经济实力雄厚的三峡工程驻武汉办事处、长江动力(集团)总公司、长印公司等七、八家堂堂国营大户,都因畏惧火柴厂离退休职工多、债务大、包袱重而未敢叫板,而这个曾为汉正街的小户人家、现在的私营老板李裕安,竟如此雄心虎胆,蚂蚁背负泰山,硬是把这庞然大物独吞了!

道理似乎谁都清楚,就如武汉电视台在系列新闻述评中概括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企业生死是一种正常现象。对失去竞争力、亏损严重、濒临破产的企业,或由国营大厂兼并,或拍卖给私营企业,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这个“天经地义”具体到李裕安,他又是如何想、如何作的呢?

我问过李裕安。开始,他没正面回答,却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年,某厂在他公司买了8台设备,价值64000元,由于该厂采购员业务不熟,选购设备规格有错,安装后温度一直不合要求。怎么办?当李裕安了解情况后,立即派人给这厂送去配套规格设备,使买方生产迅速运转正常,尽管李裕安的公司为此倒赔了两万元。

“你为什么这么荏(注:武汉话,荏是愚笨的意思。)?”我问。

这个下过农村的老三届学生嘻嘻地叹了口气,“不知怎么回事,老人家的许多话,像是打在心坎上的阶级烙印。见不得别个倒霉,就像是自个掉进了下水道……”

“那你还发得了财?”

“怪,越是这样,人家越和我做生意,这叫什么?无形资产呢?东西湖陈尔程的啤酒厂——这样的资产有2000万!我这里也有那么一点,总归是赔得少,越赚越多,就这么从汉正街,一步一步地迈上了解放大道!”

我笑了。

他也笑了:“你看,这4080万元,要是不买火柴厂,存进银行,我一家睡到被窝里吃五辈子,也吃不完!”他眯了眯眼,“可老人家又讲啦,不解放全人类,能解放自己?我可是汉正街的穷伢子出身!”

发了财的穷伢子真能这么想?真是这么想的呀!来之前,一个记者告诉我:“在李裕安买了火柴厂,感到资金十分紧张时——又主动

向武汉残疾人组织捐献了45万元!”

我的脑子忽地乱了——如今,有人办公营企业,却隐藏着乌黑的私心;而他,办私营企业,却私营为公,私营公心!

3. 当我告别火柴厂旧址,找了曾在厂门口遇到的、1.78米的男子汉——原火柴厂的厂长冷永礼同志:“你叫李裕安喝的那口水——指的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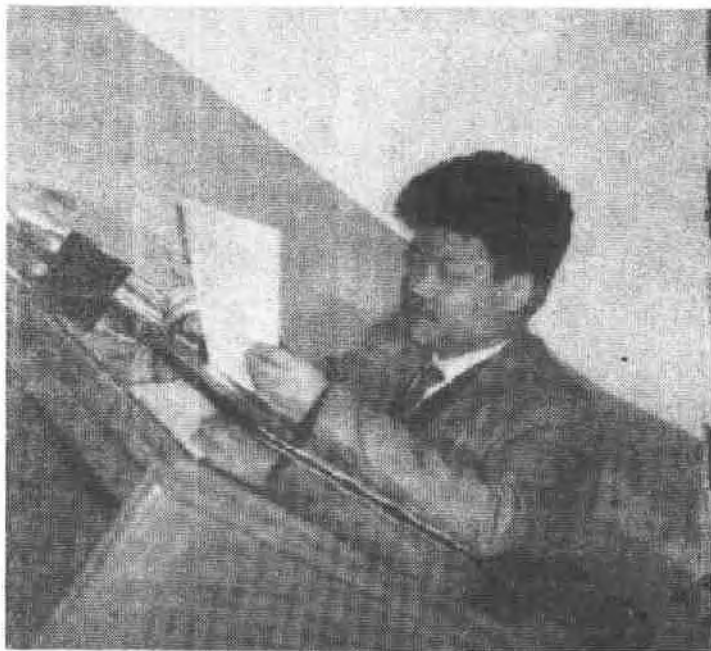
“请他在春节前,把原火柴厂1800职工的、今年元月份的工资发了……总共10多万元,要让大家过春节呀!”

“这水他喝下去了?”

“喝了。”

“海量!”我想,这是在他刚向武汉残疾人组织捐献45万之后。这10多万的开支,未在他计划之列。

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呵,是不是在塑造有特色的中国私营红



“蛇吞象”的李裕安



“黄金翅膀”陈纯朴

色企业家?!

大地(私营集团)公司啊,真是站在共同富裕的大地上?!

黄金翅膀: 一只飞往 国外的“九 头鸟”

1994年5月20号的晚餐,我吃着吃着,脑子忽然来神,向正逼我喝排骨汤的妻子发问:“怪,他这么年轻,就投资……武汉——人民币一个亿!”

“谁?”

“还在国外买了四万公顷地……”

“别人到国外当皇帝,你也只望到。”妻子点着我的鼻子,“喝汤,喝汤!”

我心里感到困惑的这个人,叫陈纯朴,武汉外商会员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 我第一次见陈纯朴,印象最突出的,是他那口雪白雪白的牙

齿,配上那张男人气十足、黧黑黧黑的脸,白牙还发出炫目的闪光。特别在他给我讲了他的童年,他的解放军的生涯……我总觉得,他的既曲折又传奇的身世似乎与他的白生生的牙有关。

他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三年来到人间。当时,祖国正欣欣向荣,而他由于种种原因在遭罪,随奶奶住在偏僻的农村,像石缝里的一棵小草,靠着慈祥祖母的温暖滋润,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长出一颗颗幼嫩的白牙,又换成一颗颗坚实的白牙。他从小就学会咬紧牙关过日子。

上小学——他来到了武汉,1966年刚毕业,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浩劫。在“读书无用论”的冲击下,1969年他总算在武汉黄石路中学初中毕业;接着便被下放到“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料僵疙瘩土,做饭没柴烧”的湖北枣阳县清凉公社姜岗大队。尽管是“顿顿红薯芝麻叶,起早贪黑不能歇”,知青们还得在节假日上山砍柴。每逢此,16岁的他,凌晨4点起床,带着干担、砍刀,赶路40里,把柴砍毕,回来又四十里!一次,他挑柴下山,

又累又饿,眼一花,竟滚下陡坎,鲜血直淌!但他咬紧牙关,挣扎站起,嫩嫩的肩膀载着生活的重荷,又一步步迈向苦难的生活!

就因这一口雪白雪白的牙咬紧再咬紧,是莎士比亚在《辛白林》剧中讲的吧:“困苦永远是进步之母。”只要耐过这一关,陈纯朴自己都说:上帝也会帮助我!果然,由于他劳动好,群众关系好,农活干得漂亮,等汉阳钢厂来枣阳招工,当地千群一致推荐,他便回到武汉。

2. 来到汉钢,陈纯朴不仅是个好工人,还是业余文工团的骨干。也许他在这方面有天赋:小时候,一次他看《洪湖赤卫队》回,就能学剧中正反角色,演给奶奶、姑姑看,还真是那么回事!

由于他能歌善舞,几次业余演出,名声一下传开,尽管是“文革”时期,为宣传当时的“政治思想路线”,许多部队文艺团体都找上门来。

开始,是武汉警备区文工队招演员,初试60人,取10人复试,他是复试中佼佼者,复试后,他又名列第一。按说,没问题了吧?但世界上的好事总不一次到位。尽管他个人政治表现好,业务挺拔尖,谁知老天爷安排他的一个亲叔叔在台湾。一政审,就被刷下来。么办?依陈纯朴的脾气;只有咬咬白牙,再瞅机遇!

机会果然又向他招手。湖北省军区文工团在招文艺尖子,他去应试,又得满分。主考人非常喜欢他,得知他政审有点境外关系,还四处为他疏通,但终没跨过那敏感的门坎,第二次被淘汰。好个陈纯朴,依然咬咬白牙,继续等待!

罗曼·罗兰说:“机会过来时,不可能一伸手就抓住。”20郎当岁的陈纯朴,仍不甘心,天天注视命运之神——看能不能在他面前再闪现一次偶然中的必然……也许

是老天有眼，不多久，第三次考验降临，解放军空降45师招文艺兵。他如过去一样，一考即中，但考后，他立即如实地将前两次为何不能进部队的原因告诉了主考人。主考的解放军干部姓王，被小伙子精湛的文艺技巧迷住了，被其诚恳老实的态度感动了。难道一个有文艺前途的青年人，就因有个从没见过的台湾亲戚，便不能参军？这太不合理了，这不是真正执行党的政策！于是，他把此事直接汇报给师党委，师党委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陈纯朴这个青年，我们收定了！当天，是大年三十，陈纯朴得到通知后，浑身震颤，热泪盈眶，连夜赶赴部队。在那个时代——对他和他的一家人来讲，这无疑是中了“状元”的天大喜事！现在，陈纯朴一谈及此还甚激动，说：“从那天起，我深感，耐心、忠诚、执著，追求，抓住机遇永不放……是会感动上苍的，命运亦会转好的！”

就因来之不易，他一到解放军这个大熔炉，浑身便有使不完的劲。在他的带动下，他所在的师文工团，连续三年在本军文艺调演中荣获第一，他自编、自演的歌舞《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受到上至将军下至战士的一致好评！当年的老兵到今天还称赞：他是咱们的金翅膀、亮歌喉！

3. 一个优秀的、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一个毫无做生意经验也无丰厚家底的年轻人，怎么不到10年又变成阔老板、大富豪，且是外商俱乐部的老总兼董事长了呢？一个人的成长，无非三因素：天赋，后天的教育环境，还有个人的奋发努力。用陈纯朴自己朴素的体验说，他之所以有今天之巨变，是客观+主观=必然，是托了两个巨人的福：一是邓小平，他的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激发了亿万人民为繁荣社会主义祖国、为追

求每个人自己的真正价值，发挥了从未有过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这是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中当然有他陈纯朴一个。二是，他从小就一直崇拜的毛主席。老人家的一条语录：“从战争学习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几十年来一直铭刻在他心中，一直是他在生活中游泳，在人生旅途中搏斗的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他称这句座右铭是自己主观努力的、永不熄灭的智力马达。可不是吗？他下乡为知青时，积极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会了勤劳勇敢，干会了一系列粗细农活；他从未进过艺术学校，但从学唱中创作出大型和声歌曲，从跳舞中编排出青出于蓝又胜于蓝的新舞！所以，当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大潮——似一江春水向他涌来时，他忽然觉得，这又是生活给他的一次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便想以当年老三届知青的干劲和解放军文艺战士的毅力，去闯商海大世界！恰恰这时，他所在的部队文工团因精简被撤，他被调去工作的一个空军影剧院又不能充分消融他对沸腾生活的热情，于是，他先向组织请假，后申请离职，带了历年积蓄的、10元一张的、用旧报纸包着的2000人民币，与几个好友一道南下深圳，仍是从战争学习战争，从进出口贸易去敲开商海的龙门！

在商海游泳，一方面他充分利用自己一张从艺的、口似悬河的嘴和一双动人的、会表达感情的眼睛。但他认为，根本办法仍是他解放军中实践的两个字：“忠诚。”对祖国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事业忠诚，对朋友忠诚，对顾客忠诚……只有忠诚，口似悬河的三寸不腐之舌，动人心弦的会说话的眼睛，才能收到真正的商业效果，长久的经济效益。他就是这么起步的：先是慢四步、中四步，最后到快

四步、快三步，生意场上的、旋风般的华尔兹，贸易途中的、几进几退的探戈舞，他由生疏到熟练，由外行到内行，把西安辣椒干、东北红参、山东大枣、四六蒜，以及祖国各地的土特产和物美价廉的工业品销往国外、境外，而把国外、境外的先进技术，当代最新科技产品引销到国内……几年时间，他和几个朋友由做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元的买卖，到做上几亿元的进出口业务！当然，他也交过“学费”，在惊涛骇浪的商海中下沉过，喝过水。一回，他被一位“君子”骗去自己仅有的70万元中的67万……到最后，口袋只剩了个下馆子吃顿饭都不够的5块钱。但他的人生哲学“忠诚”还是救了他。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人还是多呵！”政府扶植，一个铁哥们帮助：一次吃准，一次翻本，一次又赚回260万！从此，他动人的眼睛戴上了警惕镜片，时时注意麒麟皮下的黑爪子。他自己，也如哥德说的：“每一个创伤都标志着向前进了一步”，“是玫瑰，总会开花的……苦难也能变为甘甜！”

4. 望着陈总办公室中的一块上书“鹏程万里”的玻璃匾，我问：“而今，您算是功成名就了吧？”“哪里哪里。”他又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在故乡投资一个亿的武汉外商会员俱乐部，是当今世界一流的建筑标准，一流的设备标准，一流的服务标准，一流的管理标准，可现在才刚刚奠基开工……我用年薪10万美元聘请的总管——曾留美留日、任北京王府酒店总经理的许立伟先生也没到汉，而武汉外商如今已达2400多家，光今年1至5月又来了120多家。我这个专门为外商全方位服务、为武汉从全球吸引外资的窗口之一，无论硬件、软件，都得用解放军速度，优质优量地加紧进行……平面的

漂亮图纸尚未成为立体的建筑群！

“还有，和几个铁哥们在南美洲中部玻利维亚买的四万公顷土地，黑油油的，是那儿的‘北大荒’，不，是‘南大荒’；气候温暖，庄稼成熟快，若种大豆，一年能收三季！一年能给祖国创多少外汇？！得派我们的‘东方红’拖拉机群，派我们的开垦大军，到那儿耕耘还未苏醒的处女地！

“再就是，我已向市委领导报告了，由我投资，在武汉市建一万平方米的少年儿童俱乐部，专为儿童读书、娱乐、购物、健康服务，其利润的10—20%捐给希望工程……

“再就是建立英雄青年民警基金会——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哺育出更多的见义勇为的孔军……

“再就是……”

听着，我真有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受。我眼睛迷糊了，对面坐着的，是富豪陈纯朴？农民陈纯朴？还是解放军陈纯朴？！

口似悬河的、独特的金嗓门又在我耳边响：“李先生，您发现没有？再胖的人，心口还是有窝的。这象征人的心永远填不满，钱填不满，欲望也填不满。问题是要钱干什么？欲望的终极是为了谁？人该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你说呢？”

“我说，当官的不要有官味，有钱的不要有铜臭味，学问大的不要有高人一头的、了不起的味！不管是谁，对老百姓要有人味，人情味……对不对？要不，咱们就辜负了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财富！”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懵懵懂懂意识：这是个既会抓机遇又会运用机遇、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投资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当代商贸舞台的优秀个体拳击明星！



“王牌赢家”尹广文（左二）与作者（左三）

王牌赢家：一撮神秘的小胡子

1. 商场是战场，有战场便有赢家和输家。在这里，请先读读我对面坐的这个小伙子——大赢家：中等的、显得有点单薄的潇洒身材；一双柳叶眉，眉下两只异常温和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刚毅的倔强嘴唇；腮下，留着青爽爽的、约一寸多长的、出其不意的胡须……是不是用这来掩盖他太年轻的身份呵？是的，他太年轻了。年轻得使人不敢相信——27岁的青春，竟是拥有9位数字资金的，在广东、四川、上海、湖北四个省市兴办12家企业的，生龙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广汉。

他这位大赢家是否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否！并非权重势豪大家出身，地地道道的武汉普通一员；随父母去深圳后，是1984年该市高考探花，被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保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专攻国际金融专业——学习当代最时髦、最风光、最危险的行当：如何熟悉、掌握、驾驭股票、期货、黄金市场？如何在这个既宏观又微观的世界里展示中国人的智慧、韧性和力量！与尹广汉一起攻读此学科的，是一批德才兼备和有特殊数学脑袋之当代俊秀。他们，正如一个伟人讲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隐藏精华，和任何人的精华不同，它使人具有自己的气味。”尹广汉是么气味呢？是他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小胡子”味——年纪轻轻，就想做飘飘然的美胡公；十七、八岁，就思考着如何在世界金融大市场上呼风唤雨，争雌斗雄！

大学四年中，别的大学生都在为每门功课拼死拼活，他却如自己那撮出其不意的小胡须，反其道而行之，对自认为纯教条的专业理论课，宁可补考过关，也不费他说的“冤枉力气”；但对一些学生不甚感兴趣的非专业书籍，如马列主义、中国古代史系列，中国佛家、道家、儒家经典系列，等等，却读得津津有味，十分投入。同学们问他：“你是在读哲学系、历史系？”他笑了笑：“到时，你们就知道了。”此次座

谈,他眯缝着眼对我说:“您若问我生龙集团的9位数资金从哪里来?可这么讲,一是从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列主义中来。用马列主义的一些原则指导经济生活,只要用得准,可战无不胜;再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著作中来。不学历史,怎懂得什么是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

读书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小胡子”味——不论干啥,特重视实际操作。一到寒暑假,他便全身心地在他入学的银行各部门干最简单的基础训练:点钞票、当出纳、任会计……校园中,学习之余,他还在食堂门口卖鞋袜和学生们需要的其他生活文化用品,是为赚钱么?是,也不完全是。其真正意图,是在吸收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在练习将来投入商海游泳的各种姿势。实践中,他被同学们推选为全校的社会服务中心总经理。因为干得漂亮,经过6个层次的选举,又被同学选为本校学生会主席。不久,被各大专院校推举为上海市学联主席。

我听着,望着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心想:你手里的王牌,未必是那颤一颤的、出其不意的小胡子?

2. 大学毕业后,“小胡子”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干他所学的风险工作,即代表本国本行参与国际上的股票、外汇、黄金交易。他暗下决心:我尹广汉一定要在这个国际经济前沿阵地树一新形象,搏杀出我黄帝子孙的威风!

笔者看过不少股票的书,也听过一些股票专家开的讲座,总是似明非明,摸不甚清。这回听“小胡子”漫不经心地述说,我才知晓,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紧张的职业,用他的形容词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不落太阳的职业,一天24小时的天翻地覆!炒股票,炒外汇,炒黄金,其险无穷,其乐无穷,其泪无穷!要时时刻刻注视世界走向、国

家大事、市场变化、人心动态……政治、经济、文化,各行各业,百事千种,都汇集过虑在一个小小的、异常紧张的经济斗士脑中。稍一不慎,会坠临深渊;一招看准,又上九重天!实际操作者,既要身体好、外语精,又需技术熟练、反应特灵……他就是这么个金融天才和玩股票的高手!当他深更半夜通过国际卫星,坐在当代最先进的电脑操作机前,耳下再夹着个国际电话,20秒内,要听价,对比,综合,判断,成交,拍板,合同订立完毕……得手脑并用,十万根神经集中于一个兴奋点,真把命放上去,灵魂都在颤抖!经过无数白天和黑夜,无数黎明与黄昏,尹广汉就这样每月为国家和本单位,赚以十万计、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各类货币。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也曾在他操作的电脑前眼闪金花,晕了过去。但银行的领导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使他逐渐掌握何时“自我感觉”准确?何时跟着“感觉走”不中?如何撒手?如何紧收?又如何螺旋形地不断要数上升……这家伙真是孟子讲的“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看来,一个人要成功,定要超负荷,且在他顶住压垮自己前的一瞬间,才真正成熟,真正立起!他说,他的良好经济心理素质,他那出其不意的绝招,便是在这个时候吸收了丰富营养,而能应付股票和外汇市场上的任何千变万化。

1990年元旦,尹广汉找父亲借了2000元,想于工作之余,在深圳股票市场上试试身手。他自己都没想到,大学的知识,银行的实践,使他在股票的海洋上,似大鲨鱼游入了无敌之境:人家在启蒙,他已烂熟于心;人家还不清白,他已了如指掌;人家在凭运气下注,他已手到擒拿。他凭着训练有素的商业灵敏度,超常人的大胆想象,以及瞬间的判断反应,从深圳的原野、

金田、安达等股票做起,没多久,2000元就变成10万元,半年后,跃到百万元。他看准势头,辞去公职,如我国女排“五连冠”,既打时间差,又攻短平快,一时飞上海收买“杨百万”的大量股票,一时受深圳众多股民之托,赴外地股市搏风击浪!各地股票追星族,不大知道“尹广汉”的姓名,但都晓得绰号为“小胡子”的玩股魔术师!此时,正如他反复讲的一句话:“我不知不觉进入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金融境界!”7位数字、8位数字、9位数字的万贯财产,前后仅两年,一下成了天方夜谭的现实!

太突然了么?太出其不意了么?若细瞄瞄那撮小胡子,不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 当人们以为“小胡子”还要继续写他的美丽天方夜谭时,他又来了个出其不意,不再在股票海洋里沉浮,而是拿他“亿”字数的实际资产,突然上岸干实业了!

我问他——这是为哪一桩?

他说,还是大学里自学的那些知识在指挥我:一是卓越的马列主义者陈毅元帅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大概符合唯物史观的因果关系。再是,佛教也强调这个做人的普遍原则。这道理影响我,告诫我——钱赚再多又怎么样?吃喝有限,玩乐有限,应该拿来为世人做好事,为国家立功德,对不对?

原来如此!

他又说,我过去最崇拜的是香港玩股票炒外汇的鼻祖陈新桑先生。他的惨重教训亦启示了我。陈先生一度操纵股市,犹如在手心玩烟斗。他购出购进的“三字经是”:信、忍、狠!几乎是一路风光,战无不胜。可世界上的事,再能的人,哪有万无一失?哪能常操胜券?结果一次差误,全军覆没!所以,凡事不能贪得无厌,不能只顾一己之私,需控制成功尺度,见好就收,见善

就行……孔夫子教导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人还是不要太狂了呀！

于是，这一两年间，他按照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实事。

不是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么？他办的第一个实业就是一拥有 600 亩土地的大农场——广东罗浮山观光果园有限公司。那儿有美丽的树木、涓涓的山泉、灿烂的阳光……给当地脱贫致富树立了一个可行的榜样。

不是反复强调教育是一国之本么？他在天府之称的四川成都，一次性投资 880 万元，与当地一批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办起了私立华西国际经济贸易大学。他笑称：这是为我生龙企业集团办“黄埔军校”，也是为我们这些改革开拓者办“抗日大学”！

不是反复强调“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么？他便在自己的故乡办起了生龙高科技公司；不是提倡开辟第三产业，为社会多创造就业机会么？他立即在武汉开办了生龙娱乐有限公司、生龙药品公司、生龙制

衣厂、华盛顿名人俱乐部……

就这么，“小胡子”像当年弹奏股市钢琴，一气弹了 12 个曲子，又指挥了 12 支实业交响乐……

最后，我问：“结了婚没？”

他摸了摸腮下青须，点了下头：“是我大学同学，叫朱红。我们已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其名取之山东孔府‘大成至圣’的大成。”

“呵，大志有成，大志早成……”我仍在慢慢读他，似乎了解，又不甚了解：好一个年轻的神秘小胡子？！

本文没有结尾

用什么做本文的结束语呢？我忽然想起“文革”时期“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剥削有功”，那是少奇同志解放初期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讲话：“在中国，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现在是资本家太少，不是太多。”“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当然，90 年代的私人

企业家与解放初期的民族资本家不可同日而语，有共性，也有质的区别，但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建设，却是一致的。1992 年春，一个私人企业家说得好：“判断当前一切是非标准，如果都按邓小平讲的——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就会大大提高每个公民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特别是我们这个阶层，会毫无顾虑的、十二分努力地加速前进。”现在，生活已完全证实了这一真理。

纵观建国 45 年，历史常常教训政治家、经济学家，包括能预示未来的哲学家，主观的好心，是创造不了历史的，只有遵循历史自己的规律，顺乎历史发展的潮流，才能真真实实走在阳光普照的大道上。

历史有句号没？永不会有。

历史会回头么？告诉主观的好心先生们，历史是不再回头的！

（责任编辑：仲 文）

（李德复：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书刊导报社长）

欢迎邮购新书

《双飞记——中国人的志气歌》

本书记述了香港胡鸿烈先生和钟期荣女士一家奋斗的故事。他们一家四博士，全都学有专长，成为社会的佼佼者，他们夫妇为在香港华人中培育英才，创办了闻名中外的树仁学院，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华民族争气，两代人契而不舍，终于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他们的事迹也成为一代人的楷模。

本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每本定价 11 元。将在年底出版。

《东方之珠——香港社会大写真》

本书作者黄际昌是原《人民日报》驻香港首席记者。他以优美的文字和敏锐观察力，把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港人与大陆的骨肉亲情，声情并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特别记述了香港著名摄影家、社会活动家、探险家、香江奇女李乐诗和知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人物的传奇事迹。

本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定价 8.80 元。将在年底出版。

汇款地址：北京朝外金台西路机械工业学院分部
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

邮编：100026

女杰胡筠

志难酬

● 李 锐



编者按：胡筠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内战时期，她曾率领一支农民起义部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给湘赣地区的反动政权以很大的打击。1934年春，在苏区错误的肃反中被诬杀。本文叙述了这位年轻女英雄短短一生的动人事迹，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深刻的反思。

我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常听见家乡来的人谈起胡筠和胡筠部队。胡筠在大革命前就读于平江启明女师，同我的一个姑母同学（我母亲是这个学校第一班毕业的）；姑母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消极了。当年大家都很关心胡筠的情况。

1949年南下湖南工作的三年，我没有回过平江，只知道胡筠不在人世了，怎样死的不知其详，模糊听说是肃反中被杀的。

今年2月17日，因《平江县志》最后定稿，来到长沙。我背了个县志“总纂”的名义，同约请的4位审稿人，和多年主管县志编辑的同志以及县委负责人一起，开了4天会，通过了最后的审定稿，并认真审阅和确定了“总述”的内容和写法。4位审稿的牵头和“总述”的执笔者李荣光，已年逾古稀，是胡筠的遗孤。他曾让我为平江的胡筠学校写过校名，这次又要我为胡筠纪念馆题词。于是吟得一绝并附跋语：

当年烽火鼓咚咚，幕阜山前一女雄。
动地惊天生与死，至今仍爱说芙蓉。

1927年夏，胡筠即在幕阜山地区组织游击队，家乡人民习惯称之为胡筠部队；彭德怀起义时，为平江党政主要负责人。当年民谣云：“上打咚咚鼓，下打鼓咚咚，两边齐打鼓，中间接芙蓉。”胡筠与芙蓉谐音，又曾用名李芙蓉。苏区错误肃反中，1934年春被诬害，时为

湘鄂赣省委负责人之一。

荣光知道我很想多了解他母亲的情况，给我送来一大叠材料，有县志的传略，书刊上的文章，何键（1927年前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清乡公报》中的有关记载，以及几十人的访谈记录。这些谈话或访问记录，最早有延安整风时期的，最晚在八十年代初，内中有我认识的平江老将军张平凯、张令彬、吴溉之、钟伟等，有彭德怀、何长工、李聚奎等，还有同胡筠当年一起浴血战斗过的秘密交通员、游击队员、连长、班长、战士、女兵们、省委秘书、地方干部、党校学员和家乡亲戚，以及大革命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几位女同学。这些谈话记录多是荣光夫妻（汤佩佑）多年奔波的成果。不论当年接触的深浅不同，被访问者谈起来都动感情，都深深怀念这位创建湘鄂赣红军的伟大女性。荣光还特意写了一份《对母亲的点滴回忆》，其中有他人不知的细节。翻完这些材料，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耳边似乎响起了这些谈话的声音，他们如此怀念着这位会打仗的女英雄，这朵芙蓉花！

平江在清末很出过一些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地主绅商中也不乏这种人。胡筠的父亲做过药材生意，往来省内和粤港，也当过省议员，有冒险开拓精神，有点民主思想。胡筠是掌上明珠，自幼在家中读书练武，19岁出嫁时，嫁奁中有4杠书，乡中传为佳话。李姓夫家是北乡虹桥大地主，丈夫思想趋新，生了儿子后，还让胡筠进启明女师读书。胡筠在学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

在反对英国煤油起岸斗争中表现英勇。1922年,平江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受李六如影响,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入党的余贲民在启明女师任教。1925年,胡筠即由余介绍入党。北伐战争时,她随叶挺团做宣传工作,随即到武汉,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受到军事训练,参加过打夏斗寅的战争。1927年7月,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丈夫这时退缩了,老人们当然更是反对。她毅然同这个“美满的”家庭决裂,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幼小的儿子。1928年初,她带领游击队来到虹桥,召开群众大会,烧田契,分积谷,甚至把李家的房子也烧了。张令彬说:“胡筠入党动机之纯,是首屈一指的。”何长工说:“她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白手起家闹革命的。”

怎样白手起家的呢?当过红军连指导员李琪洲(1980年79岁时)说,我的一个当过兵的叔叔带回家一支步枪,埋在地下,胡筠说服他,将枪起了出来;又从两个农民家中收集到两支;还让农会会员缴了3个散兵的枪,不久又缴了散兵一个排的枪;还派人打入敌军,带出8支枪。胡筠还收编过方长发的一支农民自发武装,方是屠夫出身,夜袭本乡警察所,得枪7支发展起来的。此人爱吃狗肉,跑得又快,被昵称为狗队长。黄金洞金矿局矿警队长侯金武的一支起义队伍,人称他猴队长。还有朱平被叫为猪队长。胡筠曾长期带过这3个中队。这支游击队还带有上千人的梭标队。胡筠常站在操坪台上,用喇叭喊操令,训练这支队伍。

1928年3月,平江四乡号称10万农民武装进攻县城,胡筠带的队伍曾攻入北街,同敌人展开巷战。攻城失败后,湖南反动政府声称“平江无人不共”,要“血洗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和宣传部长到中央汇报去了,组织部长罗纳川、青年团书记朱璋惨遭杀害,军事部长跑了,无数党员和群众死于敌人屠刀。胡筠化装成农妇,在深山中同敌人周旋,夜里提着马灯,寻找失散的同志。敌人四处搜山放火,游击队伍一夜转移几次,以野菜山果充饥。胡筠与李宗白、张警吾等成立新的县委,她为主要负责人。

彭德怀起义前,她先入城取得联系。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时,胡筠被选为县苏维埃主席。1928年10月,湘鄂赣特委成立时,滕代远任特委书记,胡筠为常委。此后她即带领一支队伍,转战幕阜山区,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游击战。

当年的女兵、当过小队长的余伟大校回忆说,1927年下半年,当时游击队的枪很少,梭标大刀是主要武器,胡筠教我们自制武器,“烧旺火”,放竹炮,打手榴弹。楠竹节内灌上爆竹、砒硝、硫磺,打仗时先烧好一堆旺火,竹炮放进火堆,爆炸声不断,两里以外都听得见,敌人以为是迫击炮、机关枪,惊慌乱跑,游击队就乘

机出击。这样的竹节,加灌些瓷瓦碴,安上引线,密封好,就成了手榴弹。瓷碴打进肉里,取不出来,敌人叫它洋炮。有一次,派出去的一个小姑娘侦察兵,得悉敌人换防的时间,胡筠就带队埋伏在一个山峡里。她指挥我们,敌人全部进峡后,再两头堵死,从山上压下去。这次敌人全部被我们解决了。

当年的秘密交通员陈泗生(1980年74岁时)回忆说,胡筠那两年常在复兴山区(原名虹桥内山)活动,周围几百里,树木参天,落叶遍地。她在内山建立了3个支部,县委有4个秘密交通同各地联系,信都是胡筠用药水写的。国民党清乡清山,非常残酷,外有重兵围剿,内有动摇分子逃跑。县委常常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窝。敌人来了就鸣铙告警,游击队保护干部、群众转移。各个路口、哨卡的口令,都是她亲自拟定下达的。山区粮食困难,常吃稀饭、红薯、南瓜、野菜。县委和游击队的粮食,要靠出山打土豪。打土豪也很讲政策,从不体罚,粮食也不搜光。有时胡筠以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开条子,到地主家担谷,地主接到条子不敢违抗。贫农则把租谷交苏维埃,以收条抵地租。后来,敌人“九路进攻”,围剿内山,进山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东西就抢,还放火烧山,烧得山岭光秃,到处尸骨,粮食断绝,树皮野菜都吃光。县委仍在群众帮助下,四处转移,坚持在山里苦斗。

当年地方游击队员张满全(1980年71岁时)回忆说,胡筠带的队伍300人左右,在内山经常同敌军、挨户团(地主武装)打仗。胡筠部队一来,我们地方游击队要负责接应,放了望哨。在山顶远望有敌人出动,就放铙,打“哦呵”,让部队作好应战或转移准备。胡筠部队对山区地形熟,尽管敌强我弱,进攻频繁,总能化险为夷。胡筠从来没有过重大损失,她每到一处,就立即布置好岗哨警戒,看好地形,找好以防万一的退路。这里差不多每一条小路都有赤卫队员、童子团放哨。只要敌人一出动,深山里的部队就知道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张平凯讲了两个坐箩筐打仗的故事。胡筠是一双解放脚(幼时缠过脚,后放开),在山上急行军走不快。她平时常骑一匹白马,挟两支短枪。有一次,一营敌人紧追不舍。游击队弹药不多,急着上山,甩掉敌人。爬陡坡,急转弯,解放脚实在不行了,胡筠只好坐在箩筐里,由战士抬着上山。她看到一处地势险要,两边峭壁夹峙小路蜿蜒而上,便于打埋伏,敌人无法仰攻,用“滚木擂石”也可以杀伤敌人。她传令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敌人果然骄气十足,上山来了。胡筠手枪一挥,号声枪声杀声,子弹石头滚木,打得敌人鬼叫狼嚎,丢下尸首,扶着伤兵,跑下山去了。

1929年,胡筠与张警吾结婚后怀了孕。在一次打

退敌人向游击队驻地进攻的战斗中，她临产了，用牙齿撕破衣服，草草包裹婴儿，挣扎起来。在打退敌人几次冲锋的间隙中，战士用箩筐抬着母子，安全转移。胡筠的左肩负过伤，多年战斗中负过两次伤；负伤时，仍坚持指挥，不下火线。

每次战斗之后，胡筠都要及时作总结。这样就总结出一套朴素的游击战术，如“拦腰截尾，打敌哨线”；“敌进山，我下垵”；“敌去河东，我往河西”；“积小胜为大胜”，等等。

在何键政府的《清乡公报》中，不得不承认胡筠这支队伍：“声势浩大”，“赤焰所播，如火燎原”。现摘录几条有关胡筠的“公报”。

“该逆（彭德怀、黄公略）在平江组织6个游击队，共匪胡筠称大队长。”（1928年8月1日）

“平江东北乡以余贲民、胡筠为首，啸党众2千余。”（1928年8月15日）

“彭德怀、黄公略窜入赣境修水，旋回向铜鼓溃窜。8月23日，结合胡筠部共五千余人，枪七、八百支，窜来平江长寿。”（1928年9月3日）

“彭德怀、胡筠两部约三千余众，枪为三、四百枝，经在绞车坳击溃后，向浆市、虹桥逃窜。军来匪去，诚为可虑。”（1928年10月15日）

“11月1日由山交坳出发向绞车坳、台莊方向，进剿彭德怀、胡筠等，胡等闻风先窜，总不与我军接触，而江西友军又不能同时夹击，以致胡等容易逃避。”（1928年11月）

“鼓德怀部窜入赣境后，我部追击，因边境山路纷歧，人烟绝少，当致失踪。平江境内胡筠所部枪枝2百，流窜东北恩溪、中洞、桃花、虹桥一带，时散时聚，肆行扰害。”（1928年11月19日）

“北乡胡筠纠合各股，有枪三百余支，窃据留良洞、小尖、中山民、桃花洞各处，蹂躏恩溪、三墩、钟洞、三眼桥等地。”（1929年3月14日）

1929年6月《清乡公报》载何键嘉奖旅长陶广打了一次胜仗的电文，陶的原电中说：“职五团赵营长报称，昨（5月12日）据报岑川有共匪约二百余名，枪五、六十支，梭标百余杆等，职营一面通知驻岳阳挨户团，请其开赴岑川之后，堵截一面，亲率七、八两连，于13日午前7时进剿。拒料胡筠于12日晚由杨梅山开来，率三百余人，枪约二百余支，与原在岑川之众汇合，与职营顽强对抗，相持约二小时。职率官兵奋勇冲锋，卒将匪完全击溃，恢复岑川，计毙匪三十余名，伤五十余，夺梭标三十余支，匪纷向杨梅山、梓江等处，分头逃窜。此役职营伤官兵二名，士兵阵亡五名，消耗子弹一千八百发等。”“铜鼓不幸，匪患频仍，沿湘之喜盈、富有、寿遐、禄崇四乡早已论为匪窟。王式毅、樊仕民、叶道华、

张久伦等，勾结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人千余，长枪六百余支，在幽居地方居然设立伪党部，分田山屋宇实行共产，到处暗设机关，信息非常灵通。出没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之间。我军进剿时，不但匪情无从探悉，即问途购物，亦多不便。”

以上是1929年第4期《清乡公报》中，陶广向何键发的电报。末尾说，“恳转咨江西省政府令飭毛营长期驻剿，将悍匪胡筠、侯金武、方长发等早日消灭，以绝根株，免貽后患。”

方长发后来在红16军，因诬告被误杀，已追认为烈士。侯金武与朱平后来都任过军参谋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战争中牺牲。胡筠率领的这三个中队的战士中，出了好几位将军。

《平江县志》《胡筠传》说：“胡筠指挥的著名战斗并为父老所传颂的，有声东击西的木瓜乡塌石壁之战；用辣椒烟薰岑川乡碉堡之战；利用地形杀回马枪的泉水乡之战；扰敌致疲，然后主力远程奔袭的修水县朱溪之战；用温棉絮绑在桌上，令战士顶着桌子冲锋的武宁县城之战等。”后两次战役，是1930年胡筠调到赣北特委以后的战事。

何长工回忆说：“胡筠有许多男的还不如她。她很会打游击，她的部队是平江打得最好的。平江的敌人一听说胡筠的部队来了，就害怕。国民党的报纸曾多次通缉她。”

胡筠虽然学过一些武术（当年女兵说她能打过4个男的），但个子瘦小，一双“解放脚”，居然如此善于带兵打仗，四面威风，敌人胆寒。六、七年中，转战于崇山峻岭，别的不说，这需要克服多少女性生理上的困难。游击队初期，部队中就她一个女的，出发打仗和操练时，她不仅打绑腿，还用布带把胸部绑起来。人们至今谈及，不能不深深佩服她的顽强意志和无畏精神。

胡筠短暂一生的高峰，是率领地方赤卫队12万人，于1930年随红军攻占长沙。当时在教育坪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在大会上，彭德怀、滕代远、王首道、何长工和胡筠都讲了话，胡被选为省苏维埃委员。胡筠的儿子李荣光说，当时李家的人都逃亡到长沙，祖父扮着卖河水的去听了，回来对祖母说：“歙容（胡筠当媳妇时的名字）讲的还是有道理。”祖母说：“六个儿媳，数歙容最好”。

1930年9月，赣北特委成立，胡筠调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随后成立赣北红军独立团时，胡又兼任团长。这时她带部队打过攻坚战，如前述修水、武宁两战。《通城人民革命史》载：“1930年12月23日，胡筠率红八师及赤卫军1000余人，进攻通城。利用内应，一举攻克，计缴枪1374支，长机关5挺，手枪30余支，子弹10余担，其他军用品无数。”胡筠是以八师师长名义参加

这次战役的。

胡筠善长演说、演剧、唱歌，家里有架风琴，那时在山乡是稀有之物。在启明女师时演剧，她扮演华盛顿。县志传记说：“胡筠爱好文艺。治军之余，曾创作大量宣传品。其中《李更探监》和《鲁胖子哭头》两个歌剧，前者反映烈士罗纳川的妻子探监，感人至深；后者形容鲁豫平哭张辉瓒，淋漓尽致。两剧至今流传在万载小源等地，刊载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万载分册》中。”

何长工回忆平江一次地方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样谈到：“胡筠在会上讲话，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听她作报告。她的讲话很有吸引力，句句中肯，无一句废话，层次清楚，平易通俗，分析形势很准确。她讲的是‘平江起义’的伟大意义和对湘鄂赣根据地的关系。后来我同胡筠的接触很多，也愿意与她交谈，常跟她谈农会与地方工作的情况。我很佩服她，她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很有基层工作经验。她是平江县主要领导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

1931年3月，原湘鄂赣特委和鄂东、赣北、湘北等特委，合并成立湘鄂赣省委，李宗白任省委书记，张警吾任宣传部长，胡筠任妇女部长。边区20多个县，各级都有妇女组织。妇女干部除参加文化、学校、军械厂、金融、贸易等地方工作外，还有大批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在后勤部门工作的最多。广大妇女动员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红军，妇女成为农村生产的主角，组织耕田队、抢救队、积肥队，以换工、帮工方式解决烈军属和孤寡户的劳力问题。支援前线战争的种种后勤重担，也都落在妇女肩上。当年许多女兵、女干部，关于胡筠在这方面的回忆材料也很多。这一期间，胡筠还负责办过党校，在这方面也施展了她的才能。

直到1931年8月，湘鄂赣边区20多个县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胡筠还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省苏维埃委员。

湘鄂赣根据地和胡筠等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厄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政策所造成的，1932年3月中央派人来进一步强制执行后开始的。“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是这条路线的总精神。王明在他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写道：“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区里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鄂豫皖、湘鄂西等区的反改组派斗争，早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1932年3月，中央认为湘鄂赣省委肃反工作领导不力，“仍然没有转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于是一个中央代表团带着彻底改造原省委、坚决转变路线的任务，到达湘鄂赣省委驻地修水上杉，成员有来担任省委书记的林瑞笙，全总巡视员陈佑生，来担任省委少共书记的郭潜。他们取代了

李宗白等领导，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宣布原省委作出的一切决议、原省苏维埃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统统无效，并撤销了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职务。“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敌我界限，在组织上怀疑一切；对地、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更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成为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对于一切不顺他们心意，或对他们持有不同意见，或一般工作失误、思想作风等问题，一概指责为“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斥之为“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所谓“破坏活动”。

林瑞笙的临时省委制定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发动党内外斗争中，在斗争中坚决洗刷消极怠工、腐化浪漫、脱离群众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豪绅地主的子弟）和动摇的知识分子，特别要从思想上和理论工作中，洗刷不执行国际路线与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分子，以及暗藏在党内的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四七团、王八委员会、好吃委员会分子出党”。并且强调“不要和平的洗刷”，认为原“省委成份多系地主富农的知识分子”，“右倾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成份不少”，特别是“平浏地域观念”严重。原省委党政工团和部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平江和浏阳两县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成为主要斗争对象。7月，省保卫局颁布“自首自新条例”，在逼供信的施威下，出现了一批批所谓被欺骗加入“改组派”、“AB团”、以及什么“恋爱社”等等的工农群众中的“自首分子”。到9月，在万载小源召开湘鄂赣省委二次党代会正式成立省委时，又通过“肃反斗争决议案”，“要严格纠正过去下级党对肃反工作领导怠工和极端右倾的取消倾向”。于是，更助长了逼供信的盛行，比以前的斗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被错捕冤杀的人更多。

根据历史文件和有关党史资料，如红三师七团从团长到班长以致绝大多数士兵，都被当作“改组派”、“AB团”等所谓“敌党分子”，其中半数士兵都遭到处决。这一期间，原省委党政军和县主要领导干部，就有50人左右被逮捕，包括赖汝樵（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张警吾、杨幼麟、胡筠等，红16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组织部长刘英杰、9师政委李幼军、红3师政委叶金波等一批军、师、团级干部，和平江、浏阳、万载、铜鼓、蒲圻、阳新等县县委书记等，都先后惨遭杀害。这些人都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人，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

关于苏区错误肃反，现在有关各省党史部门都作了详细调查研究。平江一县错杀约2000人左右。据我看到的资料，1933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现湘鄂赣肃反中的问题后，曾电令省委：“停止捕人之权，已逮捕的人，由新书记到达后解决。”直到1934年1月，由陈昌

寿率中央工作团到达湘鄂赣后，撤掉林瑞笙职务，改由陈任书记，才基本停止了错误的肃反斗争。可是，胡筠却是1934年6月被杀害的。

关于“恋爱社”等稀奇古怪的名称，李琪洲这样谈道，那些新来的省委造谣说，我们的部队里有什么“恋爱社”、“打狗委员会”、“好吃委员会”、“AB团”，我们打仗，气都喘不过来，有时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恋爱，打什么狗。有一个老红军战士、虹桥人梁克基（1980年66岁时）回忆说，查这些“恋爱社”时，采取逼供信，严刑拷打怀疑对象。被拷打的要是被逼而乱咬别人，被供出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战士怕被干部抓去杀了，干部怕战士暗害。许多团长、师长怕遭暗害，在行军中穿一套衣，夜里又换一套衣；白天骑马，晚上夹在战士中走。那时部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减员十分严重。回想建军初期，没有枪，没有部队，白手起家，干起来满是劲头。打仗从不怕死，拿着梭标大刀，还敢攻城。没有枪，去抢枪；没有炮，石灰竹灌头做炮。一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住它多苦，也毫无怨言。身上带花几次，还是要紧跟红军。打土豪，反围剿，干部、战士齐心协力，不分彼此。即使犯错误，挨了批评，心里也舒服。想不到红军不败在敌人手里，却败在清查什么“恋爱社”，搞肃反，败在自己人手里。

李琪洲回忆胡筠时，深情地说：想起她和我在一起时，有时饿着肚子，还要拼命打仗。一次她听说我负了伤，将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一块光洋给了我。以林瑞笙、陈佑生为首的新省委，只会杀自己人，不会发动群众，也不会打仗。胡筠被枪毙的消息一传来，我痛哭流涕，许多人都哭了。这批老领导干部死后，部队人心惶惶，有些人丢枪不干了，回了家。有的干部乘机打击报复，造成基层内部互相倾轧。国民党更乘机煽动，说共产党、革命者没有好下场。有些人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红16军军长孔荷宠（是新省委中的人）、政委刘学晃先后叛变投敌，陈佑生、郭潜等人后来也叛变了。湘鄂赣根据地就这样垮掉了。

事后，我们常想，湘鄂赣边区为何从手无寸铁发展起来，经过多少次清乡、围剿，不但不垮，反而越战越强？为何到后期有了红16军，有独立师和好多独立游击队，却垮得那么惨？为何早期人心那么齐，那样困难都信心百倍？而后期却人心离散，悲观失望，纷纷逃跑回家？湘鄂赣这样的苏区不是蒋介石打垮的，是我们自己杀垮的。

胡筠是1933年6月下旬，以所谓“托陈取消派”的罪名，与张警吾等同时被省保卫局逮捕的，监禁在万载小源保卫局所在地的杨基洞大屋。当年保卫局的干部骆奇勋（1939年曾任湘鄂赣特委书记）老人，对此记忆

得很清楚。胡筠在关押期间经过多次审问，她对主审人、保卫局执行部长罗鑫说，只听得苏联有托派，中国是否有托陈取消派和什么新党，我毫无所知，我有什么可交代的呢？问来问去，互相顶撞。由于保卫局并没有掌握任何具体材料，只是逼供信得来的“口供”。其他被捕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真凭实据的材料。因此，都无法结案，只好等待中央保卫局的复电。这年10月，胡筠要纸笔，写了几十页的《狱中自述》，骆奇勋看过不只一遍，还记得大意和一些细节。胡筠详细谈到家庭和早年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的情况，以及思想变化和坚决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小时上学，父母给她坐轿，“我怎能把劳动人民当畜生？”她给轿夫付了钱，自己背着行李走路。胡筠还谈到同张警吾结婚的问题。张是店员穷学徒出身，由于手不释卷，刻苦学习，当上了小学教师。俩人志同道合，最后经组织同意，才结为夫妻的。《自述》中有这样两句沉痛的话：“此志未酬，身陷囹圄”；还有她平常爱说的两句话：“牺牲换大家幸福，奋斗是吾辈生涯。”骆奇勋以记录员的身份，能经常到牢中去看望，牢房阴暗潮湿，特为她安了门板铺。但监守很是严厉，带有竹制土镣，夜晚不能随意翻身。

荣光写的点滴回忆中说：有两名保卫队员计划放母亲出狱，一起逃走。母亲一则怕连累他们，二则相信党会弄清楚是非，坚决不同意。母亲一面写《狱中自述》，一面交待保卫队员带信给我，叫我多读点书，将来革命胜利了会有用处。1934年春，母亲等人从铜鼓牢房押往平江黄金洞，从小源押到铜鼓，又从铜鼓迁走，都是由于敌军重兵围剿，省委机关匆匆转移。从小源到铜鼓，“犯人”都带了“面罩”，这是怕战士们认出来，引起骚动。母亲当时瘦得皮包骨，撑根竹棍子慢慢移步。走过约里多路，到冷水井，终于被枪杀了！

1958年彭德怀重返平江时，到了县人民医院（原普爱医院），向陪同的县委书记谈到当年在这里开会，准备起义，胡筠参加了会，感慨地说：“胡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能力，打仗很勇敢，是个难得的女将。”

胡筠出生于1889年2月10日，死时36岁。她生前唯一留下一张在武汉时的军装照片，现在挂在长沙烈士公园湖南革命烈士馆中。平江起义纪念馆中，陈列有胡筠幼年读书时用的桐油灯和书箱。

平江人至今仍爱说芙蓉。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知道胡筠。中国人都知道秋瑾，她的墓地在西子湖畔。胡筠同秋瑾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胡筠的一生比秋瑾更“竞雄”，更威武，更悲壮，同新中国的关系更紧密。她的墓在哪里呢？其实，没有墓并不要紧的，她活在人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王 恂）



侵华战争从这里展开

●刘宏伟

昭和13年(1938年)1月15日。这天,东京湾西岸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决定了日本和中国两个邻国的命运。

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内气氛异常。这一小群人和这一小片房屋是整个日本的主宰。日本人的可爱还是可恨,正取决于这一小群人的决策是理智的,还是疯狂的。

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此时在忙着什么!这个国家在以武力吞并了中国的东北部领土之后又在窥视整个中国!这个国家正在膨胀着令世人日益恐怖的扩张野心、好战热望——满洲被占领了。蒙古被围困了。上海、南京都相继被攻陷。中国的国民政府被逐出京城成了流亡政府!

日本人为自己的胜利得意洋洋。侵略者陶醉在侵略成果之中,迫不及待地要吞并整个中国。他们

向流亡中的中国国民政府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若在1938年1月15日这一天还不前来求和,日本帝国将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并且将与之长期作战。

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好在日历到底翻到了这一页。从此,他们将不用再等待了。

外相广田弘毅一大早就来到了办公室。他那宽大的办公桌上,台历中的1月15日被划上了粗粗的红杠,很醒目,也很刺眼。仿佛一个重重的惊叹号。

广田视今天为他的黄道吉日。他的“广田外交”将在今日得到日本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凭借多年的外交经验,他知道:不论中国今天是讲和还是不讲和,都有利于日本——讲和,标志着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胜利;不讲

和,日本以此为理由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武力战胜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注定是要败于日本的:要么是不战而败,要么便是战而败。反正,他的“广田外交”眼看便要硕果累累。

他指望今天这个日子能让他在官场的倒运彻底结束。一年前,他曾是日本政府第32届内阁首相。就因为军部与政党的矛盾激化,他广田弘毅才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那并不是他的失败。那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自信自己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他自信这一身骨血生来就是注定要效忠天皇的。

感谢近卫文磨!近卫首相去年6月第一次组阁,就请他入阁做了外相。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做外相。假如他命中注定此生还将有一次从外相转向首相的机会,那么此

时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了。

已近中午时刻,中国方面仍然杳无消息。询问的电话已经打来好几个,近卫首相、末次内相、杉山陆相、米内海相……他们的口吻听上去已经很不耐烦了。

整个上午很快就将过去。近卫首相迫不及待地决定即刻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于是,这一小群人便迅速聚集在了首相官邸内。这些穿西装的政界要员们!这些穿军装的军界首长们!战争将他们拽到了同一片屋顶之下——

大本营政府会议,是日本政府最新的一项制度。近卫文磨首相为协调战时军政关系而设置。

大本营与政府间的任何协议,便都要在这里得到一个最后的定论。

今天的会议气氛异常。首相官邸内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争吵不休。几近于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的战争!

杉山陆相恼怒满面。他简直无法容忍中国人对大日本帝国的怠慢!一个战败国对一个战胜国的怠慢!中国人曾让他杉山在战争初期大丢脸面。战争初期,他曾充满信心地禀告天皇陛下:“再有两个月就可结束战争。”可是战争却一直打到了现在。

“期限已到而中国人未回电,证明他们没有和平的诚意。我认为,帝国应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帝国应对中国继续作战,直至中国彻底屈服!”

杉山的主张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的核心内容。但是此时还未拍板定案。

外相广田弘毅第一个表示赞同。这个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曾以温和、巧妙的“和谐外交”著称于世。但是此时他已不再需要温和。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足以使帝国政府从此强硬对外。

“我们若继续等待下去,不仅

有损帝国声誉,让别人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更严重的是将坐失良机,给中国人以喘息之机,最终使帝国前功尽弃。”

内相末次信正、海相米内光政连续发表赞同意见。这两个来自海军的要人咄咄逼人。海军出身的末次信正与那个在海军长期担任要职并终于统治海军的米内光政!这两个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强硬主张。他们都恨不得将帝国海军的军舰在一夜之间便开进扬子江的每一个港口!

参谋次长多田峻面对这一片狂热的叫嚣已经心急如焚。作为参谋本部的全权代表,多田峻深知战争若在中国本土上长期进行,对于日本将意味着什么。在把握战争的整个态势方面,多田峻自知要比在座的每一位清醒而明智。而且他曾经出任伪满洲国的日本顾问,比在座的每一位都更了解中国。他知道自己有责任提醒面前的每一位阁员。他,语调沉重而坚决:

“我们绝对不能莽撞行事!在中国方面的明确答复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只能等待。迫不及待地放弃谈判,马上与中国军队展开大规模作战,实在是操之过急之举。一方面,举国一致与中国长期作战的决心尚未成熟;另一方面,帝国军队正在加紧对苏备战,不宜将力量分散。与其在两个战线作战,不如集中兵力先与苏联作战。”

多田峻已经感觉到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但是他避开眼前那些谴责的目光管自说下去。

“对于否认蒋介石政权一事,今天且务必予以保留,等待中国方面作出明确回答后,再做决定为好。如此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外交决策,万万不可草率行事!”

广田弘毅怒不可遏。多田参谋次长的这番话令他感到受辱。这个参谋本部的丘八!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攻击他的“广田外交”。广田冷

眼相问道:

“中国人的一再拖延,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本相从事外交事务多年,与中国人打交道也不是一时半会儿,总不至于比参谋次长要陌生吧?看来,参谋次长这样指责,是不相信本外相了?”

海相米内光政已经紧接着广田的话音:“如果,你们参谋本部不相信外相,也就是对我们政府的不信任。真要是如此,那么,就必须这样:要么参谋本部辞职,要么政府辞职。”

政府辞职?!多田峻震惊而痛心。多么令人心悸的后果!想想吧!若是他的反对真的导致政府在如此国家重大时期辞职,那,他多田峻岂不是在帮助敌对国家来搞垮日本?但是他也深知,若是向这些政要们妥协,对日本又将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呢?望着面前这一张张神情强硬的面孔,多田峻不禁声音颤栗了:

“各位,明治大帝曾有圣谕留下:切勿仰仗辞职解决内部争端。恳请各位恪守圣谕以效忠国家。况且,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又成何体统!那样,岂不是既让国人伤心,更让世人耻笑吗?各位,请万万三思,三思啊!”

多田峻声泪俱下,然而没用。他看见面前的一张张面孔仍然神情强硬且无动于衷。多田峻痛心而愤懑。看来,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多田只好把目光投向近卫首相。

整个过程中,首相一直的缄默不语,甚至眉头都不曾牵动过一下。这个出身显赫的贵族后裔有着一副冷静、从容的面孔。黑而长的双眉下,总是闪着安详得近乎于怡然的目光。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风度翩翩、亲近可人的日式男子。这样的一副外表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名声,不管是在女人眼中,还是在政界、在国人眼中。近卫文磨得天独厚。只有在很了解他的人眼中,

才能从他这副迷人的外表上看出他内心深处的多疑和冷酷。

这个外表冷静的首相此刻内心里正如火如荼。从感情上说,他赞同杉山他们对于中国的强硬主张,他本人便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对华强硬派。卢沟桥事变后他曾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也就是几天温和而已——从7月9日到7月11日。短短的三天之后他便忽然声明日军将出兵华北。那之后,他一下子向中国增派了整整7个师团!几乎是日本本土兵力的小一半。“八·一三”事变之后,他便彻底抛弃了“不扩大方针”,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他果真让日军把太阳旗插遍了中国南京的大街小巷!他果真令中国政府成为了可悲的流亡政府!他渴望着占有整个的中国大地!他是日本皇族的后裔,他自觉有责任为大日本皇室拓宽疆域。他甚而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的。所以此刻,近卫文磨很想对他的幕僚们说:

“根本用不着理那些愚蠢的中国人……”

但是他是首相。他的职责是要保证政府与大本营的统一。他不能让外人看到分裂。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近卫文磨缓缓地开口了。他那细长的眼睛温和地望着面前的每一位阁员:

“各位都是帝国的中坚,且又都对帝国忠心耿耿。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各位有时间再好好想想,我提议,现在暂时休会,下午再议。”

下午的会议也并未形成决议。政府与大本营对立,陆军省又与大本营对立。整个会场争吵不休。于是会议又一次暂时告停。

直到这天深夜,准确地说是第二天凌晨,才颇为艰难地取得了一

个统一的意见。这个统一十分牵强,它几乎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结果。以多田峻为首的参谋本部不再坚持最初的意见。他们的让步仅仅是生怕内阁会集体辞职。傍晚的时候这些军人们曾经聚集在办公室里再三斟酌:中岛总务部长、本间雅晴情报部长、河边虎四郎作战课长。他们与多田峻持有同议却只能向政府方面妥协。他们是一些对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极为有用却并无多少实际权力的人。

但是他们仍然在据理力争。这天深夜又发生了激烈的论战:杉山陆相与多田峻参谋次长、陆军省的军务局与参谋本部的事务当局。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陆军省的人嚷嚷着:“此时,陆相应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统帅部的首脑。”而统帅部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此决定应奏请御前会议裁决。如万不得已,即通过直接上奏,发挥统帅部独立的作用。”

直到最后一刻,才由多田峻方面作了让步。因为内阁濒于垮台,多田峻只好勉强同意。对于军事上的考虑只得让位于更敏感的政治上的考虑。

近卫文磨也终于完全站在了强硬派一边。

第二天东京的天空仍然阴霾一片,但是全世界都在这一天注目东京,注目日本。近卫政府在这一天发表了举世震惊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华权益之方针,当然毫无变更。今帝国对东亚和平之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完成此重大任务而更加振奋。

这样的声明已经耸人听闻,但是近卫似乎仍嫌不足。3天之后的1月18日,近卫政府又向世人作了更为卑鄙的补充说明——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以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一时成为1938年年初世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因为这样的口号从未有人提出过。近卫既在危言耸听也在哗众取宠。他要明显地向世人表现出对于“对手”的蔑视!他要污辱“对手”!事实上这是他的穷极之策。他无法掩饰也不肯承认此举的荒唐。他需要一种暧昧的说法,但又必须避开法律字句。于是,经过苦苦思索,便有了这样令人震惊复感叹的主张。日本人在1938年的伊始之刻开国际法之先例!不过据说最初这是外务省某课长的提议。一个小人物的念头。后来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将此称之为“下级官员误国”。但是无论如何,近卫在1938年的年初,十分需要这个正中他下怀的提议。

至此,东京大本营内的一场争吵便迅速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也,改变了世界的近代史。

(责任编辑:刘家驹)

海燕事件

——延安“抢救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

●田方

1943年在延安，由康生直接导演了一场所谓的“抢救运动”，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了很多“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等等“坏人”。44年经过甄别，证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日爱国、热爱共产党的知识青年。他们一一得到平反，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名誉。这中间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所谓“海燕事件”，这是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个有趣的、值得深思的小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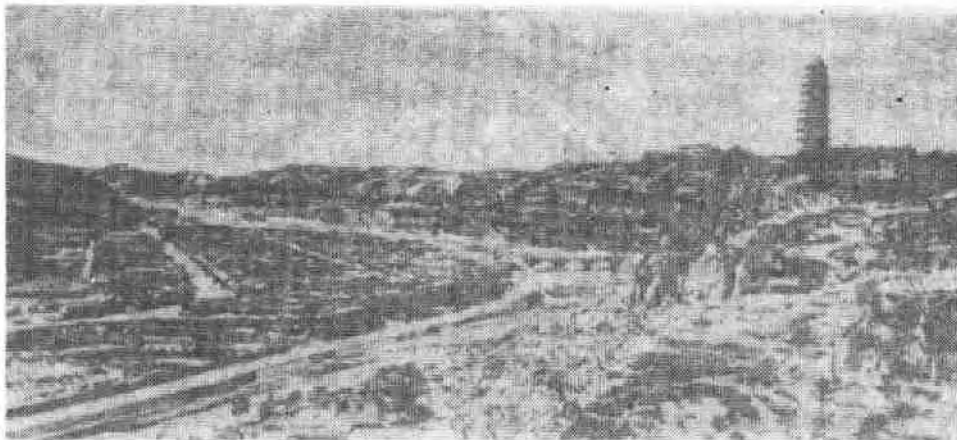
青年记者海燕，四十年代在延安是很有名气的，他是解放日报的名记者，当时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是知道他的。但是在1943年3月间，海燕突然带了他的妻子林坚，双双跑出边区，逃到国民党统治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曾经下令通缉“特务分子”海燕。海燕为什么要逃跑？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此人以后的下落如何？由于当时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事后和有关同志接触中也大体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可以作如下的介绍。

延安解放日报于1941年5月15日创刊，当天就有海燕的文章，到1943年3月他逃跑时止，在短短的一年零十个月当中，就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28篇（不包括他所写的新闻报道）；而且，在他逃跑前的最后一篇，就是发表在1943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第二版题为“安塞劳动英雄杨朝臣”的整版大文章。

解放日报办报初期，毛泽东曾经批评报纸的主

要缺点是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的活动不够，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因此，中共中央从1942年3月开始进行党报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解放日报改版；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9月间西北局又作出了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为了建立广大的通讯网，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各分区设立解放日报通讯处。9月间，报社组织上分配海燕、林坚夫妇和我三人到绥德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由海燕领导。他对我的业务指导和新闻写作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彼此相处也很协调，通讯处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开展。1943年2月间，报社社

长博古来电报调海燕回延安，约半个多月以后，林坚疑虑地问我：“过去我们夫妇离别三天就有书信往来，怎么这次海燕到延安半个多月了，还没有来信？”我认为当时通信站寄信全靠步行，从延安到绥德500多里路，有时可能耽误，稍等几天就会收到海燕来信的。可是她仍然很怀疑地说：“这次他回延安以前，绥德文艺界一位朋友曾告诉他，说延安‘抢救运动’已经开始捕人，作家吴奚如就被捕了！所以那晚海燕半夜里却从睡梦中惊醒的。是否他回延安后也被捕了？”我认为林坚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正说话间，通信站送来了一卷3月10日的解放日报，拆开一看，那天第



二版整版篇幅发表了海燕所写的“安塞劳动英雄杨朝臣”的长篇通讯。我说：“海燕到安塞采访去了，又写了那么一篇大文章，当然顾不上给你写信了！”事实完全消除了林坚的疑虑。隔天后，海燕又从延安发来电报，要求调林坚回延安。在一般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夫妇调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地委组织部已经同意，还托林坚捎带一包干部材料转交延安西北局组织部，我也帮助林坚打点行李，雇了脚户，送她动身。

岂知林坚从绥德南下，海燕从延安北上，在清涧中途相遇，夫妇两人一同在宜川地区走出边区、向国民党统治区逃跑了。接着，边区保安处就下令通缉“特务分子”海燕。作为解放日报的名记者被通缉。在绥德这么一个小城市里震动是不小的。

延安整风运动从学习阶段转入审干和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以后，正在人人自危时刻，绥德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三人中逃跑了两人，当时的我唯恐被牵连的紧张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幸亏当时新到任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很快帮助我解脱了这个包袱。一天，他亲自到通讯处向我了解海燕逃跑的经过，我向他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习仲勋对这事大体有了个底，当即向我表示：“你和海燕夫妇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可以照常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逃跑事件。”同时，他还帮助我搬到地委宣传部院子办公，为我创造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并让我兼职代理地委机关报抗战报的主编和抗敌书店的经理（两单位原负责人已进整风训练班学习）。我受到党组织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心头的顾虑消除了，工作积极性自然很高。

海燕，四川人，出身地主家庭，大学生，活动能力很强，很能写文

章，但是，他自恃高、容易和人闹矛盾。据说他原来在留守兵团总政治部工作时，就和总政领导人关系闹的很紧张而调离的。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会期间，他为了争取与会记者的待遇问题而发动记者们联名向参议会提出提案，受到报社组织的严厉批评。他害怕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特别害怕在抢救运动中被捕，因而偷偷地逃跑了。这在他跑到重庆后给他在延安的好朋友们来信中说明了，并且表示了后悔之意。当然，这些信都要交给组织审查的。由于他的来信，并在有的信中说了一些“遥山阻隔，后会有期”之类的话，也给别人带来了麻烦。他逃出边区到西安后就把原来那包干部材料原封不动地寄到了西北局组织部；他到重庆后立即向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作了检讨。董老鉴于他交代的比较清楚，曾经让重庆办事处安排他协助党做一些统战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和观察，说明他没有作什么坏事，在全国解放前夕又派他到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还主编了一张灰色的“周末报”作为掩护。全国解放后，他又经过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委派为民生公司宜昌港务局副局长。五十年代中期，他从武汉作家协会来北京，找到董老和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协助他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并且为董老写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海燕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毛病和他的才能一样的突出。由于康生搞极左的一套，使一批知识分子蒙冤受屈。海燕逃跑后也自知错误，但这又是环境迫使他采取的下策。好在党在运动的后期实行了正确政策，使海燕最后还是得到了公正的结局。

（责任编辑 方 实）

毛泽东 诗词手迹 掺假了 吗？

《炎黄春秋》编辑同志：

贵刊1994年第7期刊载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一文，记述一些当时作者亲身经历的情形，对人们了解这段史实是有帮助的。但其中讲到的“给毛泽东诗词手迹掺假”却与事实不符。有必要加以澄清。

该文的记述是：

一天下午，唐平铸说要发表毛主席草书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的书法潇洒、豪放，自成一格，能给人以激励和美的享受。但诗词中“蚂蚁缘槐夸大国”句中的“缘”字，是涂改后另加的。本来这样发表，更能完整保持和表达出毛主席手书真迹。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大人物”的指示，唐平铸告诉，要把涂改处抹掉，重写一个“缘”字。他打电话叫来《解放军报》秘书处副处长高寄语。高寄语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自幼酷爱书法，写得一手“仿毛体”。唐平铸要高寄语按照毛主席书写《满江红》的笔迹和结构，认认真真补

上一个“缘”字。高寄语肩负这样一个“光荣使命”，仔细地仿照毛主席的笔迹，写了好多个“缘”字，唐平铸选中了一个，询问了在场的人，经过制版加工后补了进去。以后，各处都照样印制的毛主席手书《满江红》词中的“缘”字，其实并非真迹，而是这样造出来的。这个谜，早就应当揭开了。

笔者曾经直接参与其事。

当时决定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手书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后，找到的是他“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上午七时为江青书”的手迹。其所以需要补一个“缘”字，并非由于原手迹中的“缘”字经“涂改后加的”，也不是“哪个‘大人物’的指示”叫“重写一个‘缘’字”。如果原来“涂改后另加的”有一个“缘”字，只须在制版时略作技术处理就可以了。而是因为：在原件中这一句是“蚂蚁聚槐夸大国”，当收入《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初版）前，其中的“聚”字已经改成了“缘”字。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真正是“日理万机”，十分繁忙，不宜为此事去烦扰他，同时因他年事已高，医生劝他少用毛笔写字，他在这时书写、批示文件早已改用铅笔。于是，便请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查找他的手迹，始终没有找到他用毛笔写的“缘”字，最后找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排印清样上，其中一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为妖雾又重来”中的“为”字，他用铅笔改成了“缘”字。便把这个字拍摄下来，所幸经过“十年浩劫”，那时拍摄的这张照片“失而复得”，在笔者的冤案彻底平反后又退还回来，至今仍在。

因铅笔字笔划较细，与毛笔字不好搭配，不能直接嵌进去换掉原先的“聚”字；又不能请别人“代笔”“另起炉灶”，便请人用毛笔在这个铅笔写的“缘”字基础上，仿照毛泽

东同志的笔迹“加工”。现将前后三种原件摆在一起，即能看出这个字比别的毛笔字“与众不同”，而和铅笔写的“缘”字“略同”。（附图第一幅，是原来书写的“聚”字；第二幅是那个用铅笔写的“缘”字；第三幅是用毛笔加工后发表于报刊的“缘”字——这是据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所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复印下来的。）

只为妖雾又重

毛泽东《七律》中
铅笔所改的“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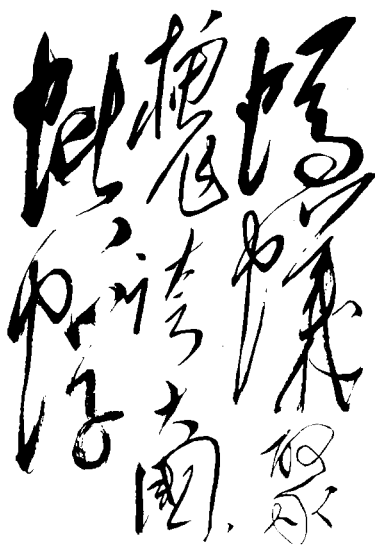
东同志的笔迹“加工”。现将前后三种原件摆在一起，即能看出这个字比别的毛笔字“与众不同”，而和铅笔写的“缘”字“略同”。（附图第一幅，是原来书写的“聚”字；第二幅是那个用铅笔写的“缘”字；第三幅是用毛笔加工后发表于报刊的“缘”字——这是据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所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复印下来的。）

虽然只是一个字，究竟是否“掺假”也是大有关系的。何况此文的小标题写着“给毛泽东诗词手迹掺假”；文中又说：“以后，各处都照样印制的毛主席手迹《满江红》词中的‘缘’字，其实并非真迹，而是这样造出来的。这个谜，早就应该揭开了。”而且，贵刊编者还在本文前面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中有一个字并非真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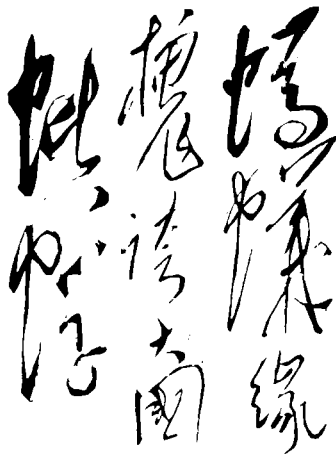
这事本来并不是什么“谜”，经过这么一渲染，反倒真成了“谜”。希望能措贵刊一角发表此信，以正视听。此致
敬礼

穆欣

1994年10月15日



毛泽东1963年手书《满江红》局部



1966年各报刊发表的《满江红》手迹

皖南事变后 陈诚看管叶挺

●宅巍 德英

叶挺和陈诚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叶挺大陈诚两岁,也比陈诚早两年入保定军校。

北伐战争中,叶挺先后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师长;陈诚也有相似的经历,先后担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他们的地位相当。不过,就对北伐战争的贡献和社会影响来说,陈诚远不能与在“铁军”中指挥作战的叶挺相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与叶挺在武汉同时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这时,他们的地位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叶挺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陈诚则是统领4个军又7个师的武汉卫戍总司令。

时代的烙印,使陈诚与叶挺的

关系,微妙而复杂。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扣。

陈诚对事变的结果感到高兴、庆幸。但是,他对叶挺军长又十分敬重,向蒋介石请求不要杀害叶挺,由他担保。

1942年春夏,叶挺被囚于重庆林森路望龙门22号,他为了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发不剪,须不修。

一天,已经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来到叶挺的住处。

一个是满面春风的将军。

一个是须长发乱的囚徒。

“希夷兄,何必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一个囚徒,还能有什么好样子?”

“我已经在委员长面前保了你,随我到六战区去屈就副司令长官吧。”陈诚的话,确有几分诚意。

“我除了仍旧去担任新四军军长外,别的什么职务也不会担任。”叶挺倔强地说。

“你这样固执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陈诚的话,又是劝解,又是批评。

“我知道对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你们袭击抗日的新四军,这对国家和民族又有什么好处呢?!”

水火不容。陈诚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天,陈诚再次来访。他要继续进行昨天没有完成的任务。

“希夷兄,你有什么话想对委员长说吗?”陈诚终于抛出了谈话的主题。

“没有。”叶挺毫不犹豫地回答。

“如果他想见你呢?”

叶挺开始沉思。从蒋介石对新四军和对自己的伤害来看,没有什么见面的必要;但是,自己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见见面,去碰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叶挺坦然地答复陈诚:

“好吧,尊君旨意。”

陈诚喜出望外,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话:

“兄既同意意见委员长,还是把面容和衣服整理一下吧!”语调已近乎恳求。

“就按我本来的面目去见他,何必改装修容?”

“希夷兄,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如何敢领你去委员长那里!”

“既然如此,那就听便吧!”叶挺不想再为难陈诚,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叶挺整装修容后,他们一道登车来到蒋介石住处。

他们在客厅里坐不多久,即听卫兵大声呼唤:“委员长到!”

陈诚立正报告。

叶挺也离开座位,略行礼仪。

“你知道错了吗?”蒋介石坐下后,即大声对着叶挺说。

“我没有错。”叶挺坚定地回答。

“共产党目无政府,目无领袖,



叶挺

不服从军令，以至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惨祸。”蒋介石用他那浙江官话，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当然，新四军的问题在共产党身上，你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嘛。”

蒋介石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你是一名将才，现在抗日，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准备派你到六十二军去当军长，或者到新编二十二军去也可以。”

“委员长，现在我还没有自由，囚徒怎么能去当军长呢？”叶挺冷静地挖苦说。

蒋介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弄得十分尴尬。

陈诚赶忙起立立正，大声说：

“报告委员长，我们回去研究委员长的指示，改天再来复命。”

说完，陈诚便拉叶挺离开客厅，把他送回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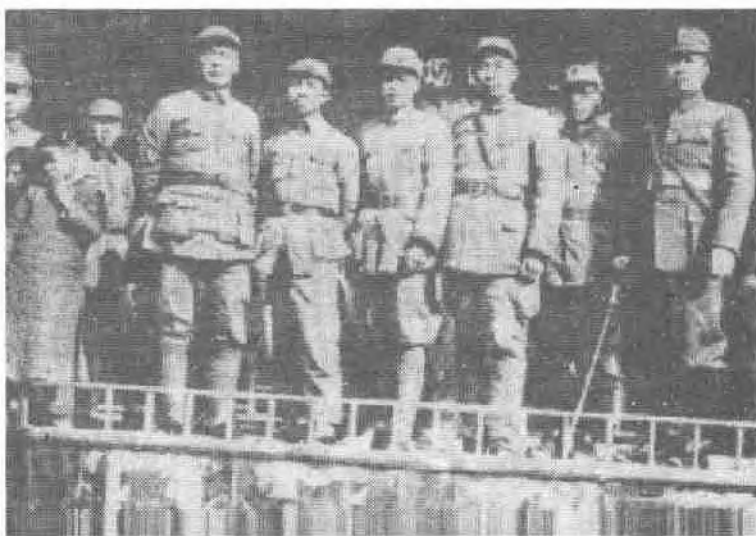
这以后，军统便把叶挺从望龙门 22 号移到歌乐山山腰一个叫红炉厂的小村子囚禁起来，一切优待都被取消。

1942 年底，陈诚又作了一次努力。他再次向蒋介石请求，让叶挺住到湖北恩施来，以便由他就近“规劝”。

恩施是陈诚的天下。



陈 诚



1939 年，叶挺和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在皖南泾县

叶挺到恩施后，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

陈诚让他在省政府里挂名“高参”。他可以到办公室看报、喝茶、下棋，也可以随意回寝室休息。

夫人李秀文和女儿扬眉被从桂林接来恩施，同叶挺住在一起。每逢演出节目，还让叶挺夫妇坐在前排中座。

陈诚告诉叶挺：

“现在正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候，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我已关照民享社，在生活上和物质上给你以特殊照顾。”

“谢谢，不需要。你们的省银行行长周苍柏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负责我的生活费用，日后如数归还。”叶挺表明了自己的志节。

好在周苍柏正好被陈诚委任为兼“物资供应处”经理，叶挺所住民享社东门招待所亦在他的辖下。叶挺的生活费用，究竟是周苍柏私人垫付，还是由陈诚指示在民享社中报销了，不得而知。看来，叶挺的志节和陈诚的关照，都是事实。

1943 年 6 月下旬，《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趁参加鄂西慰问团之机，奉周恩来指示，去恩施看望叶挺，向他通报国内外形势及有关中共

营救他的情况。

这时，叶挺与夫人、女儿已经移往恩施西郊朱家河。

陆诒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面交陈诚。陈诚阅信后，爽快地说：

“希夷兄一家就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会派人带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宽心。”

谈完话，陈诚即派副官陪陆诒驱车赴恩施西郊与叶挺会面。当叶挺留陆诒吃午饭时，副官便告辞离去。这说明，陈诚对叶挺的监视还是宽松的。

叶挺从 1942 年底移住恩施，直至抗战胜利，中间除了有几个月又被押往桂林外，一直住在这里。

陈诚让叶挺长期住在自己身边，固然有劝降的用意，但在恩施的境遇，毕竟比关押在其它地方要好。

历史记录下了这两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将军，在清江岸边微妙而复杂的一页。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40年春冯玉祥在重庆会晤彭德怀

冯玉祥在重庆 与 蒋介石的争斗

● 于志恭

会见彭德怀

1940年春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到陪都重庆,经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军事组长王梓木联系,与冯玉祥会晤于两路口巴县中学内冯的办公处。当时我在冯先生身边任职,有幸见到彭总并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彭总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冯先生事先也作了准备,特请山东省公路局局长,当时恰在冯处的刘熙众参加会晤。彭总来到,冯先生立即出迎。他上下打量着彭总那朴素的衣著和风尘仆仆的面容,钦敬地向彭总致以热烈的慰问,还亲切地问:“朱总司令可好?”彭总说:“好。”冯先生说:“中国人民的抗战全仗你们啦!”彭总说:“感谢冯先生对我的支持。”彭总说的“支持”,是指这样一件事。

那是1937年9月下旬,侵入山西北部的日军,向平型关、雁门关一线进攻,企图南下夺取太原。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团和骑兵营于9月23日向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前进,钳制敌人;以三个团于24日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山地,待机歼敌。25日7时,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入设伏地带;一一五师预伏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冯先生在第六战区(津浦线,获悉这一胜利消息,立即向朱总、彭总发电祝贺,并指示他创办的设在济南的《抗日早报》以头条位置刊登这一消息。不料,冯先生的这一义举,遭到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指责:你们的消息是哪里来的?我们中央没发表,你们为什么发表?故而彭总这次特向冯先生当面致谢。

在这次会晤中,彭总向冯先生详细地介绍了“战略防御,战略相

持,战略反攻”等有关持久战的内容。冯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冯先生当时正从事川军的督练工作。他鉴于部队的官佐士兵素质差,向彭总提出了“建立新军”的建议,深受彭总的重视。

彭总与冯先生的这次会晤极为愉快、融洽。彭总告辞时,冯先生和刘熙众一起送行,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前,摄下了这张极有意义的照片,我也有幸站在彭总身后摄入了镜头。(见图)

从这次拜访冯先生以后,彭总和朱总与冯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第二年,是冯先生60寿辰,中共中央领导人都给冯先生送了贺词。朱总和彭总给冯先生的贺词(集唐代诗人司空曙诗品句)是朱总亲笔所书:

南山峨峨,生者百岁;

天风浪浪,颂之太和。

冯先生读到祝词十分快慰。就在这个时候,冯先生接到一封匿名信。他拆开一看,里面还装有一颗子弹,信纸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他将此信和子弹并附一信送给蒋介石。蒋在回信中言不由衷地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飭戴笠限期破案。”

此时,冯先生已深感共产党所给予的温暖和厚望,也领教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卑鄙与绝情。他触景生

冯玉祥
其人如玉
黄文欢书

情,写了许多洋溢着爱国之情的对联。有副上联是:“要想着收咱失地”,下联是:“别忘了还我河山”。

教育鹿钟麟

彭总和冯先生还谈到鹿钟麟(瑞伯)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情况。彭总说:“瑞伯先生有抗战决心,就是河北省政府主要成员中,有的人破坏团结,搞磨擦……”,冯先生立即向彭总表示:“我已知道,并已告知瑞伯深刻认识……”详情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任命鹿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认为,鹿当河北省政府主席要比国民党派一个坚决反共的人去要好得多。冯教导鹿:“到河北后一定和八路军搞好关系,联合抗日。”冯从他的卫队中抽调一个连的兵力,给鹿作警卫部队的骨干。鹿根据冯的指示,在汉口、和周恩



鹿钟麟

来见了面。鹿到河北省就职以前，特地去山西长治会见了朱德和彭德怀。鹿抵达河北后，驻在南宫和冀县一带。初期，鹿和八路军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国民党在鹿的领导班子里安插了几个钉子，一是兼民政厅长张荫梧，一是教育厅长王钊志，一是秘书长王孝绪。张荫梧拥有一些部队，是驰名全国的磨擦专家；王钊志和王孝绪，是两个极端腐败的老朽。他们在鹿和八路军的关系上极尽其挑拨造谣离间之能事。因此，鹿到河北半年之后和八路军产生了磨擦。冯在重庆闻知后，曾几次电鹿“要顾全大局，切勿与八路军发生矛盾”。1939年8月，八路军把张荫梧打垮了。此时，彭总曾亲自到鹿处召开了一次联合会议，会上，教育厅长王钊志、秘书长王孝绪等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鹿的秘书梁嵩然奋起怒斥王等造谣污蔑八路军的行径，并指出八路军勇敢与日军作战的功绩等等，使王等哑口无言。彭总临行，问在鹿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此人（指梁嵩然）是什么身份？在弄清梁是进步青年后，嘱申伯纯发展梁入党，梁嵩然当即写了入党申请，交彭总审阅，彭总接到

手一看，立即示意申伯纯：这里是白色恐怖所在，还写“申请”？！我批准了”，并烧毁了申请，梁火线入党了。以上是彭总在处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问题中的一个插曲，现在写来仍然很有意义。1940年，鹿钟麟在河北省呆不住了，便回到重庆。这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动员很多机关、团体邀请鹿去作报告，妄图诱使鹿参加他们的反共大合唱。冯先生得知后，立即把鹿叫去，说：“关于河北的事，你一句也不能讲。你要好好读书，请研究室的赖亚力（中共秘密党员）先生给你讲课。”因此，鹿在重庆一直闭门读书。

营救胡志明

在重庆，冯和周恩来关系更是密切。差不多每周冯都要派赵力钧（冯的随从参谋，中共地下党员）乘他的汽车去接周到特园康庄二号谈话。他们不拘小节，如在炎夏，冯穿着背心，手执两把蒲扇，一把给周，自己一把，两人扇着笑着地谈起来。

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先生认为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为国人所难容，他以头痛为由，请假一月，表示不参加国民党任何会议，上了青城山，以示抗议。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不断升级以后，何应钦为了报复冯先生，把冯的参谋陈君文、周芪藩逮捕下狱，何已向蒋介石报告：“他们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等等。事情是这样的。周芪藩（李养初）由于蒋、何停发了冯处的生活供应后，离开冯处到国防部二厅，公开身份是参谋。周因向中共重庆办事处送情报被捕是实情。但周被捕刑讯后未承认是共产党，何应钦向蒋报告周已承认是共产党是虚构。一次，周被押解到土桥镇管押，经重庆海棠溪码头时，遇冯先生的手枪队长葛效先，葛问周：“你说什

么没有？”（即承认共产党员没有）周说：“没有。”还说“特务审讯，用橡皮锤猛击腹部，请先生赶快营救。”冯先生闻知，在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上，大骂何应钦“法西斯”，何无言以对，即请张治中处理，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以保外就医办理，但无人敢保，最后冯命赵力钧（地下党员）盖上冯的章，才到土桥场申家沟监狱保出了周芪藩。陈君文是提前释放的。这件事，周恩来很关心，认为冯先生处理很及时。

接着，越共胡志明主席，率越南慰问团经广西要到重庆慰问在广西被捕，周恩来闻悉，很快找到冯先生请他设法营救。冯先访问了苏联顾问团团长朱可夫，还请他到巴县中学他的寓所吃饭，借此研究胡志明主席被捕的问题。一天，冯先生又约李宗仁晋见蒋介石，冯先生向蒋说：“胡志明是否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必要和有权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就不逮捕他们呢？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当是国际友人，怎么成了罪人？假使赞同我们抗战的外国友人成了罪人，那么，我们的抗战岂不成假的了？这样做会失掉国际间一切同情。究竟我们的抗战是真是假？”这义正词严的责问，使蒋介石哑口无言。接着李宗仁责问蒋介石：“道理，冯先生讲完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逮捕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我们广西吗？这是下边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这些责问，使蒋介石只好同意释放了胡志明。后来黄文欢还特为题写了：

冯玉祥其人如玉

反对迫害民主人士

国民党对日作战不利，但对内迫害民主人士却不断升级。投降派

冯玉祥将军逝世
 谨致悼意
 毛泽东

纪念冯玉祥将军一世的最好办法是坚定地执行反对美帝四大家族的政策
 周恩来

冯玉祥将军千古
 为民王西岭
 朱德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题辞

何应钦,一次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报告说:据确实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人勾结共产党,要在重庆暴动,要求采取措施。冯玉祥先生立即反驳说:沈先生等都是文人,没有武器,他们用什暴动?我与他们是朋友,不能不替他们讲几句话,这一定是有人造谣陷害他们。陈立夫也帮腔说:不要轻视沈钧儒,共产党计划好了,他是跟着干的。于右任等人,也认为是谣言。会后,冯告知了沈等,于是沈钧儒怒气冲冲去见何应钦,要求把他下监,何只得说:是谣言。冯说:是谁造的谣?弄得何十分尴尬。

老舍在重庆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员魏猛克、骆宾基等相继被捕。冯先生是“抗敌协会总部”理事,老舍要求他给刘峙(重庆卫戍总司令)说说。冯说:刘峙这个人满脑门子官司,不好说话。老舍走后,冯叫他的随员赵力钧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崎嶠释放了猛克,猛克回到临江门“文协”宿舍,还说昆明他的家乡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在机场等了四天。他还不知道已经被捕。如在四天后不营救,把他转移,就难办了。猛克是从延安经重庆回昆明治肺病,在从“文协”去飞机场后被捕的。骆宾基是在丰都教书由军统

局捕的。老舍向冯先生提出营救,冯直接找蒋介石释放骆宾基,并且向蒋陈说:你怎么不顾利害关系专门得罪文化界!骆宾基等五名教师在丰都当天就释放了。冯这次救骆,是拍案向蒋要人的。骆获释放后到了重庆,冯先生在重庆特园康庄二号,请骆宾基吃饭,陪客的有老舍、叶以群、冯乃超、郭沫若、蔡仪、吴祖光、凤子、聂绀弩等。冯先生没有说一句营救骆宾基的话,骆也没有向主人举杯致谢,这就可以看出冯先生对文化界的亲密无间了。

他要北上抗日

1942年5月,蒋介石利用何应钦的手段,停发了冯先生处的生活费用,使冯先生和冯处的工作人员极为气愤。冯先生于当年5月登上了重庆北碚的缙云山。7月下旬,冯的随从参谋赵力钧通知我上山见冯,我于30日到山上,冯命我到陕北三原他的战友郭岭峨(冯称“郭大哥”)处准备驻地,冯说他要北上与我党十八集团军联合抗日。另外,他还派了手枪队长葛效先、副官刘致钧等以买马为名,从重庆北上探路,作好北上准备。

我在山上住了一夜,31日晨5

右君同志:
 看了你的信使我感到
 不寒而大半夜还是那样
 和往常一样是那样明白
 主非真是则家之福了
 有人说法的以明志穿

静以收心读书之办教到
 子以书为乐也由此而
 人所以之大原则
 我所以之志也回教
 他所以之志也回教
 士所以之志也回教

在此吾生何足志何
 一个能纯然有者何足
 不平不躁把何已足
 了有
 保为忠实朋友祝
 年 一九四二年六月

时，冯先生给我写了份“前出师表”，还用信纸给我写了一份临别赠言，上面写着：

“中华民国全仗你一个人来救呢！你敢不敢有此念头在心，永久不忘呢？谁看不起你都不要紧，就怕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

志恭弟台 冯玉祥
七月三十一日缙云山”

先生又给我他的“名片”多张，叫我到西安与他的战友刘治洲、熊斌、傅正舜、邓长耀、赵亦云等见面，宣传他的与抗日军联合作战等主张。我告辞下山时，冯已在一片竹林旁由一位叫王××的正给他讲英文。

1942年冬，我在陕北三原将冯的驻地大致安排就绪，向冯致函汇报，他复函如下：

复信的话，很不容易，因为有人收到我的信，被别的人注意他，那不是有害于人吗？因此，我不愿意多复人们信，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须特别认识国为最重要，其余都是小事，请你万分注意。你们预备好了房，有机会我一定去住一住去，因为我要看我的“郭大哥”去。

你有工夫的时候，读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可以告知我几句吗？

我们有“献金救国运动”，不久详细告诉你，盼望你打算打算。问你好，问“郭大哥”好。

冯玉祥三二、一、二五、五
(1943年1月25日5点钟)

从冯先生信函看，他已打消了到北方抗日的念头。原来，冯先生在他的好友李烈钧等人，特别是周恩来的建议下，认为留在陪都重庆工作，较诸北上抗日还重要，同时又有张治中从间转圜，电请他到灌县给童子军讲话，他遂于当年8月下山赴灌。9月，蒋介石要军政部军需署发给冯生活费，还在重庆歌台子给冯玉祥修建一幢住宅，迎先生回到重庆。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4日给冯先生贺60寿辰的内容中有：

“冯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向蒋进谏言

冯先生在重庆特园康庄住着，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冯。此人是在北伐时，曾同冯共过患难。他原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这次来重庆是调来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他住在白崇禧的公馆里。这次来一见到冯就哭起来，越哭越厉害，韩说：“随便杀人，真是暗无天日。”冯问韩，是什么事？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当师长，驻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组织了军事裁判庭，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定了罪；刘师长6年监禁；参谋长5年监禁；保长3年监禁。此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划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这样一个好好的军官，就随随便便给枪决了，国家还有法律没有？冯先生说：我听明白了，让我去找蒋介石去说，他要杀刘师长他们3人，请先把我姓冯的杀掉，不能，他就不能这样办。韩不哭了。他说他去对白崇禧说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冯说：很好。这时，冯拿起毛笔来写了四扇屏：

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道大桥，桥底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马惊着了。卫士们把那个人抓住，送给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杀那由桥底出来的人。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杀他，只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杀他不可！”张释之说：“若皇帝要杀那个人，你就在他从桥下一出来的时候，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在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着国法去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的冯玉祥将军

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他活，一恼怒就叫他死；若是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汉文帝说：“很好，我听你的话。”

第二扇，冯先生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子，被人拿住了，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三族，张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汉文帝大怒说：“我为子孙的，连父母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人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办起来，那我还能作皇帝吗？”张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拓土，应该如何呢？”汉文帝半天无话说；等了一会儿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说。”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去办理。”

第三扇，冯先生写的是：唐朝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李世民大怒，就交给最高法官戴胄，并且叫戴胄把贿选的人一律斩决。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的话就恼了，他说：“我亲笔手谕都驳回不算数，我真的没有脸面做皇帝。做好人都是你们做法官的事，做恶人都是我做皇帝的事，你想想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面？”戴胄说：“这样办法不但有脸面，并且是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戴胄说：“刚一听见选举是贿选的，不由得你恼怒了，拿起笔来就划一律斩决；回来一看，知道手谕和法律不一致，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国王不但不丢脸，反而更觉得光荣。”李世民站起来握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

第四扇，冯先生写的是明朝的一段故事，意思与上边三扇相仿。这里不多说了。

以上四扇屏，冯先生用红纸包了一大包，上面写着：“五月端午的

礼物。”给蒋介石送去。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陈布雷对冯先生说：“你给蒋写了四扇屏是不？”冯说：“你怎么知道？”陈说：“蒋读了那四条屏后说：‘除了冯先生给我写这以外，再没有人给我说。’当天晚上，蒋介石找冯先生去谈话，说到刘师长等被枪决的事情。冯先生说：‘你一喜欢就叫人活，一不高兴就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这里让你胡来吧？’”蒋介石说：“这件事，实在是我的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冯玉祥先生从许多事实中，逐渐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感到在国内已无能为力而且危险，因此，便与李济深等计议出国，李济深主张赶快走。“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冯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和言论，使蒋很恼火，他为了排除内战障碍，给了冯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冯遣往美国。

冯临行前，周恩来曾访冯并谆谆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离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冯先生于1946年9月2日由上海起航，到达美国，当即在美反美援蒋，并于1948年7月31日毅然拒绝美国政府的引诱，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准备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船上起火遇难。

（责任编辑：刘文）

（于志恭：82岁，1933—1946
任冯玉祥随从少校书记官）



冯玉祥在美国（1948年春）

紧急启事

近日接到几位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全年38.40元，免收邮费。本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联系人：杜习



黄伯韬殉葬记

● 李 伟

1948年,江淮之间爆发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决战——淮海会战。国共双方投入兵力140余万,决战65天,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第七兵团所属部队12余万人全部覆灭,中将司令官黄伯韬战死。多年来关于黄伯韬之死,或语焉不详,或人言言殊。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曾目睹黄伯韬之死,笔者辗转得到可靠材料,以纪实手法揭示这隐藏40余年的谜案。

辽沈战役败局底定,蒋介石指定国防部拟订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原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抗命。这样任务就落在参谋长顾祝同身上。

顾祝同带着作战厅长郭汝瑰,于1948年11月4日上午匆匆由南京飞到徐州,不待休息就主持军长以上参加的作战会议。

郭汝瑰讲完作战计划,顾祝同扫视一下会场,会上气氛沉闷。

“请大家畅所欲言”。顾祝同把眼睛看着七兵团中将司令官黄伯韬。

黄伯韬出身低微,早年是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李纯看他眉清目秀,说话机灵,便把身边的一个爱婢赏给他,又送他到金陵军官教育团学习。李纯死后,奉系军阀张宗昌进攻江苏时,黄伯韬被俘。张宗昌曾担任过金陵军官教育团团团长,与黄有师生之谊,黄归降了张。蒋介石北伐,张宗昌溃败,他又投蒋。1941年,三战区长官司令顾祝同需要参谋长,何应钦推荐了郭寄嶠与黄伯韬。蒋介石考虑郭是卫立煌的老参谋长不能他调,就选了黄

伯韬。山东孟良崮战役,七十四师张灵甫全军覆灭,黄伯韬因救援不力,本要治罪。还是顾祝同帮了忙才平安无事。

“总座,据卑职之见,共军主力由临沂一线扑来,首在谋我七兵团。我兵团远离徐州,孤军突出,极易击破。再目前我军分布在陇海线两侧,兵力分散,也难协同作战。我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深沟高垒以乌龟战术对付共军……”

这早已是南京大本营的既定方针,目的是让刘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冯治安等人统一思想。会议争论了一阵,顾祝同才宣布:(1)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2)第2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3)第七兵团撤回运河西岸,向徐州方向靠拢……”

黄伯韬心中暗暗高兴:“总长是向着我们的。”

黄伯韬于4日下午回新安镇,本拟立即召开部署西撤的会议,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要他在原地等待远在海州的四十四军到后再撤。

此时华东野战军先头部队已

迫近郑城,有合围夹击势态。黄伯韬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其一正是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44军随他从海州西撤);另一个是战地视察官李以勋。后者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

黄伯韬把两位将军请到地图前,说:“我兵团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要在新安镇打,孤立无援;西撤徐州,不到徐州就会与共军遭遇,而且运河上未增添桥梁,势必迟误我们的行动。四十四军至今未到,让4个军等待1个军,这是什么战术?如果我们被困,徐州战局就要陷入不利之境。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黄伯韬不点名的骂起刘峙来,他拉着李以勋的手说:“老弟,如果这次会战垮了,将来怎么办?”他又带着颤音说:“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我个人的生死是不足惜的。”

“焕然兄,你不要把形势看得太紧张了。”李以勋安慰他道:“你手里有5个军,10多个纵队,共军未必会拿你怎样?”

“是啊!这也许是老兄建立功勋的时机了。”一旁的李延年说风凉话。

黄伯韬沮丧地说:“今天的国共相争,就像当年的楚汉之争。都

在这徐州会战，结局难以预测啊！”

李以助又安慰他一番，扯了一些别的事就准备告辞了。

临别时，黄伯韬说：“请转告刘老总（刘峙），各兵团要快快集结，迟了必误大事。”“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能够相救。古人说，胜利举杯相庆，败则死力相救，我们是做不到的。不过，这次战事与以前不同，主力决战，关系存亡。如果相互坐视，必同归于尽。”

李以助点了点头，再也不想不出更好的话安慰他了。

“老弟，你是总统派来视察战场的，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会苟免的。请一定转达总统！”

黄伯韬哽咽着说完这番话，灯光下，李以助看到他的泪光在闪动。

这时已是11月7日晨1时20分。

黄伯韬最后又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三

送走两位大员后两小时，黄伯韬只用了两小时就把七兵团撤出新安镇，西逃徐州。

一时间，车轮滚滚，尘烟弥漫，人喊马嘶。蒋军士兵恨不得多生两只脚。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消息传来，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在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领下，于战场起义。徐州告急！

第七兵团撤了一半路程，黄伯韬接到情报，共军7个纵队已从新安镇尾追上来。前面退向徐州的通道曹八集，大许家，有可能被解放军堵住。黄伯韬出了一身冷汗，他最担心的是面前滚滚大运河，只有唯一的一座铁桥，10多万大军如何通过。幸好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坚

持自率部队开赴窑湾镇，在那里征集民船过河。

黄伯韬下令按六十四军、四十四军、兵团部、二十五军和一〇〇军的序列通过。8日正午前必须全部撤过运河。在碾庄集合。

破晓时分，黄伯韬亲到运河桥头，只见几支探照灯像利剑一样刺向桥上，照得桥面亮如白昼。密如蚁群的人流，前拥后挤，争先恐后向桥西冲去。汽车鸣笛声，步兵的喊叫声乱成一片。

各部陆续在碾庄会师。兵团司令部刚安顿好，徐州副总来了电话，因何基沣、张克侠投共，徐州门户洞开，原驻大许家一线的李弥兵团要撤回徐州。

又一个不样的消息来到。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来电告急，该军没有征到船只，受困于窑湾镇。

黄伯韬清楚：这种局面是国防部和刘峙要他等四十四军造成的。他决定在碾庄集结休整。明天上午8时，各军长到兵团部开会，决定下一步行动。黄伯韬当即赶到十三兵团司令部去，他要敦促李弥顾全大局，不能放弃大许家、曹八集一线。”

晚9时许，十三兵团司令李弥接待了黄伯韬。黄伯韬告之李弥：贵兵团千万不能撤。现我兵团还没

有完全过河，你们一走，我们就要腹背受敌，断了退路，不妨你我合作，打共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不好办呀，刘峙今天一天就来三次电话，不撤不行呀，……”李弥装作无奈的样子。

黄伯韬带着失望回碾庄。

第二天，4个军长先后来到了兵团部。听黄伯韬的部署。

“……现在形势险恶，各部需昼夜兼程，乘东面共军还未接近运河铁桥，西面还没有切断陇海线，我们要迅速推进到大许家、曹八集，与徐州连成一片。”

黄伯韬强打精神说完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第一个说话的是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他的部队是有较强实力的广东军，抗战时期和日本人打过硬仗。六十四军最先过运河，没有什么损失，又接收了十三兵团第八军留下的工事。他主张就地不动，快一些决战，挽回劣势。

“我看还是西撤一里好一里。留在这里，万一被围，谁来救我们？！靠邱兵团，有可能吗？”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主张西撤。

“哼，”黄伯韬冷笑，说，“就是相隔5里也不会来救的。”

会场静了下来。

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因目前



华东野战军突破碾庄外壕

的困境就是由他的部队所造成的，自然没有说话的地位，因此默默不语。

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因为过桥时，他的部队违纪，再说他本不是黄伯韬的部队，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也来个闷声不响。

“司令官，你就做决定吧。要打就打。”这边刘镇湘又逼黄伯韬下决断。

黄伯韬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一下地图，蹙着眉头思忖，徐州距碾庄两天路程，如果被围，只要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全力救援，里应外合，是可以击溃共军的。到时说不定还可以建立一番功业呢。

他正在沉思不决时，国防部又来了急电：“如有必要，可在碾庄略加休整”。这样他就下了决心：

兵团司令部置于碾庄不变；第二十五军占领碾庄以北之小牙庄、尤家壸一带，向北防御；第六十四军占领碾庄圩以东之大院上、吴庄，向东防御；第四十四军守碾庄圩车站及车站以南之各村庄，向南防御；第一〇〇军位于彭庄、贺台子，对西防御。各军炮兵集中使用。

碾庄，距徐州不足 50 里的小村，因黄伯韬一着之失，成为两军剧烈鏖战之地。当李弥放弃曹八集、大许家西撤徐州的翌日，华东野战军第七、十、十三三个纵队滚滚南下，与陇海线南侧的十一纵、江淮独立旅南北对进，迅速占领徐东这两个重要据点。黄伯韬的 12 万大军被围得严严实实。

四

1948 年 11 月 18 日。

黄伯韬在兵团司令部长吁短叹。困守碾庄已经 10 天，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17 日傍晚，碾庄西的彭庄、贺台子被共军击破，一〇〇军周志道军长负伤逃回碾庄；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临阵投降，全军崩溃，军长王泽浚被

俘；第六十三军在窑湾镇渡河未成，固守不到三天，就被共军击破，军长陈章战死；第四十四师在曹八集进退两难，师长刘声鹤自杀……仅仅是 10 天，统帅的五个军已被歼 3 个军零一个整师，防御阵地已丢掉二分之一多，真已面临绝境。

几天前，黄伯韬还登上司令部的屋顶，遥看西方是否有援兵到来，一次次都是失望。盼望别人来救，这是渺茫的。

下午，黄伯韬穿好全部戎装，带着参谋长魏翱，来到二十五军阵地。现在只有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还建制完整具有作战实力。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军身上，他亲自来鼓舞士气。

野地里，许多士兵正在赶挖工事，见司令官走来都停下来敬礼。黄伯韬笑着说：“你们加紧干，援兵就要来了！”

天空忽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银色的飞机正在碾庄上空盘旋。黄伯韬抬起头，只见一个降落伞，飘飘而下，士兵们欢呼起来。他们以为空投的又是粮食弹药。降落伞落地了，士兵们在地上拾起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封信。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交给了黄伯韬。

这是蒋介石给黄伯韬的亲笔信：

煥然司令弟勋鉴：

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关键，务希严令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顺颂戎祉。

各军师长均此

中正手书

黄伯韬看罢默默不语。

身旁的官佐，给黄伯韬接通了地对空电台。话筒里传出顾祝同的声音：“煥然老弟，你还好吗？”

“总长，感谢您的关心，我很好！”黄伯韬的眼睛湿润了。

顾祝同又安慰黄伯韬，竭力向

他打气，但说到增援部队的进展时，似有难言之隐……

黄伯韬自然心里明白，他想到顾祝同曾对他的提拔与照顾，不禁心中酸楚，哽咽地说：“总长，请放心，我七兵团一定战到一兵一卒，只是……”

顾祝同被激起了同情心，觉得该说真话了，他说：“东援的邱、李兵团，现被阻在大许家、薛家湖，困难重重。如果你能全线突围，还是自己突围为好……”

这样一说，黄伯韬知道连顾祝同也对东援消极，他绝望了，长叹一声说：“我永远铭记着总统的厚爱和总长的栽培，我会对得起总统、总长，牺牲就是了。”

高空飞机消失了，黄伯韬愤愤看了一眼。

五

1948 年 11 月 21 日。

碾庄的战斗到了最后关头。

晚 10 时，黄淮平原像地震一样颤动，数万发炮弹突然倾泻在碾庄圩所有的建筑物上。30 分钟后，这 200 余户的村庄夷为平地。

一条七八丈宽的水壕却挡住了华野战士的去路。成了黄兵团士兵的最后屏障。唯一的通道是一座石桥，黄兵团用五挺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封锁着。

20、21 两天，每天都是上万发炮弹的轰击，石桥已经不存在。华野共军潮水似地冲过水壕。

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冲进掩蔽部，对黄伯韬大声喊：“司令官，快走！”

黄伯韬爬出掩蔽部走到院子里，抽出长长的指挥刀，狠狠砍在一株老槐树上，长叹一声：“完了！”在一群人簇拥下离开碾庄。

这是 21 下午。

黄伯韬、杨廷宴出现在碾庄圩东北方向的吴庄。吴庄是六十四军一五六师指挥所的驻地。整个七兵

团就剩这一方土地了。

困守碾庄的4个军,六十四军的阵地最为坚固。军长刘镇湘利用了李弥兵团的既设阵地,又加以改造。他利用犬牙交错的近10个村庄,构成蛛网式的阵地,村与村都以工事联系,枪眼从平地射出,成为层层火网。这使六十四军在碾庄被突破下,仍能有相当范围的阵地。

刘镇湘看到黄伯韬的来到,知道碾庄已失,自己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抵抗已不可能。

当晚,黄伯韬与刘镇湘等商议突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22日下午,吴庄已不可守。刘镇湘也同意突围。

冬日天短,天渐渐黑下来。黄伯韬指挥着六十四军的残部开始向吴庄西北方向突围,企图与40里外之塔山的李弥兵团会合。

冲出不久,遇到炮火的猛烈阻击,一行人就冲散了。只有杨廷宴和少数勤务兵还跟着黄伯韬。

前面是一片苇滩地,子弹密如飞蝗,黄伯韬前后的人员都纷纷倒下。杂乱的枪声中,只见黄伯韬一个趔趄,身子突然扑倒。原来他腿部负伤了。

黄伯韬挣扎着起来,含泪对杨廷宴说:“我已不行了。我实在糊涂。一是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四十四军两天;二是我在新安镇两天之久,又为什么不在运河上架设浮桥……还有我想不通的是李弥兵团既然要来援救我们,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们西撤……”

“一切都晚了。我是对得住党国的。我的牺牲可以使别人知道,国民党还有忠心耿耿的人。你不要管我了,你年纪还轻,希望你能突围出去……”

杨廷宴正待劝他,忽见黄伯韬猛掏出手枪,对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枪响后,黄伯韬没有立刻死去,

在地上左右翻滚,痛苦万状。看来救活无望,杨廷宴不忍见他挣扎的惨状,用枪抵住他的胸口,扣动了扳机。黄伯韬“哼”了一声就此死去。

一个解放军搜索过来,大声问:“干什么的,他是谁?”

杨廷宴带着哭声回答:“我……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的哥哥。”说着嚎啕痛哭起来。

解放军看他满脸泪痕,又穿着士兵衣服,也许又为他的亲情所感动,转身走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双方炮火平息。利用这间歇,杨廷宴在

地上拾到一件大衣,把尸体裹好,在一棵大枯树下挖一个坑。又在黄伯韬的口袋里翻了几下,摸到一个铜牌,借着烟火的光,见上有“来宾证”三字,另一面刻着“17号”。这是晋见蒋介石的特别通行证。他仍把铜牌放在黄的口袋里,草草掩埋。

这时已是23日临晨4时。

杨廷宴一口气跑到蚌埠。第一件事就是想法运回黄的尸体。找到了一位朋友的亲戚,是一个姓王的青年。看上去还机灵老实。杨向他介绍了埋葬的地点和口袋中的信物。当场先付一根金条,言明运回后再给两根。另给几枚金戒指,便于他途中花用。还说好,杨在浦口等他。

那王姓青年,昼夜兼程,匆匆赶到吴庄。这时碾庄一带战火已停,旷野里到处都横躺着冻得僵硬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在吴庄苇滩地的那棵大枯树下,他找人挖出黄伯韬的尸体。

十一月二十四日晨

合江日報

外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徐東大團戰勝利結束

全殲黃伯韜兵團五個軍

淮海戰役開始以來敵正規軍被殲及起義者已達十八個整師

(本報訊)據新華社津浦前線廿二日電:徐州以來敵莊地區的國民黨軍黃伯韜兵團五個軍十個師,已於廿二日下午十時被全殲。敵一滿洲。此次戰役開始於本月七日,截至廿二日止,十六天中,國民黨正規軍部隊被殲及起義者已達十八個整師(非正規軍及受重大打擊的部隊尚未計在內)。

黃伯韜兵團的覆沒,對於淮海戰役今後的發展有重大意義。現已勝利地結束了淮海戰役的第一階段,人民解放軍的攻勢正繼續擴大中。

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号外

这姓王的还挺机灵,找来一个赶马车的,好说歹说,说给四枚金戒指,先给两枚,运到浦口后再给两枚。于是两人七天七夜,晓行夜宿,经灵璧、五河,绕嘉山、来安,终于把尸体运到了浦口。

杨廷宴早已等在那里。尸体一到,用力剥开大衣一看,尸体冻得僵硬,光看一双脚,竟没有鞋子。一个兵团司令落得如此下场,杨廷宴哭了一场,然后去浦口街上给黄伯韬买了一双皮鞋穿上。

……

蒋介石先后听到李以劼、杨廷宴报告黄伯韬的死讯,连连叹气,随后说:“黄司令官临难不苟免,临危负重任,壮烈牺牲,功在党国。他的事迹记在党史,我已下令公葬,厚恤家属。”

几天后,公祭黄伯韬于南京白下路殡仪馆,国防部派参谋次长林蔚代表蒋介石。厚葬黄伯韬于南京太平门外的笔架山。

(责任编辑:仲文)

武则天是怎样走向权力顶峰的

● 徐庆全

相传在武则天一岁，精通相术的袁天纲曾到工部尚书武士彟府第看相。这时长得活泼可爱的武则天正抱在乳母的怀里。袁天纲走近仔细端详后说：“此小郎君神色奥赜，不易知晓，让他走走看。”于是，乳母让她试走了几步，袁天纲大惊道：“此郎君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因为当时武则天身穿男孩子衣服，袁天纲遗憾地说：“可惜是郎君，若是女，当为天下主。”

这段看来是属于无稽之谈的看相故事，竟被载入了正史，给本来就在历史上充满了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武则天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14年后，这个“当为天下主”的小“郎君”，来到了长安城的皇宫，迈开了她应验相术的第一步。

太宗皇帝崩驾时，武则天已经27岁了。她14岁入宫起，已在宫中度过了13年的寂寞岁月了。

太宗皇帝虽然是马上打天下的皇帝，但或许多年的戎马生涯的影响，他并不喜欢英明果断的女人。武则天最初的入宫，她的美色却让太宗为之一惊，但在后来相处的日子里，太宗发现她温柔和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杀伐果断的干练。有一个武则天在晚年常爱津津乐道的故事正说明这一点。

太宗有一匹名叫狮子骢的马，是西域番国所赠。太宗喜欢它的骠悍，也苦于它的桀骜不驯。一日，太

宗召了几位文武大臣在御厩欣赏此马，并问大家：“如此名骏，徒困厩中，诸卿谁能驭驯？”大家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这时，随侍太宗身后的武则天却对太宗柔声道：“只要陛下给臣妾三样东西，臣妾可以驾驭。”太宗惊问：“哪三样东西？”则天悠然道：“一条铁鞭，一柄铁锤，一把匕首。先用铁鞭打它，不驯则施以铁锤，若还不能服，则用匕首切断它的咽喉！”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竟有这种勇气，太宗皇帝为之一惊。也不免几分疑虑：则天既有以铁鞭驯马的冷峻，也会有铁鞭处世的冷酷，倘若大权在握，后果堪忧。则天虽然仍是太宗的才人，但从此被太宗有意无意地冷落了。

40多年以后的事实表明，太宗当时的思虑是有道理的。武则天把没有机会在马身上实施的驯治法，移到了唐王朝的李家皇室，把唐朝这匹马弄残废了。

武则天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虚度在深宫后院，但她没有自暴自弃，却以她的聪慧，把那含情脉脉的目光转移到太子李治身上。

一个荒诞不经的迷信事件，几乎使她大祸临头。

当时，太白星常在白天显现，注重星相的太史官把这一现象报告了太宗，并解释说，太白星的显现是“女主昌”的征兆。这时，民间也流传

一本叫《秘记》的书，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有天下。”对此，太宗感到不寒而栗。为了子孙，他要尽早扫除克星。首先成为怀疑对象的李君羡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李君羡是一名骁勇的武将，早年跟随太宗征打天下，有一次，太宗宴请武臣，李君羡也参加了。席间行酒令，约定谁输了得说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输了，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太宗顿起疑心。李君羡是武安人，封为武连县公，任左卫将军，又在玄武门值班。“五娘”又偏偏是个女人的名字，那“女主武王有天下”的流言，原来应在他身上！于是，太宗先以借口将他出为华州刺史，继而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死。

身在后宫的武则天，当然也逃不出太宗的目光。太宗本欲将武则天及可疑者一并杀尽，但太史令李淳风劝谏说：“天命注定的东西，人是不可违背的，为一人杀死那么多无辜者，更使不得。就算今日杀了她，上天或许又生一男子代之，那时陛下子孙受害更大，恐怕就要断后了。”太宗不得不中止了屠杀。太宗对武则天由冷落到嫌恶，渐渐忘了她的存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皇帝在不安和忧虑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李治继位，是为高宗。

按照皇家惯例，皇帝死后，后宫没有子女的内宫佳丽，多半要被送到皇家庵堂里削发为尼。武则天也

被送到感业寺,开始了晨钟暮鼓、孤月青灯的尼姑生涯。但是,被幽闭尼庵中的武则天没有绝望,借着她在高宗身上的情感投资,她在等待着机会。

永徽二年,怜香惜玉的李治终于召回了武则天。

这一次进宫已非往昔可比。在太宗身旁随侍的岁月,使她已经深谙宫廷争权夺利之道,她尽其所能讨皇后欢心,王皇后觉得武则天谦恭卑顺,经常在李治面前夸赞武则天的贤能,并力主将她封为仅次于皇妃一级的昭仪。

就在王皇后兴高采烈之际,武则天已经把目标指向她了。

为了扳倒皇后,武则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襁褓中的女儿。永徽五年春,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女儿。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对武则天的女儿格外喜欢,并时常来武则天处抱抱孩子。一天,王皇后把孩子抱在怀里抚弄一会儿,又放回床上。武则天回来得知后,一个陷害皇后的罪恶念头产生了。她把孩子用被子蒙上后用力掐死,然后像没事人一样,静静地等待着下朝回宫的李治。不多一会儿,皇帝回来了,武则天仍假作欢笑,掀起被子要抱,但孩子已经气绝。武则天放声痛哭。皇帝讯问情况,左右宫女回答,刚才王皇后来过。李治便断言:“后杀吾女。”皇帝的金口一开,王皇后便面临着被废掉的命运。

永徽六年六月,高宗正式提出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的提案,托孤大臣长孙无忌、诸遂良等二人立即激烈反对。高宗碍于托孤大臣的身份,又不好与他们过分作对。武则天此时也审时度势,她明白,如果没有一批朝臣的呼应,是很难对付坚持顽固立场的老臣集团的。因此,她绕过反对派,将一批政治上失意人,如李义府、裴行俭等笼络在自己手下。李义府,此时官居中书舍人,因得罪长孙无忌被贬为壁州司

马。李义府深知高宗武则天之心,为了讨好,他向高宗奏道:“王皇后有失妇德,不能为母仪,请立武昭仪,此乃兆民之心。”高宗武则天见奏后,非常高兴,立刻召见李义府,并赐珠一斗,恩准恢复原职。这事披露后,朝臣们看到了亲近武则天的好处,纷纷上奏表示拥立武则天的。

朝中拥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呼声,给武则天提供了向老臣们摊牌的时机。八、九月的一天,退朝后的李治召长孙无忌、诸遂良等大臣入内殿商议废立皇后事。诸遂良迈步向前,手持象牙朝笏,跪拜道:“将先帝的遗言提醒陛下,这是为臣的职责。臣所承诺于先帝的话不能遗忘。若是圣意已决,臣已无话可说。”遂将朝笏仍在殿阶上。性情温和的高宗被此举激怒了,命人立即将诸遂良带出去。坐在帘后谛听争论的武则天竟破口大骂:“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赶忙以“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可免刑”为由,将遂良保下。

这一次殿议又不欢而散,高宗烦恼无比。正在此时,一直对废立皇后之事充耳不闻的李益上朝来了。

李益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先后跟随李渊、李世民,在政治风雨中闯荡数年。他老于世故,早就看出废立皇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但他一直称病,对朝内朝外两派的意见均不参与。不过,在内心深处,他知道高宗、武则天是得罪不起的。当高宗皇帝征询他对废立皇后的意见时,李益不假思索地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陛下完全可以自作主张!”李益话虽然不多,却很圆滑,实际上是在暗示高宗根本不要理会诸遂良那一伙人,尽可以自行其事。李益也是开国元臣,他的话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可以说是废立皇后的关键一票。这一票的争取,使多日来陷入郁闷心情的高宗为之一振,遂下定了废王立武的决心。

这一年十月,高宗下诏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册立仪式

在十一月一日举行。在更立皇后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司空李益得到了极大的荣誉。他被任命为礼使,将皇后的玺绶恭敬地奉献给武则天。新皇后向这位得力的支持者颌首报以感激的微笑。至此,武则天争夺皇后之位算是告捷。

经过三年的争斗,武则天终于以后宫主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唐宫廷。虽然她春风得意,但却并未忘乎所以。她清醒地意识到,在皇后废立的争斗中,反对她的政敌还依然存在。这些人在朝一日,她自己就一日不能随心所欲。长孙无忌。虽然他现在缄口不言,置身于政事之外去编撰《武德贞观二朝史》,但他的势力却在宫中显示着。韩瑗、来济等元老重臣,依然聚集在他的麾下,高宗皇帝对这位有顾命老臣身份的母舅也一直优崇有加。要想扳倒这颗树,必须采取高明的政治手腕。工于心计的武后很快找到一种策略:扫清外围,孤立长孙无忌。

韩瑗给武后的策略提供了第一个实施的机会。一年前诸遂良的被贬斥,使韩瑗一直挂怀在心。他以为武则天立后已有年余,当初这段夙怨也该了结了,便苦心奏上一本,请求复遂良原职。岂料,武则天绝不是那种心胸开阔到不秋后算账的政客,韩瑗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久,武后授意其股肱心腹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韩瑗、来济与诸遂良暗中策划谋反,以此为借口,韩瑗被贬到近乎于流放地的振州(今海南省崖县西),来济被贬到台州(今浙江临海)。最可怜的还是那位顾命老臣诸遂良,韩瑗上奏本意在为其赦免呼喊,但却使他被贬往更远的地方爱州(今越南清化)。诸遂良自武德初年归唐,功勋卓著,年逾60竟要在贬地老死余生,他心情沮丧,第二年便身死贬地。

在诸遂良命魂归西时,与他同样担负托孤使命的长孙无忌,也开始了他的厄运。韩瑗,来济已经清

除,武后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要收拾长孙无忌了。显庆四年,武后授意心腹许敬宗,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长孙无忌巧妙地牵扯进去。

这年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向朝廷呈上一张状纸,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比为奸,图谋不轨。高宗让许敬宗审查此案,许敬宗心中暗喜。审案时,许敬宗对韦季方表示,如果他咬定长孙无忌是同谋犯,他就可从轻发落,反之则从重处罚。韦季方在严弄烤打之下,没有诬陷无忌。在被逼得无可奈何时,他只求速死,便用匕首在身上自刺数处。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口中获得无忌“谋反”的证据,便谎向高宗奏报,称韦季方已经招认,谋叛首领是长孙无忌。

李治听后大惊道:“哪会有这种事,舅父被人诬陷,绝不至于谋反!”“命许敬宗再审查核实。这时在狱中奄奄一息的韦季方已经口不能言了,谁来审查也无法获得真实的口供,这样,皇帝的舅父是谋犯首领这一罪证,已成定论了。

高宗不得不下诏将长孙无忌发配到黔州。

失宠的大臣一旦流放在外,便不难收拾了。第二年,在武则天的指示下,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输到黔州,找到了长孙无忌,逼其自缢,可怜这位老臣,上马打天下、下马辅朝政,竟然不得善终。

得知长孙无忌的死讯后,武后喜形于色,其心情畅快程度不亚于登上后位之时。重入宫五年来,妨碍她走向皇帝宝座的诸遂良、韩瑗,来济、长孙无忌,一个个灰飞烟灭了。至此,太宗皇帝曾图形于凌烟阁的24功臣除李盒任官依旧,尉迟敬德、魏征等早逝外,几乎被一网打尽了。李唐王朝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柱,再也无力与武则天相抗衡了。协从武后实施一系列计划的许敬宗在朝中如日中天,那个“口蜜腹剑”的笑面虎李义府,也再起为相,和许敬宗成

为武则天的得力助手。李唐的大权从此牢牢地控制在武则天手里了。

武则天共生有四子:长子弘,次子贤,三子显,四子旦。长子李弘已早立为太子,幼年即饱读经史,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老臣们常爱谈起太子弘童年时读《春秋左氏传》的一件事。当他读到楚世子商臣杀其君时,竟然不愿意看下去,足见太子弘性情仁孝。高宗非常喜爱太子弘,对其礼和谦让的作风大加赞赏。近年来,由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产生了禅位太子之意。

高宗这个决定使得武则天忧心忡忡。如果李弘继位称皇,那么,她孜孜追求的目标就要前功尽弃。

上元二年四月,年仅24岁的皇太子李弘,随父皇、母后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洛州合璧宫。入夜,一家人在尽享美食佳肴时,太子弘突然死掉了。关于太子弘的死,在史籍上见诸记载最多的是“母后鸩杀”,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死于痼病。在这里我们不愿意劳神来分辨这些说法的是与非。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绝不能按常人的道德情感标准来揣度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后位子就能掐死自己亲生女儿的母亲,在比皇后位子更诱人的皇帝宝座面前,毒杀自己儿子也许是更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我们更相信太子弘是被他母亲毒死的这一说法。一个最好的注脚是,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篇,哪一个朝代不是被这种骨肉之间的仇杀所充斥着?

政治争权的残酷性让高宗精神恍惚,丧失亲子使他愤懑悲痛。在这时候,即使再懦弱的他,也能从儿子的暴死中悟出点什么来。在安葬完儿子以后,他决定远离醜陋的权力争杀中,他平静地向群臣们宣布,他要退位,他不想让一件又一件的谋杀案继续发生了;再者,他体弱多病,已无精力处理政事,大权已给了武后,那就何妨再给她一个名分?

但是,朝臣们在听到这一决定后,个个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因为20年前反对武则天立后的哪些人的下场仍留在朝臣们的记忆中)。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坚持异议,认为不可,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随声附合。看到这两位大臣的激烈反对,高宗收回了成命。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宫中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出头阻谏高宗不可传帝位的郝处俊却激起了武后的愤怒。以至10年后,郝处俊入土后的灵魂都得不到安宁,又被从坟墓中扒出来示众。

太子弘死后一个月,22岁的次子贤被立为太子。贤精明练达,一直疑心弘的暴死是母后所为,为了不落同样下场,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对母后敬而远之,尤其远离母后设的宴席,生怕也像哥哥一样“吃错了东西”。

贤的这种防范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以他的心计和能力而言,是绝不能与其母后权谋智商相比拟的。贤年轻好胜,处处显露自己治国的才华,这就加速了他悲剧的命运。

李贤做的一件令母后恼怒的事情,是他对《后汉书》的注释。李贤自幼熟读诗书,且过目不忘。立为太子后,他召集一批著名的学者,共同注释范曄的《后汉书》。书成表呈高宗。高宗很高兴,并赐绢万段,以示奖掖。此后,太子的名声大振。但这件事却惹恼了母后。有一天,他的亲信告诉他,他注释的《后汉书》一事引起了母后的猜疑。因为《后汉书》中记载了汉大权旁落吕后和外戚手中的史实。此时将书呈皇上,有讥讽母后临朝之嫌。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厄运到了。

猜疑之心一起,武则天就不能容忍贤再向权力的顶峰靠拢。她千方百计限制太子的权力,另一方面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李子传》派人送到东宫,希望贤能守忠孝之道。可是,贤却并没有深思母后这

些举动的真正含义，依然躲避母后，依然我行我素。母子关系的恶化，导致后来的总爆发。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调露二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一封告发太子李贤沉溺于男色、玩弄户奴赵道生的信摆在了高宗面前。高宗派员到东宫搜查，结果在马厩发现了一批武器。于是太子贤的罪名由“狎近男色”就变成谋反了。武后乘机当庭宣称，赃具已获，不得不大义灭亲。

这一年的八月，朝廷诏敕全国，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押回长安拘禁。后又将他流放到巴州。两年以后，武则天派人到巴州将李贤杀害了。

废掉李贤的第二天，三子显被立为太子。这时，高宗皇帝已经病体沉痾，黄泉临近了。永淳二年12月，高宗在洛阳撒手人间，时年56岁。根据皇帝的遗诏，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正在一步步临近皇帝宝座的武则天，决不会中途放弃。中宗继位不足两个月，便遭到了被罢黜的命运。

事件的起因不过是中宗想让自己的岳父韦玄贞当宰相，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

中宗的这一想法跟中书令裴炎谈了以后，裴炎劝皇帝应因才赐官，不应先满足亲戚的愿望。可是，这位刚登上皇位的年青人却想摆摆皇帝的架子。他不耐烦地顶了裴炎一句：“我以天下与韦玄贞有何不可，何惜侍中邪！”裴炎碰了个硬钉子，只好将满腹的委屈向武则天诉说。武则天心里非常高兴，终于抓着废掉中宗，扫除障碍的把柄了。

二月五日早晨，侍卫遍布宫廷，百官照例上朝。武后突然召集上朝的百官到乾元殿。这时，领兵进宫的裴炎宣读武后的诏书，废中宗为庐陵王，即刻扶下宝座。李显莫名其妙，如坠云雾一般，半天才对太后、裴炎嚷道：“我犯了什么罪？”太后冷冷地答道：“你要把天下都给韦玄贞，怎么能说无罪呢？”仅仅当了54



武周圣神皇帝——武则天

天皇帝的李显，就因为一句气话而被赶下来了。

第二天，武则天的儿子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李旦与他的三个哥哥全然不同，不知是有意韬晦还是确实属于白痴，他平日只居于别殿，从不参与政事，是个地地道道的傀儡。真正的大权，完全落到了武则天手中。从此开始了她真正“圣衷独断”的武则天时代。

至此，武则天离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之遥却是那样难以跨越。

首先是以徐敬业为首的一伙中小官僚，在扬州揭起了护唐的旗帜。这支起兵的队伍是一些毫无组织的零散小股，这就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在武则天的大兵讨伐下，这伙人很快便作鸟兽散，只留下了一篇由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一文，使后人还依稀记得当时那段历史的影子。

接下来是李唐宗室的起兵。这次短命的起兵前后共20天，尽管打出了匡复天下的旗号，但却并未取得人民的拥护。反而引起了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大清洗。这次清洗，使四散各地的李唐王室几乎被斩杀殆尽。武则天胜利了。踏着李唐王室的尸体，她跨步走向大唐新君主的宝座。

载初元年，长安有个叫法明的和尚率十余人献《大云经》四卷，颂扬武则天是弥勒佛降生，当为天子。接着，一幕由她一手策划的睿宗李旦等六万余人表请改国号的闹剧也上演了。

这一年的九月九日重阳佳节，67岁的圣母神皇武则天终于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建立了大周朝。这一天是公元960年10月16日。

(责任编辑：刘文)

琵琶女艺术家吴蛮

● 杨闻宇



吴蛮

撒切尔夫人 1984 年访华，北京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晚会欢迎这位英国首相。当一位清秀娴静的中国姑娘抱着琵琶演奏《彝族舞曲》之后，女首相拉住她的手动情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这姑娘叫吴蛮，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一次，吴蛮参加由方毅、倪志福等出席的“首都科学家、劳模与青少年春节联欢会”，其弹奏极为出色，数千名观众掌声雷动。对此，《光明日报》有这样一节回顾式的文字：“今年春季中央音乐学院招考新生的动人情景，人们记忆犹新……杭州市 14 岁的吴蛮，在应考时，她演奏的琵琶独奏《彝族舞曲》把主考老师吸引到忘记了是在考试，情不自禁地喊出‘再弹一个吧’！”自那时起，吴蛮便离开了从小哺育她的西子湖畔。

吴蛮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父亲是著名的花鸟画画家，“谈笑有鸿儒”，江南笛王赵松庭（其笛子眼儿是用高等数学计算出来的），《采茶舞曲》的作者周大风，《莎士比亚全集》翻译者朱生豪的夫人

（语文教师），文学评论家洛地，昆曲表演艺术大师周传瑛、王传淞，著名美术史论家朱金楼教授……皆属吴家的常客，气氛如酒，笑语温馨，吴蛮从解事之日起，便接受的是全方位的熏陶。九岁那年，一位教师发现吴蛮对音乐很入迷，随手拿一把柳琴给她，吴蛮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弹就是两三个小时，指上嫩肉磨破了，橡皮膏一缠又弹起来。翌年，浙江省艺校招收五名学员，她既考舞蹈又考民乐，舞乐兼优，双项录取，听爸爸的，她以弹拨乐器第一名的资格踏上了民乐之路。

吴蛮聪敏、内秀，其父为什么名之为“蛮”呢？且听听吴蛮自己的解释：“江南女儿家秉性柔弱。想要成才，就应当有股子蛮劲、野气。”女儿深知父亲的夙愿，执著进取，锲而不舍，得到了琵琶教育家邝宇忠、陈泽民、刘德海、林石城、樊伯炎、金祖礼等前辈的悉心指点，作为中国首位女琵琶硕士研究生，吴蛮不仅在演奏传统的文曲（如《陈隋》、《月儿高》、《武林逸散》）、武曲（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方面驾轻就熟，一枝独秀，更令人瞩目的是她能够像敦煌壁画上那位“反弹琵琶”的“飞天”女一样，将自身勇敢地融入现代音乐，飞越汪洋大海，使手里的琵琶在西洋乐器中顽强地占据住一席之地。4 年前旅美，吴蛮除举行个人独奏会以外，曾与哥洛斯弦乐四重奏、纽约爱乐乐团、匹兹堡新音乐团、美国女子交响乐团、美国全国作曲家会议室乐团、英国苏格兰 BBC 室内乐团等密切合作，让琵琶的优美音色穿过西洋乐声而自行浮现，或似雾里红霭，或如云中闪电。真正的艺术，足以穿越天地，未进而立之年的吴

蜜,被公认为是演绎琵琶现代音乐的专家。

九十年代,西方音乐界推崇个性化的情绪,追求臆想中的意境。有一次,美国一位名作曲家请吴蜜演奏“琵琶与电子计算机”,刚接过五线谱,吴蜜有点啼笑皆非;转念一想,艺术,是全人类殷切企望健全想往交融的梦,作为有志气的中国女子,必须以顽强地不断地战胜狭隘性、地域性作为立足艺坛的基石。美国作曲家所期待的那种与电脑讯号暗相呼应的音乐效果,终于从吴蜜的纤纤玉指间流漾而生。——“此曲只应天上有”,许多人听罢,认为这是当代人所朝暮思盼着的那一种“太空音乐”。

作为古老的中国乐器,琵琶惟有发展自己民族的特色,才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0年秋,吴蜜在曼哈顿墨尔本金乐厅新作品音乐会上推出了自己与陈怡的创作曲《点》。吴蜜著文介绍:曲式构思出于对中国书法正楷“永”字八法书写动势的想象,音调素材则取自陕西秦腔之苦音(秦腔苦音弥漫于中国西北的土地上,那位反弹琵琶的“飞天”正浸淫于其间)。“侧、勒、努、钩、策、掠、啄、砭”,吴蜜从琵琶上巧妙地利用不同音域和力度变化,大幅度地溶入了文曲、武曲的演奏手法,将苦音里源远流长的人生况味上推上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将东方远祖与现代人的生命底蕴浑成一体的音乐力度,是一种“文化人类学”层次上的自由激情。台下听众如痴如醉,反响非常强烈,吴蜜自己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艺术家有自己立身的土地,艺术之美质却没有国界,它属于天籁,覆盖着全人类。

1985年,英国一个贸易团来华,其中一位成员深知撒切尔夫人酷爱中华文化,便特意收集美术珍品带给自己的女首相。此人在南京觅得一幅元气淋漓,色相浓丽的花

鸟画携回本土,撒切尔夫人深为满意,并将画收藏。画家署名“吴国亭”,当女首相打听到他就是吴蜜的父亲时,更是赞叹不已。

吴国亭年近花甲,是一位集教授、画家、美术评论家于一体的艺术家;当今中国美术界的诸多“领导”,几乎有四分之一是他教出的学生。

1989年4月15日夜,吴国亭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全国民族乐器大赛”的现场直播。琵琶项目里,吴蜜最后一个登台,所弹之曲是“霸王卸甲”;只听了开首两句,这位生性沉静的画家便“噫”地拍了下茶几,忘情地叫出声:“嗨!这第一名定点啦!”宣布评奖结果,吴蜜果然第一。吴国亭在1991年出版的个人画册扉页上,郑重地印有这样行一文字:“赠给我的爱女吴蜜。”

今年开春,吴先生去西湖之滨访旧(那里是他前半生待过30年的地方)。浙江歌舞团的演员们(吴蜜当年的同学)一提及誉满当今乐坛的吴蜜,便对吴国亭说道:“你家吴蜜可是你一巴掌打出来的噢!”一句调侃之言,直教银丝满头的吴

先生满面通红。吴蜜那时不满10岁,学校归来,爸爸在一旁辅导,每次得练4个小时。艺术的胚胎里含有率真与顽皮的因子。一天,吴蜜太累,使性儿不肯练了,爸爸一气之下,突然打了她一个耳光。

那年月,吴国亭生活困窘,自个儿22年未曾吃过一粒花生米,未啃过一口苹果,不知何故,却打了小女儿沉重的一巴掌,那个悔哟,悔得西子湖也波澜叠起……

我是关中人,小时就是秦腔爱好者。吴蜜创作于大洋彼岸的琵琶曲《点》,择取秦腔苦音为基调,直使我感慨万端。在南京城里,与吴国亭先生谈天说地,观其作画,遗憾的是终于没有见到吴蜜,无缘领略《点》的风韵神采……“总有听到的机会吧!”吴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挺自信,也很慷慨。“我女儿被美国音乐界誉为‘这一代最聪慧、杰出的全方位音乐家’,四年内出了四张雷射磁碟,你怎么会听不到她的琵琶曲呢?!”

(责任编辑:刘家驹)



吴蜜父亲吴国亭教授

中国一绝

万钟的彩蝶画

●田闻一

万钟酷似张大千。一双亮目，一部美髯飘飘垂胸，穿身整洁的中山服，风纪扣夏天都扣得巴巴实实的。他是个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彩蝶画家。中央电视台在“中国一绝”专题节目中介绍了他。《人民日报》海外版、《澳门日报》、加拿大《加京华报》、《中国书画报》、《文摘周报》……或发通讯、或发评论，或刊作品。万钟出名了。他不善交际，不善推销自己的作品。当一些会炒会卖的三流画家买汽车、买别墅时，万钟却依然在四川荣县他那幽静的梦蝶轩里埋头画彩蝶。他的《百花图》、《百蝶图》曾五次应邀参加国际扇面展览，引起轰动，作品均由国际扇面委员会珍藏。人民美术出版社两次出版他的《百蝶图》。北京自然博物馆、荣宝斋及日本、加拿大等国都珍藏他的作品。万钟笔下的彩蝶已列入国宝。

万钟从小就喜欢临摹舞态翩跹、色彩斑斓的蝴蝶。上图画课，他将平时默然于胸的花草蝴蝶落在纸上，居然十分生动。万钟的美术老师詹联科也极擅画蝶，人称“詹蝴蝶”。从小学到中学，万钟在詹联科的指导下进步飞速。三十年代初，他进了四川艺专，同学中画花鸟的少，画没骨工笔花鸟的更少；喜画蝴蝶的仅他一人。

一代名师徐悲鸿、齐白石先后来艺专讲课了。徐悲鸿说：“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中国画技法，又要创新，要学习西方的优秀技法，才能创造出新颖的中国画来。”

齐白石说：“学画应从写生入手，从工笔入手，把基础打好，以后画写意画就不难了。”

1936年夏，万钟毕业了。艺专举办学生成绩汇报展。齐白石在万钟画的一幅蝴蝶花卉前伫立良久，对学校领导说：“这位同学的蝴蝶画得不错，有功夫……”

张大千慧眼识才。自古以来，



万钟

画蝶名家都能表现出蝴蝶华丽的色彩，轻盈的体态，翻飞的动势，但很难画出蝴蝶的绒毛质感。而万钟却用特制的笔蘸上油灰粉烘晕蝶翅，这一绝招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仿佛如真蝶落在纸上，使这位大师感动不已。他找来万钟当面勉励：“……你只要努力学习，前途无量……”

历时三年，他绘成了《百蝶图》。50页，每页画蝶一至三只，确实美！画上百蝶，形态各异，精彩纷呈。当代名家们纷纷评点。

赵望云：“有深刻功力。”

熊佛西：“此册实超乎写生之上，诚珍品也。”

张聿光：“尽态极妍。”

苏葆楨：“秀丽清新巧夺天工。”

吴一峰：“花飞蝶舞妙笔生辉。”

岑学恭：“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万钟又专诚去青城山拜访老师大千先生。那天大千走出山门

降阶相迎。他手抚美髯，朗声道：“欢迎蝶痴先生！”万钟赧然：“学生怎敢！”大千先生手携 21 岁的万钟，哈哈笑道：“这样晚，你敢上山，不怕老虎？”“青城山哪有虎？”“随我来看！”大千先生引万钟到他下榻处，一把撩起床毡，“你看，我这里就有。”烛光摇曳，果见床下蹲着一只吊睛白额虎。大千先生笑着说：“不要怕！这只虎是我从小养大的，很驯，是我写生用的，不会伤人……”

见万钟少年有成，英气勃勃，大千先生很高兴。当晚留他在屋里谈人生谈画，万钟深受其益。

大千先生仔细地观赏品评了《百蝶图》，欣然在图上题词：“……此图物理、物情、物态三者俱足，真写生妙手。”并赠他一幅画，万钟珍藏至今。

抗战爆发了。国民党政府要员云集蜀中。他们看了万钟的《百蝶图》后，赞誉有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南田真传”。

于右任题：“传神之笔”……

冯玉祥将军题了一首“丘八诗”：“画的好，画的妙，画个‘隔山叫’，飞到三岛也把倭寇咬！”

万钟的蝴蝶越发画得出神入化。

他回家乡，创作了一幅画。展出时，引来一只彩蝶落在画上，谁也没发现，结果夹死在画里。还有好些次展出时，观众竟要伸手上去

捉……

解放后，万钟的画多次出版再版。1961 年，他创作的一幅以牡丹、蝴蝶为题材的《东风颂》，迭送布拉格参加国际大展。文革中，万钟在劫难逃。他那价值连城的《百蝶图》、《百花图》被烈火化为灰烬。

煎熬到 1971 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大力提倡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正下放当炊事员的万钟，又操起画笔，历时一年，《百蝶图》重生。

暑假，他负画北上。北京画院的画师们看了。都说，蝴蝶画绝了，北京无人能及。荣宝斋的王宝山当即要求收购。

耄耋之年的万钟着实被蝶迷住了。他的居室里，满是蝴蝶标本。

由贤妻徐淑芬陪着，他自费上北京、下昆明、去桂林……写生创作。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西山龙门公路上发现一只奇美的蝴蝶，他去追。用遮阳帽捕、脱衬衫去扑……经过一个多小时，跑了两三里路，摔了几个跟斗，衬衫也被荆棘挂破了，终于捕到这只蝴蝶，他孩子似地笑了。



听说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中国蝴蝶展览》，他急如火火赶去。开馆那天始，他八点半准时去，站着边看边画。一直站到下午两点还不想走。一连二十多天，天天如此。

万钟的“双百图”终于画成了。1980 年在京展出，引起轰动。董寿平看后，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推荐。阿老教授看后，要求万钟将其印制成册广为发行。李苦禅大师看后说：“目前画没骨工笔画的人不多了。工笔画往往流于匠气，万钟先生的画既工笔细又富有生气，真是难能可贵！”

万钟 81 岁了，有一心愿常常化而为梦：

在他那梦蝶轩里，那是一个风光秀美、彩蝶翩跹的大花园，清风徐来，有成千上万只彩蝶围在身边上下飞舞盘旋。他赶忙高高举起涂满蜜汁的双手在空中狂舞——这是一位云南捕蝶者告诉的良方，群蝶围着他，舞得越发花儿朵朵开。他眼花缭乱，欣喜若狂。他取画笔，拿画纸，立刻便绘下这夺人心魄，妙不可言的蝴蝶世界……

（责任编辑：刘家驹）





汉文帝

提倡薄葬

●王 涛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在位期间,实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刘恒曾两次把农民的田租减少为三十税一,甚至有十二年时间免收全国的田赋。他还减轻了刑法,取消了连坐法和割鼻、砍脚、脸上刺字等惨无人道的肉刑。总之,刘恒作为皇帝,建树甚多,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几位好帝王之一。

汉文帝最值得称道的是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近于苛求的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庞大的帝王军团中是极为鲜见的。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死后“葬礼”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最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孔夫子是提倡“薄葬”的。《论语·先进》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棺,就是棺材;椁,则是中国古代有钱人家常用的一种裹在棺材外面的棺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颜渊死后,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

替颜渊置办外椁。孔子回答说,我的儿子孔鲤虽然不如颜渊有才华,但他总是我的儿子。孔鲤死后下葬,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来替颜渊购买外椁。因为我自从当过国家的大臣之后,就不再步行了。孔子以曾当过大夫为由而不愿卖车为他最得意的学生购置外椁,不过是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罢了。而他的真实意图则是要厉行“薄葬”。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儿子孔鲤下葬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内棺,而无外椁了。

历代统治者都把孔子推崇为“圣人”,但身体力行“薄葬”的却为数甚少。秦始皇生前为营造自己的陵墓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许多百姓为之丧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郿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锢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始皇帝在没有统一中国之前,为了在郿山营造自己的寝宫,就已经将郿山凿空了。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发遣70余万囚徒到此参与

修筑工程。在施工中曾挖穿了三层泉水,便冶铸铜水将泉洞堵塞,在里面放置外椁。还在内棺里彩绘宫殿,并排列了百官的位次,藏满了稀奇珍贵的宝物。还命令设计了带有机轮的弓弩,万一有人盗墓就会被射杀。在寝宫内有用水银制成的江河大海,水银的流动靠机器相互灌输而成的。在寝宫的上壁绘有天文,上壁则绘制了全国的地貌。用人鱼的脂油制成蜡烛,这样的灯能燃烧很长的时间。始皇帝的这种“葬仪”已经到了穷奢极侈的地步。

著名的十三陵,现已经过挖掘并对外开放的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修筑这座陵墓,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参加营建的军民达三万余人。所用的石料是从相距百余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采集来的楠木和杉木。这座陵墓共耗银八百万两,相当于万历执政时全国两年的田赋总和。

汉文帝与始皇帝、万历皇帝相比,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了。公元前157年的六月,汉文帝在未央宫病危。临死前,向天下发布了自己的遗诏: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

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长久,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美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经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以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纻七日,释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

这篇遗诏的大意是说:我知道天下万物既然有生,就必然有死。死亡是天地之间的必然规律,是事物发展的自然归宿,没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当今世上的人们,都贪生

而害怕死,死后又举行很奢华的葬礼以致于使家业破产,穿戴上沉重的丧服,而使人的身体受到伤害,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认为是很不可取的。我在位的时候,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少德政,去世之后,反到要百姓为我在盛夏的炎热日子里穿很长时间的沉重丧服,让别人的父子为我举哀,使一些长者为我而伤感,老百姓还要因我而不能正常饮食起居,连祭祀鬼神这样重要的活动也得停止,这岂不是更使我显得没有仁德了吗,让我如何对天下百姓交待呢?我从先帝那里继承了帝位,虽然君临百官诸王之上已有二十余年,但我自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二十余年来,上仰赖苍天之灵,下依仗国家洪福,天下和平安定,没有发生战争。我虽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帝王,但也时常害怕犯错误,使先帝创业的遗德蒙受羞辱;特别是随着我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担心更与日俱增。今天我将毫无痛苦的去世并被后人供养于祖庙中,这样一来,连我在位时所犯的错误也一并掩盖过去了,难道我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吗?百官平民在接到我的遗诏后,只可举丧三日,三日后立即脱下丧服。在举丧期间不得禁止老百姓娶媳妇,嫁

女儿,也不得停止祭祀活动,更不能禁止百姓饮酒吃肉。因工作关系必须给我办理具体治丧事项的人,也不得按传统的做法光着脚。治丧的人们头上或腰间系的麻带不得超过三寸;也不要白布来包裹灵车及兵器,更不得让百姓到灵堂中哭泣。只能在早晚各派十五名专门办理丧事的人到灵堂中哭泣,礼仪完毕就不要再哭了。不是清晨和夜晚,任何人不得擅自到灵堂中哭泣。我的灵柩下葬后,穿大红和小红这两种丧服的人,不可按旧礼穿九十日,而只能分别穿十五日 and 十四日;纻这种丧服则只可穿七天,到期都必须脱下来。其它的在这份诏书中难以一一提及的事情,也一律按照遗诏的精神办理。将我的遗诏布告天下,让百姓都知道我的这番心意。我下葬的霸陵就依山傍水而建,不要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我去世之后。后宫中夫人以下的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妃妾都要遣返回家与亲人团聚。

汉景帝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遗诏,非常简朴地安葬了父亲。文帝有景帝这样的儿子,乃文帝之幸;而天下有文帝,又何尝不是天下之幸呢?!

(责任编辑:刘文)

欢迎订阅《安徽老年报》

本报宗旨:为老年人服务,做老年人知心朋友。

本报的报道、文章注重短、精、特、新;高品位、高格调。《论坛》《姜斋絮语》反映老人心声。

本报宣传涉老政策,保护老人合法权益,提供老人渴求的保健知识和信息,指导愈来愈广泛的老人消费。

本报周一刊,4开4版,全国发行。全年56期,月价1.03元,年订价12.36元。

邮发代号25—42

全国统一刊号CN34—0051

社址:合肥市阜南路3号商友大厦二楼《安徽老年报》发行部

邮编:230041

张学良的龙凤恋

● 纪 流



青年时期的张学良

于凤至是 1897 年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今南崴子乡)。父于文斗,在郑家屯开了家叫丰聚长的店铺。商号不算很大,但经营有方,年年赚钱,却经常遭受蒙匪袭扰。以陶克陶胡、什干为首的盗匪,受沙俄利用,气焰嚣张,攻城陷地威逼奉天,当时的奉天督军徐世昌,把松辽及漠北一带剿匪的重任,交给了被招抚的张作霖。

张作霖率前路、中路巡防营进驻郑家屯时,帅府就选在丰聚长商号的后宅。

于文斗需要张作霖对付蒙匪,款待极为热诚,于、张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年春天,张作霖率部在漠北龙王庙与蒙匪决战,由于援兵不足,在此关键时刻,于文斗闻讯亲赴洮南,说服了与张作霖有嫌隙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派出精锐骑兵,前往龙王庙一带助阵。张作霖从劣势转为优势,一鼓作气打败了蒙匪。张作霖班师回到郑家屯,感激于文斗的临危相救,为报恩,歃血为盟,两人成了磕头弟兄。

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在洮南驻防的张作霖及时赶赴奉天,因保督军赵尔巽而立功发迹。1913

年,张作霖已握持东北军事实权,特地回郑家屯与故交于文斗叙旧。返奉天的前夕,到聚丰长与文斗话别,正遇算命先生为于凤至卜命。卜帖上有“凤命”二字。张见后大悦,将卜帖带回奉天,请名卜包瞎子核兑。包说:“大帅如果求亲,你算找巧了,于凤至是凤命千金,少帅学良是将门虎子,莫错过机缘啊!”张作霖听后,派人到郑家屯,请天合长粮栈掌柜张杏天作伐玉成此婚。张递了学良的庚帖,说清原委。于文斗让张杏天回话:“父母同意,奈婚姻是儿女终身大事,须自己看中为好,邀少帅过府‘相门户’。”张作霖接到回信,已知婚事有成,赶紧找来学良。

在帅府里张作霖是一言九鼎,儿女的婚事由他一人说了算。张学良万没料到,奉天城姿色好的女人千千万,老头子偏要到偏僻的小镇去选儿媳。

“这闺女只比你大两岁,我已托人作了媒,过了年你就去郑家屯相亲。这事就这么定了!”

阴历正月初三,张学良来到古镇郑家屯,住进了吴俊升的宅院。终日闭门不见外客。到第六天竟不辞而别。

于文斗的八姨太对女儿凤至疼爱备至,视为掌上明珠,将她嫁给东北王的儿子,本非己愿,可依违都是祸,她只好暗中饮泣。于凤至反过来则劝母亲。凤自幼天资聪慧,温柔秀丽。10 岁时,已精通《四书》、《五经》,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皆晓,成了郑家屯有名的才女。

这一年端午节,因负疚大帅结亲之托的吴俊升,探知于文斗和女

儿凤至一同来到奉天,他喜出望外,专门去大帅府通报。

“于文斗是为一批货物而来,于凤至则是探望亲友,顺便买些文房四宝、古字画。他们住在中街路南的天益堂药房。”

“好!我邀他父女到帅府吃酒!”张作霖喜不自禁。

吴俊升献计说:“你只能请结拜兄弟,怎么能请未过门的儿媳,再说,少帅跟她尚未见面呢。”

“依你之见呢?”

“委屈一下少帅,他以画店掌柜的身份与小姐见面,地点就在天益堂。”

“好,就这么办!”

张学良架不住父亲的威严,心想看看又有何妨。他同意扮作字画商人,但不愿去天益堂。他提议去一家离帅府较近的画店,学良经常到那儿买古画。

这天,吴俊升带于凤至来到古画店,张学良一见,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奉天城名门闺秀见过万千,可还没见过这样风流女子,她顾盼一望,两眼如盈盈春水,嫣然一笑,百媚顿生。张学良见了她一下变得手忙脚乱。

于凤至有敏锐的眼力,觉得画店掌柜太年轻,打扮也不像商人,对书画方面的言谈举止,更少行家气质。看这人浓眉大眼却透着灵性,器宇轩昂长相不俗,倒像行伍中的军官。越瞅他,他越慌乱。张学良一下把画轴上的绳扣抽成死结。

吴俊升帮着学良解开绳扣,请于凤至靠近柜台观看,忙说:“张掌柜拿出来的可都是古人真迹。”

张学良徐徐展开画轴,一幅清

淡幽雅的《竹兰图》，呈现在凤至面前。画面上翠竹挺拔，几丛幽兰间杂其间，山石映衬，情趣盎然。

张学良说：“请小姐细看，浓淡相宜，相映成趣，不涂香料，如闻其香！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所画，地道珍品！”

于凤至凝视着《竹兰图》，左看右看，沉思片刻，问道：“这张画要多少钱？”

“它是无价之宝，我们收购来以后，重作裱糊，薄利售出，价洋么……这个数。”说着，别扭地伸出三个指头。

“三百？”

“三千元！”

于凤至“格格”地笑起来，说：“张掌柜，依我看，真画三千不多，假画嘛，三十也不少！”

张学良暗想，一个乡下女子对郑燮的技法妙道不可能有太深的了解，兴许是为了杀价，于是问道：“小姐可知郑燮画竹兰的奥秘？”

“板桥先生画石兰竹，取法郑所南、陈白阳和石涛，所以有郑所南的峭拔、陈白阳的潇洒，又有石涛的沉雄秀发，但他是十分学七，要抛三的，因此形成他那苍劲挺拔，磊落潇洒的独特风格，兼有清高拔俗，自成天趣之妙。”说到这里，她稍加停顿，“我无师承，只向您说了一点个人的感想。”

张学良听了，心中自愧不如，她所讲的道理，确实是名家的口吻。此刻，他慌忙问道：“这画你是不是喜欢？”

于凤至说：“板桥画竹兰，挥洒自如，妙趣横生，初看俗拙，实则暗藏风骨。可是，这张画，空有架子却无神韵，显然，是今人的赝品，所以

三千元是不值的。”

张学良说：“不，不，不！画是绢本，又有后代名人题跋，应当不是伪作。”

于凤至驳道：“临摹名家字体的高手，各朝都有，上乘者可乱真，但只能糊弄外行而已。”

张学良说：“这宣纸有年，纸色暗黄，书香味十足，恐难造作吧！”

于凤至道：“画店主人当精通伪作之妙道，天下能人居多，一幅新画可变得古色古香，连霉潮气也可如真，这难道不是常识么？”

吴俊升打圆场说：“既然姑娘不喜欢，再拿一张字画如何？”

于凤至点点头。

张学良从带来的卷轴中抽出一幅字画，上面用草书写着一首诗：“规摹简古争人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诗尾有苏东坡的落款和铃记。

于凤至看出这是大诗人、书法家苏东坡的真迹，心中十分高兴，决意买下。但脸上故作不屑之色：“这字画要几个钱？”

张学良见她无意买，便随口说：“八百块！”

“八百？于凤至微微一笑，将钱袋向柜台上一放，“买下了！”

张学良见于凤至识货，知开价太低，心中十分后悔，但又不好改口，只好卷起让她买走。

未出画店，于凤至又转身回来。说：“掌柜的，我昨天在小摊上买了两幅画，借阁下的眼力，帮我鉴定一下如何？”

张学良点点头。他打开画轴一看，是《钟馗捉鬼图》。落款是吴道子作画。但，他从未见过吴道子的

真迹，心中犹豫不定，只好搪塞一番：“好画，好画，是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真迹！”

“不对！”于凤至肯定地说，“它是出自吴道子的门生黄筌之手。”

张学良觉得扫了面子，求起真来：“何以见得？”

于凤至揶揄地说：“亏你还是画店掌柜，连真伪不分、好坏莫辨，你趁早改行吧！”

吴俊升赶紧喝住于凤至，悄悄告诉她：“他就是来相亲的张学良！”

于凤至满脸绯红，朝张学良看了看，说：“我早就察觉他不是画店先生，我直率了！”她说完，头也不回，一直朝着住处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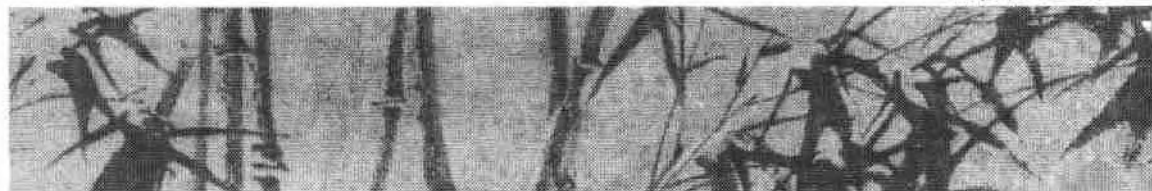
张学良自画店一睹芳容，心上总留着于凤至的影子，埋怨自己错过了郑家宅相亲的好机会，越想越悔，为了追忆相亲的场面，他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古镇相亲结奇缘，
秋波一转销魂。
千花百卉不足春，
厌倦粉黛群，
无意觅佳人。
芳兰幽挺独一枝，
见面方知是真。
平生难得一知音，
愿从今日始，
与姊结秦晋。

这首词传到于凤至手里，她从字里行间看出张学良对自己的仰慕和内心的愧悔，一腔怨愤不满之情，被这一首词冲得干干净净，冰冷的芳心一下进入了百花吐艳的春天。爱情之火点燃了。

张学良托人寄出《临江仙》之

郑板桥的兰竹图



后，曾两次到天益堂造访，于凤至却托故不见，仅以答词相赠：

古镇亲赴为联姻，
难怪满腹惊魂。
千枝百朵处处春，
卑亢怎成群，
目中无丽人。
山盟海誓心轻许，
谁知此言伪真？
门第悬殊难知音
劝君休孟浪，
三思订秦晋。

张学良读罢诗笺，觉得她对婚姻大事严肃郑重，他从心底爱上于凤至了。经过各方努力，于凤至终于答应了张学良求婚。1916年，张学良再次来到古镇郑家屯，和于凤至喜结良缘。

婚后，于凤至住进奉天南门里的大帅府。在帅府之中，她处事谨慎，为人谦和，深得上下老幼仆从的敬爱。她为学良生了两男一女。

张作霖为加强经济实力，决定建立富裕银行，聘姻亲于文斗为总裁主持其事。于凤至感谢张家父子的好意，但不赞成靠裙带关系为自家争半点好处，她亲赴郑家屯与父亲讲明自己的主张，深得于老先生的赞同。张作霖数次恳请，都被于文斗婉辞。后来，张作霖又让于凤至的大哥前往奉天，聘他为银行总裁。但在于凤至的影响下，其兄也不肯高就。凡此种种，于凤至受到帅府内外更多人的敬重。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于凤至正在英国伦敦。当她得知丈夫被蒋介石扣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后，忧心如焚，紧急致电宋美龄，求其向蒋说项释放汉卿。但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1937年春，于凤至回到国内。

在南京，于凤至见到了私交颇厚的宋氏姐妹。她听说汉卿释放无望，就要求去奉化与张学良伴狱。宋美龄劝她说：“凤至，你我都是女流之辈，纵然心中有男儿之志，这

伴狱之事可不是好受的。你从国外赶来为他奔走，总算尽了夫妻情分，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

于凤至苦笑着说：“我与汉卿是结发夫妻，多年来情深意重。我自知伴狱是人间苦事，但意在分忧，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也要去陪他！”

经蒋介石的批准，于凤至毅然来到奉化溪口，开始过艰难的囚犯生活。她先后陪张学良辗转于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和沅陵、贵州息烽等地。三年苦熬，历尽艰难。在湘西沅水之滨的凤凰山囚禁时，张学良为感激凤至的患难深情，曾为妻子题诗一首：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1940年，于凤至在狱中抑郁成疾，患乳腺癌。经张学良多次向戴笠交涉，于凤至才得赴美就医。

1961年，于凤至的女儿阎瑛和女婿陶鹏飞从旧金山飞到台北，参加一国际学术会议，顺便探望被囚禁多年的张学良。

张学良看了她们母女在美国生活的照片，询问了亲友生活的情形。心中又高兴又难过。

照片上那难忘的形象虽然苍老了许多，但还能看出她的风韵。在美国她是默默无闻的，在中国她却是一位响当当的杰出的女性。64岁的年纪，但看上去照片上的容颜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10岁。

往事如潮，数十年的离合悲欢，晃如昨日一般，涌到少帅心头。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给妻子的信。

在飞机上女儿看了信的内容，泪水如注。信的内容大意是：获释无望，自由无期。我天天读圣经，望圣门收我为徒，无奈基督教规严禁有两个妻子（或女人）的人入教，只靠你能为我解脱尘世间的苦辣酸

辛……你我天各一方，一生一世我难尽夫、父之责，就此办个手续，了结了吧！……不辱家门，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愿望。

这封信，一直在女儿手中扣压了两年。

女儿心疼母亲，她是中国最不幸的女人之一。乳腺癌的折磨她借助手术刀战胜了，但长子闾珩、次子闾珣都先后病歿异国，这是她在丈夫被关押之后，最为沉重的打击。

这天，于凤至叫住女儿：“闾瑛，你和鹏飞从台北回来快两年了，我觉得你俩有事瞒着我，你爸爸真的没有信给我？”

阎瑛有些心跳。自台北回来，他向母亲介绍了父亲的情况，胖了，老了，但不迟顿，精神奕奕……但瞒住了解除婚约的请求。本来已经安然过去两年，今天为啥母亲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他真的没信吗？”

“妈！……”张闾瑛含混敷衍，吞吞吐吐。如果把事情捅漏，准会刺伤母亲的心。

“好女儿！拿出来吧，你妈什么阵势没见过？”又说，“不会是他得了重病吧！怎能不写信呢？”

“妈妈，想到哪儿去了，你可不要难过！”“女儿再不拿出信来，妈妈会生心病的。”迟疑了很久，阎瑛才把信交出来。

于凤至看着信，宛如五雷轰顶，她泪如雨下，好一阵才透口气来。她望着台湾，望着天边，悄声自语：“汉卿，只要你高兴，任何事情我都会肯作的。”她收住泪，对女儿说：“闾瑛，拿纸笔来。代我给你爸写一封信。祝福他们！赵一荻是一位很难得的女子啊！她这些年代我陪伴着汉卿坐牢，吃了千辛万苦，现在她理当得到法律的承认。”

（责任编辑：刘文）



唐太宗李世民

唐贞观厉行 精简勤政

● 官波舟

唐初，太宗李世民常以隋亡为鉴，治理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减轻赋役，宽松刑罚，清廉吏治，虚心纳谏，重用人才，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国力强盛，被后世称之为“贞观之治”。在此期间，唐太宗下决心精简机构，尽力提高行政效率，也是当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举措。

据史载，贞观元年，唐朝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官员只有643名。当时全国人口约有1500万人。这不能不称之为精简。这个数目，比隋朝和以后的开元年间的官员数字也少四分之三。

机构精简后又“超编”咋办？《唐律》规定，各级官吏出现“超编”，“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用法律来限制“超编”，保证机构精简。在机构精简中，唐太宗贯彻“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就是说，把那些干不成事的，能力差不胜任的，影响别人干事的冗员全部精减，留下能干事的，干得好的，胜任工作的官吏。唐太宗下令“并省”时，对房玄龄等讲了极为精辟的官员的数量及质量关系：“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有用的人才从哪里来？唐太宗

除了利用士族贵族中的人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科举制度，选擢寒素，提拔寒门庶族中的人才，取代士族贵族中在各级官府的无用之徒。少年时“孤贫落拓”，曾为道士的魏征，官至秘书监参预朝政、侍中等职。出身孤贫、西游长安时“逆旅主人不之顾”的马周，官至中书令。像这样出身寒门庶族中的人才，在唐的各级政权中为数不少。同时，对于反对过唐太宗，及其它宗派中的人，只要是人才，唐太宗也能重用。魏征早年参加过瓦岗军，后又为李世民的政敌长兄建成的属官，唐太宗不记前仇，委以重任。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官至吏部尚书参预朝政。曾为萧铣部下出身不高的刘洎，官至刺史。旧史说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

贞观之治时，各级政权的行政效率也比较高。当时作为唐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第一、二把手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十分尽职。在他们的主持下，做到了政治清明，勤于职守，效率很高。

那时，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运用制度、法律来作保证。

无故缺勤或擅离职守要受惩罚。唐朝各级官员每日出勤接受多次“点检”，《唐律·职制上》规定：“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即一次点检不到者，受十下笞刑。不过一日之内至多受笞刑二十下。

各级官员还要值班或轮流值宿。唐太宗曾“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规定：“诸在官，应

直（值）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地方官必须在所辖地界内值守，“私自出界者，杖一百”。

出现错误要受惩罚。《唐律·职制上》规定：“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失错者杖一百”。即并非故意违背旨意，而是错误地领会了制书中的旨意，要受一百下杖刑。有意违背旨意的，要受徒刑二年的处罚。

办事拖拉要受惩罚。各级官员经办事须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皇帝的制书，一旦“成案”，必须“即日行下”。下级机构接到制书，要立即抄录、转发，不得“稽缓”。抄转制书，按纸张多少规定时限。二百张纸以下，“给二日程”，超过此数，每二百张纸以下，“加一日程”。但是，“所加多者，总不得过五日”。如果经手皇帝的制书超过了时限，“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

经办“官文书”也有严格的界限。《唐令》规定，官文书“在曹常行”，即在一级政府机构停留的时间，“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如果经办官文书超过了时限，“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需要会签的官文书，经三人以下的，给一天会签时间；经四人以上的给两天时间。事情重大各加一天。事情紧急，不能计程办事。也就是说，一件官文书的会签过程，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如果会签超过了时限，即按延稽官文书论罪。这说明唐贞观时官员之间办事互相推诿、无休止的扯皮，也是不允许的。

“505”神功气袋确有疗效

王如岱

我先是在部队，连队生活艰苦而且紧张，后来又在电力部门工作，长期在野外作业，架高压电线，那种紧张，艰苦就不用提了，但是几十年间，无论在多么恶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始终没有放弃从童年时代起就执著追求的书法艺术。每次外出施工，别的东西可以不带，而笔墨纸张等总是装得满满的。白天，在高压电线杆上工作，一天下来，累得要命，可是我仍然几乎天天揣摩书法到深夜三点多钟，吃饭也不正常，乍冷乍热，因此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疼痛不堪，身体十分瘦弱，还有其他难以彻底治愈的疾病，严重影响了我的书法创作，使我十分痛苦。有人向我建议可使用“505”神功元气袋试试。开始我还抱怀疑态度，心想，现在弄虚作假的事情很多，假药假酒不少，吹牛之风更谓盛矣，但是我还是听从朋友意见，试用了“505”神功元气袋。试用一段时期后，

胃部开始感到暖和，热烘烘的，最初仍有疼痛现象，但发病的频率逐渐减少了。又过了一段时期，疼痛的程度明显减轻，现在，我的体重也增加了，进食也比较正常了。我可以比较充沛的精力从事书法创作了。

我亲身体会，“505”神功元气袋疗效确实是可以的。而且没有影响身体健康的副作用。我对发明家来辉武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对其所属下的所有员工表示感谢。

王如岱，著书书法家。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北京举办二次书法个展的工人书法家，国内外新闻传媒多有介绍。辛弃疾的后人、著名学者、书法家辛冠洁评价他的书法说：“其道，立足当代，法乎唐晋，直追汉秦。篆隶草楷，无不超乎形迹之外，而严守法度之中”

北京紫金台经济文化发展公司

启 事

自我公司在《炎黄春秋》1994年第8期刊登关于举行刘燕大师气功咨询活动启事后，因刘燕前往韩国讲授气功，一直未能举行。现刘燕大师已返京，经协商定于1995年元月6日举办咨询报告会。有欲咨询者，请迳直打电话与王爽联系，联系电话：401 1155 转 2955 或 2996，401 6886，348 5453，467 2568。

炎黄春秋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

冯玉祥在重庆和蒋介石的争斗

侵华战争从这里展开

皖南事变 陈诚看管叶挺

蔡畅与陈毅前妻 赖月明的两代情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

定价：3.20元